歷史教學

LISHI JIAOXUE

10

1958



中国現代史参考图片（三）



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

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們：

一、緒言

同志們！

圖一　中共八七会議告全党党員书。

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賀示

照得本部各軍　富於革命精神
此次南昌起義　原為救國救民
轉戰千里來粤　只求主義實行
對於民衆團體　保護十分嚴謹
對於商界同胞　買賣尤屬公平
士兵如有騷擾　准其捆送來營
本軍紀律森嚴　重懲決不姑徇
務望各安生業　特此鄭重申明

圖二　賀龙同志率領一部分南昌起义軍到达广东时发出的布告。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大會議決案

目次

代序——關於「第六次全國大會的總結與結論」的通告
政治決議案
組織問題決議案提綱
中國共產黨黨章
職工運動決議案
土地問題決議案
農民問題決議案
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
軍事工作決議案
宣傳工作決議案
對C Y工作決議案
婦女運動決議案
大會通過之各小決議案

圖三　1928年7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图为大会决議案的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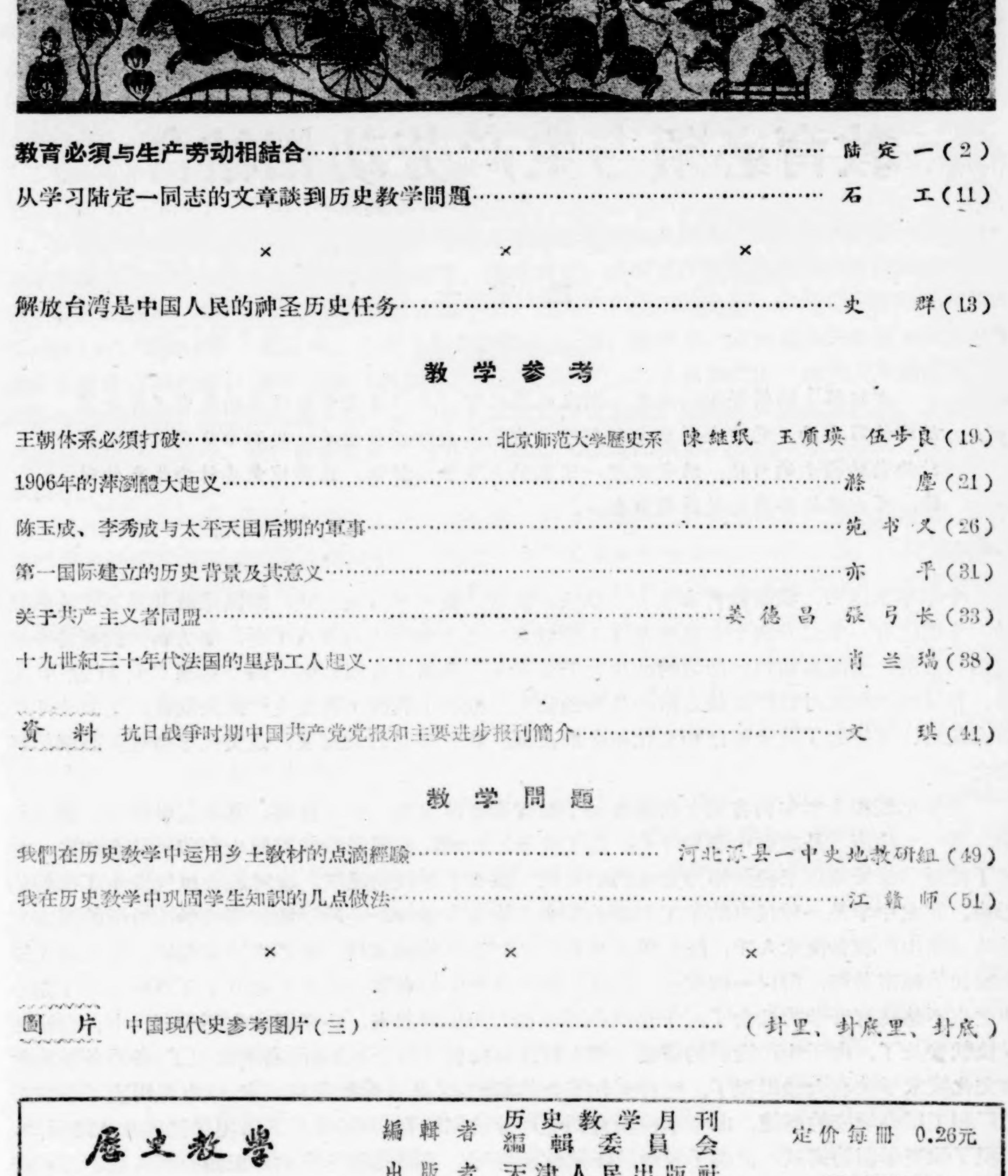


紅軍第四軍司令部佈告

軍長　朱德
黨代表　毛澤東

公曆一千九百二十九年一月　日

圖四　1929年初，紅軍第四軍由井岡山下山往贛南、閩西时途中的布告。



教育必須与生产劳动相結合……陆定一（2）

从学习陆定一同志的文章談到历史教学問題……石　工（11）

×　×　×

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的神圣历史任务……史　群（13）

教学参考

王朝体系必須打破……北京师范大学歷史系　陳継珉　王質瑛　伍步良（19）

1906年的萍瀏醴大起义……滌　塵（21）

陈玉成、李秀成与太平天国后期的軍事……苑书义（26）

第一国际建立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亦　平（31）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姜德昌　張弓长（33）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法国的里昂工人起义……肖兰瑞（38）

資　料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报和主要进步报刊簡介……文　琪（41）

教学問題

我們在历史教学中运用乡土教材的点滴經驗……河北涿县一中史地教研組（49）

我在历史教学中巩固学生知識的几点做法……江韜师（51）

×　×　×

圖　片　中国现代史参考图片（三）……（封里、封底里、封底）

歷史教學

·月　刊·

一九五八年十月号

（总第94期）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历史教学月刊編輯委員会

出版者　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錦州道六号）

發行者　河北省邮电管理局报刊发行局

訂購处：全国各地邮局

代訂代售处：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者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

定价每册　0.26元

預定价目

三个月三期　0.78元

半年六期　1.56元

全年十二期　3.12元

本期印数　001—21,620

教育必須与生产劳动相結合

陆 定 一

"紅旗"編輯部按：陆定一同志这篇文章，是根据党中央召集的教育工作会議的結論写出的。党中央对这个問題即将有指示发給各級党委。我們希望各級党委在討論党的指示的时候，結合陆定一同志的文章予以討論。在学校党委討論此事的时候，可以吸收非党的教授教員参加。

今年年初以来，我国教育事业有了很快的发展。截至6月底为止，据国家統計局不完全的統計，全国已有一千二百四十个县普及了小学教育，民办中学达六万八千所，地方新办的高等学校达四百余所，全国参加扫盲学习的約达九千余万人，全国已有四百四十四个县基本上扫除了文盲。整风运动和反对資产阶級右派的斗爭的胜利，掀起了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又掀起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高潮。教育事业的大发展，是文化革命进入高潮的标志之一。

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有两个措施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一个措施，是全国学校实行勤工俭学。另一个措施，是农业中学的开办。勤工俭学，开始把普通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結合起来。打破了普通学校长期以来輕視体力劳动的旧传統，改变了学校的风气，也对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好的影响。农业中学是一种民办的半工半讀的职业（技术）学校，这种学校旣解决学生升学的要求，又为农业生产准备技术人才，旣比較容易办，又切合当前的实用，旣不用国家花錢，也节省了学生家长的經济負担，所以一經提倡，发展之快，犹如雨后春笋，几个月就有了几万所。由于高小毕业生不愁沒有升学的机会了，于是民办小学也大大发展起来，小学教育在不少省、市、自治区很快就普及了。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成人教育也发展了，扫盲运动的高潮出現了，各种各样的业余文化技术学校也大量出現了。这种文化革命的高潮，又从乡村推进到城市，城市里出現了学校办工厂和工厂办学校的潮流。由于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結合，在学校里又出現了課程改革的运动，出現了改变学制的嘗試，出現了教师队伍的改組等等。我們的教育事业，正如百花齐放，万馬奔騰。教育事业正在打破专家包办和教条主义的圈子，变为全党全民办学，变为适合于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这种改变，是在党的領导之下实现的。所謂"多快好省不适用于教育"，"外行不能領导內行"，"党委不懂教育"，"群众不懂教育"等等謬論，正在被彻底粉碎。

我国是无产阶級专政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我国的教育，不是資本主义的教育，而是社会主义的教育。沒有共产党的領导，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不能設想的。社会主义的教育，是改造旧社会和建設新社会的强有力的工具之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目的，是要消灭一切剝

削阶級和一切剝削制度及其残余，实現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消灭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和消灭腦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目的，也就是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这样的教育，只有无产阶級的政党——共产党——才能領导，資产阶級是沒有資格来領导这样的教育事业的。只有在共产党的領导之下，教育工作才能出現今天我們所看見的这种新气象。

最近几年，在教育方針的問題上，有过长期的爭論。在今年 4 月和 6 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議上，解决了一系列的理論問題和实际問題。

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針，向来就是，教育为工人阶級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为了实現这个方針，教育必須由共产党領导。这个方針，是同資产阶級的教育方針針鋒相对的。資产阶級的教育，是由資产阶級的政治家領导的，是为資产阶級的政治，即为資产阶級专政服务的，是同无产阶級专政不相容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資产阶級不敢直接地公开地提出要教育受資产阶級政治家的領导，要教育成为反对无产阶級专政的工具，它只能提出"教育由专家領导"、"为教育而教育"的虛伪的騙人的主張，来达到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級专政服务的目的。所以在我們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資产阶級的教育方針表現为：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教育由专家領导。

教育首先是传授和学习知識。但什么是知識？传授和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对这些問題，我們共产党人的理解是同資产阶級的理解不一样的。資产阶級教育学者的大多数認为，只有书本知識才是知識，实踐的經驗不算知識。所以，他們認为，教育就是讀书，讀书愈多的人就愈有知識，有书本知識的人就高人一等。至于生产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那是下賤的，那是"絕路"。資产阶級教育学者另外有一些人，則認为教育即是生活，生活即是教育。他們旣不把生活理解为阶級斗爭和生产斗爭的实踐，又不强調理論的重要性，因而实际上走到取消教育。資产阶級的上述两种看来似乎絕对相反的观点，来自一个共同的根源。他們說，人是沒有阶級之分的，教育学是一門超阶級的学問。

我們共产党人的看法，与此不同。我們認为，教育学是社会科学。一切社会科学都要跟政治走，教育学亦不例外。人們是为了进行阶級斗爭和生产斗爭而需要教育的。我們認为，世界上的知識只有两門。一門是阶級斗爭的知識。这种阶級斗爭是以經济地位划分的人的集团之間的斗爭，这种斗爭已經存在了几千年。現在，在我国过渡时期內，还有阶級斗爭。在将来，阶級消灭之后，虽然阶級斗爭沒有了，但是还有人民內部的矛盾，因而一万年还会有毒草，即是說，还会有眞理和謬誤之間的斗爭，先进和落后之間的斗爭，对于生产力的发展的促进派和促退派之間的斗爭。另一門是生产斗爭的知識，即是人类与自然作斗爭的知識。而哲学則是这两門知識的概括和总結。哲学之所以重要，因为辯証唯物主义的哲学給人們提供正确的思想方法。人与人的本质的区别，不在于"气質"或性格的不同，而首先是阶級立場不同，再則是思想方法不同。阶級立場与思想方法，是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錯誤常常来自两个根源，一个是阶級根源，一个是思想根源。人們要不犯大錯誤或少犯錯誤，就应当学习政治，学习哲学。我們共产主义者又認为，有两种片面性的不完全的知識。同实际活动完全脫离关系的书本知識，是一种片面性的不完全的知識。毛澤东同志說："学生們的书本知識是什么知識呢？假定他們的知識都是眞理，也是他們的前人总結生产斗爭和阶級斗爭的經驗写成的理論，不是他們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識。他們接受这种知識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須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說来，这种知識对于他們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識是人家証明了，而在他們則还沒有証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識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識但还沒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經驗尙少的人，应該明白

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謙虛一些，”缺乏理論的、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經驗，也是一种片面性的不完全的知識。毛澤东同志說：“我們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誤用了他們的經驗，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錯，这样的人往往經驗很多，这是很可宝貴的；但是如果他們就以自己的經驗为滿足，那也很危險。他們須知自己的知識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識和普遍的知識，就是說，缺乏理論，他們的知識也是比較地不完全。而要把革命事业做好，沒有比較完全的知識是不行的。”什么才是比較完全的知識呢？毛澤东同志說：“眞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証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識，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发展阶段。”“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識，一种是現成书本上的知識，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識，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結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較完全的知識。”（“整頓党的作风”，“毛澤东选集”第三卷）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得到比較完全的知識，而不是片面性的不完全的知識。为此，就要求教师也要有比較完全的知識。

我們的教育工作者，常常說“教育是人民的事业”。这是好的，因为在我們的国家里，这是眞理。但是，从九年的經驗来看，对于这句話也有两种不同的了解。資产阶級教育学者認为，人民群众对受教育是应該有份的，但是說到办教育，那就沒有人民群众的份，只有专家的份。他們的口号是“教授治校”，“外行不能領导內行”，“党不懂教育”，“群众不懂教育”，“学生不能批評先生”等等。对于資产阶級教育家們所散布的这种迷信，有些同志也信以为眞，忘記了我們党曾經一千次一万次被人們說成是“外行”，但是到了最后，事实都証明我們的党是比任何內行还要內行一些。我們有些同志提出了这样的主張：（一）只許国家办学，（二）只許办一种学校——全日制的普通学校。經驗証明，对于这种主張，資产阶級的教育学者是很感兴趣的，因为这可以束縛住群众的手，不許他們办学。資产阶級的教育学者明白：按照这样的主張来办教育，我国要想普及中小学教育就很困难，要想普及高等教育就毫无希望，因为国家无法負担这笔龐大的經費，而且生产也会大受損失。我們共产党人与資产阶級教育学者不同。我們認为，人民群众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而需要教育事业的。人民群众既然会做革命工作和建設工作，那么人民群众就不但可以受教育，而且可以办教育。办教育需要依靠专門的队伍，沒有强大的专門队伍是不行的，現在还应当用調干部和办师范的办法大大增强这个专門队伍。但是，教育的专門队伍必須与群众相結合，办教育更加必須依靠群众。只有在党的領导之下，把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同群众結合起来，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綫，貫徹全民办学，我国的教育事业才能够而且一定能够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也只有在党的領导之下，貫徹全民办学，才能統筹全局，兼顧各方，协調各方，既发展了教育，又使教育的发展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生产的发展。

我們的教育工作者还常常談“教育工作应該受党的領导”，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社会主义的教育必須由共产党領导，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必須由中国共产党領导。但是，对于什么是領导，要什么样的領导，也有不同的理解。資产阶級教育家認为，所謂“党的領导”，就是“政治上由党領导，业务上由我領导”。在与教育无关的問題上，他們可以听党的話，但是如果党要来干涉教育的方針、政策、制度、方法等等，他們就認为是不能接受的。他們是口头上要党領导，实际上不要党領导，在次要的問題上可以听党的話，在主要的問題上与党对抗。我們党內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中，有些人对党委以专家自居，不尊重党委的領导，这是資产阶級的影

响在党内的表現。近几年来，我国教育界里广泛地传播着一种“理論”，認为教育的主要規律是从教育史的研究中得出来的。因此，只要研究了教育史，幷且抽象地承認党的領导，就可以办社会主义的教育了，用不着党对教育的具体領导。研究教育史，如果是用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的話，那当然有好处，可以知道几千年阶級社会时代教育的規律。但須知，这种阶級社会历史上教育的規律，幷不等于社会主义教育的規律，更不等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規律。过去几千年的教育，乃是奴隶主手中的教育、地主阶級手中的教育和資产阶級手中的教育。从这样的教育史中找出来的主要規律，是剝削阶級的教育的規律。这样的教育規律，同社会主义的教育規律必然有很大的距离。如果照抄过来，必然要犯錯誤。实际已經証明，所謂“教育的主要規律是从教育史的研究中得出来的”，其实是借口教育史，把資产阶級的教育思想、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等原封不动地搬到社会主义制度下来，冒充是社会主义的貨色而已。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貴君輕，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惡，司馬迁的頌揚反抗，王充、范縝、柳宗元、張載、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論，关汉卿、施耐庵、吳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諸人情况不同，許多人幷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談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們。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側面說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剝削阶級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級手中的工具。从剝削阶級手中的工具到工人阶級手中的工具，是教育的质的飞跃，是教育本身的大革命。研究教育史而看不見这个质的飞跃，就是离开了辯証法，就是形而上学。我們主張研究教育史，但是反对那种認为研究了教育史就可以得出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規律的意見，因为这个意見，会使我們犯右傾的錯誤。不但如此，就是社会主义教育的規律，除了有共同性以外，也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点。不研究自己的特点，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錯誤。我国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人口众多，地区辽闊；第三，經济落后，文化落后；第四，有共产党的領导和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第五，这是最重要的，我国是一个严肃地进行整风、反右的国家，是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字报的国家。我們应当根据我国自己的特点，把馬克思主义的普遍眞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結合起来，来規定我国的教育方針、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等。由此可見，所謂“教育的主要規律是从教育史的研究中得出来的”，乃是使教育脫离实际，陷入右傾錯誤和教条主义錯誤的一种非常有害的“理論”。不从本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这是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反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思想方法上犯了錯誤，就找不到事物发展的主要規律。只要不从实际出发，违背了馬克思主义的普遍眞理，就一定犯錯誤，不是犯右傾的錯誤，就是犯教条主义的錯誤，或者两种錯誤兼而有之，这是在我国教育工作中应当得出的重要教訓。我們是馬克思主义者，我們主張必須从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因此必須首先認眞地研究自己的情况，必須有热情来做这种研究工作。我們也認眞研究兄弟国家的經驗和認眞研究历史，但目的不是去抄袭，去搬运，而是为了了解历史情况，了解教育方面的历史唯物主义，以便有所借鉴，依照自己的情况，做好自己的工作。我們不論做什么工作，都要紧紧依靠党的領导，因为正是共产党而不是别人，最了解我們自己的情况，最懂得馬克思主义。共产党是工人阶級的最高組織形式，共产党必須而且能够領导一切。共产党从中央到基层組織，是工人阶級的有組織有紀律的先鋒队伍。我們依靠这个队伍取得革命战爭的胜利，依靠这个队伍取得經济战綫、政治战綫、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必須依靠这个队伍才能取得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胜利。我們的教育工作者，不仅在政治上应該接受党的領导，而且在教育思想、教育政策、教育业务等方面也应該接受党的領导，才能不落后于时代，才能少犯錯誤和不犯錯誤。

几年来教育工作中的爭論，归根到底，集中地表現在“什么是全面发展”这个問题上面。“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类”，是馬克思主义者所主張的，馬克思主义者主張經过教育来达到这个目的。我們的教育工作者，常常談全面发展，这是好的。但是，对于“全面发展”的理解，却有原則的分歧。从我国九年的教育工作的經驗来看，資产阶級教育学者并不直接地公开地反对全面发展，他們甚至似乎是“积极拥护”这个方針的，但是他們主張把全面发展片面地了解为使学生具有广博的书本知識，同时却既不主張学生学习政治，又不主張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这就实际上把全面发展庸俗化，使它等同于資产阶級的所謂培养“通才”的教育方針。我們共产党人，对于全面发展的了解，同資产阶級教育学者的了解是根本不同的。全面发展，包含着这样一个根本內容，就是使学生們有比較广博的知識，成为多面手，能够“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們自己的愛好，輪流从一个生产部門轉到另一个生产部門。”（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我們主張工人在工业生产中成为多面手，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成为多面手，并且主張工人兼农民，农民兼工人，主張公民服兵役，軍人退伍又成为生产者，主張干部参加劳动，生产者参加管理，这些主張已經在逐步实行。这种既有分工又能轉业的办法，适合于社会的需要，比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分工合理得多，不仅增加了生产，而且在社会发生某种需要的时候，国家可以合理地調配生产力而不会引起社会的震动。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現在已經开始提出这样的問題：当某些产品达到了可以滿足現时期人民的最高限度的需要而有余的时候，生产这些产品的一部分生产者就应当轉业，轉到另外的生产部門去，到那时，不轉移就不合人民的需要，不合社会生产力繼續发展和人民生活繼續提高的需要。我們的教育工作和国家的其他有关工作必須为这种轉移准备条件。教育应該使学生得到广博的知識，但是广博到什么程度，就要看具体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将来，在完全巩固、完全发展、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将要培养出能够作很多事情，能够担任很多职业但是又有重点知識能力的人。这是我們的方向，我們必須向这个方向走去。在当前我国的条件下，我們能够培养多面手，还不能培养出“能够担任任何职业的人”。全面发展所包含的另一个根本的內容，是学生所学到的知識，須是比較完全的知識，而不是片面性的不完全的知識。这就必須实行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馬克思对于他所理想的未来教育說：“这种教育使每一个已达一定年齡的儿童，都把生产劳动和智育体育結合起来，这不仅是增加社会生产的一个方法，并且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类的唯一方法。”（“資本論”第一卷）这就是說，要求学生学到比較完全的知識，不但能够用脑来劳动，而且还能够用手来劳动。仅仅有书本知識，不論怎样广博，还是片面性的不完全的知識。沒有实际工作經驗而只有很多书本知識的人，只是資产阶級的所謂“通才”，并不是我們所称的全面发展的人。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們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連結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結合的原則是不可移易的。总結以上所說，我們所主張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較完全的和比較广博的知識，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我們的教育方針，应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是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針。“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就是既懂政治，又有文化，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这就是全面发展的人。就是又紅又专的人，就是工人化的知識分子，就是知識分子化的工人。

我們主張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針，我們認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类的唯一方法，是教育为无产阶級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我們說“唯一方法”，就是說除此以外再沒有别的方

法。資产阶級的教育学者不然，他們認为，要培养出他們的所謂“全面发展”的人，唯一方法是讀书，是死記书本，他們千方百計反对学生学政治，尤其反对学生成为劳动者。依照我們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針，就可以而且应該依靠群众来办学。依照資产阶級的所謂“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針，就只能依靠专家办学，不能依靠人民群众办学。依照我們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針，教育应該受党的領导。依照資产阶級的所謂“全面发展”的方針，教育只能由专家領导，用不着党的領导，因为党是“外行”。由此可見，对于全面发展的不同理解，就得出一系列的不同的以至相反的論点。所以我們說，几年来教育工作中的爭論，归根結底，集中地表現在“什么是全面发展”这个問題上面。这个斗爭的性質，是无产阶級和資产阶級两种教育思想之間的斗爭。

按照我国資产阶級教育学者对于知識、对于教育是人民的事业、对于党的領导和对于全面发展的理解办事，我們的教育就要回到資产阶級的老路上去。正因为如此，所以必須把我們共产党人对于这些問題的理解，說个明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年以来，我国的教育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之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績。这些成績是：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收回了教育主权；妥善地接收了全国的学校；取消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学校的法西斯管理制度和对学生的法西斯教育和特务統治；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基本上肃清了隐藏在教育界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学校里开設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課程；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了思想改造；进行了院系調整和教学改革；进行了反对資产阶級右派的斗爭；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的在校学生都增加几倍；扫盲运动和业余的文化技术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学校中开始普遍地实行了勤工俭学；在教育工作者的队伍中建立了党的組織；为社会主义建設培养了大量的干部。但是，在教育工作这条战綫上，工人阶級思想同資产阶級思想之間的斗爭是不断地进行着的。这个斗爭，按其性质来說，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間的斗爭。資产阶級思想，阻碍着教育的发展。資产阶級右派，在它猖狂进攻的时候，甚至企图利用学生做資本主义复辟的踏脚石，当时章伯鈞、罗隆基、曾昭掄、錢偉長等都是这样梦想过的。反右派斗爭的胜利，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使坏事变为好事，人們比較深刻地認識了教育工作中資产阶級思想的危險和害处。九年的工作，使我們得到了經驗，有可能来更加明确地和系統地闡明党的教育工作方針。

教育工作中主要的錯誤和缺点，是教育脫离生产劳动。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結合，是我們党在1934年就已經提出的方針。当时毛澤东同志就已經說：“苏維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針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爭与阶級斗爭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1954年，当經济恢复的时期已經过去，第一个五年計划已經开始的时候，党中央又曾經提出过在学校里增設生产劳动的課程問題。但是遇到一些阻碍，沒有能够貫徹。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議，同年4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論，1958年1月的南宁会議，党中央屡次强調了教育必須与生产劳动結合的主張。直到現在，党的主張才在全国范圍內实現了。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結合，教育必須由党来領导，这三者是互相联系的。教育既然脫离生产劳动，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視政治和忽視党的領导。这样，教育就脫离我国的实际，势必发生右傾的和教条主义的錯誤。

教育与生产劳动結合，是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建設所需要的，是建設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目标所需要的，是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所需要的。

社会主义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剝削阶級和一切剝削制度及其残余。現在，社会主义革命在經

济战綫上已經取得了基本胜利，在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已經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們的任务，如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决議所指出的，是“在繼續进行經济战綫、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就是使我国六亿人口，除了不能生产和不能学习的以外，人人都生产，人人都学习。就是使我国工农群众知識化，同时使我国知識分子劳动化。工农群众和知識分子双方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才能彻底改变旧社会遺留下来不合理的情况，消灭两方面的落后現象，即消灭工农群众缺乏文化的現象，也消灭知識分子中的資产阶級思想。所以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革命，这个革命要求教育为工人阶級的政治服务，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馬克思說过：“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結合是改造現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哥达綱領批判”）沒有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結合，文化革命不能实現。文化革命，对于我們的国家，对于工农群众，对于知識分子，都是有利的。只有坚持資产阶級立場的人們，才不願意有这样的革命。資产阶級的教育方針，为教育而教育的方針，劳心与劳力分离的方針，是同社会主义革命不相容的。

社会主义建設，要求鼓足干劲、力爭上游，要求实行勤俭建国，也要求技术和文化，要求多快好省地培养出大批的又紅又专的技术人才。为了滿足社会主义建設的这个需要，也要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列宁說过：“如果不把青年一代的教学和生产劳动結合起来，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我們不可能把脫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者把脫离相应的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提到現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識現状所要求的那种高度。”（“民粹派空洞計划的典型”，載“教育譯报”1956年第6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必然提高教育的质量，不仅仅在智育方面是如此，在德育、体育方面也是如此。劳心与劳力分离的教育方針，不能适合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

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又是消灭了城市与乡村之間的差别的，消灭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間的差別的社会。由于我国的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共产主义的实現已經不是很远的远景了。为了实現共产主义社会，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一十年前写的“共产党宣言”里，提出了“在各个先进的国度里几乎到处可以采取”的十条办法，其中第一条到第八条，在我国已經采取适合于我国实际情况的方法实現了，第九第十两条，則正在开始实現，这就是：“将农业同工业結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状态逐漸消灭”；“将教育同物质生产結合起来”。大家看到，由于我国在发展工业的工作中，采取了“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領导、全面規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針，乡村中也出現了工业，出現了工人兼农民和农民兼工人的現象。这种現象，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由于开始实行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学校办了工厂农場，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了許多学校，开始出現了学生即工人农民，工人农民即学生的現象。这种現象，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可以設想，我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我們的社会的基层組織将是許多共产主义的公社。除了少数例外，每个基层单位将是工农商学兵行行俱全。在教育方面来說，每个基层单位将有自己的初等学校、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同时，每个人将都有时間来受教育，旣是劳动者又是知識分子。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中曾經預言这种情形說：“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方才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有了可能在大家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出充分的物品来滿足一切社会成員的大量消費和造成丰富的后备儲藏，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閑暇时間，可以从历史上留传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公共生活方式等等——中間承受一切眞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承受

而已，还要把这一切从統治阶級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公有物，促使其进一步地发展。”为了实現这种前景，我們的教育，就不应該向着劳心与劳力分离的方向走，而应該向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結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向走。

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在資产阶級的教育家看来是不可能的。今年年初以来教育事业的大发展，証明了采取群众路綫来办教育，就可以使教育事业多快好省地发展。而实行教育与劳动結合，使教育成为工人农民所热烈欢迎的事业，是发动群众的办学积极性的重要方法。在党的領导下群众路綫的办学方針就是：第一，統一性与多样性相結合。培养目标是統一的，即培养有社会主义覚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但中央、地方，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都可以办学，学校的形式应該允許多种多样。学校可以是全日制的、半工半讀的、或者业余学习的，可以是免費的或者是收費的。現在的业余学校，在生产更加发展，工作时間可以縮短的情况下，将变为同半工半讀的学校一样。在生产大大发展，公共积累大大增加的情况下，收費的学校也将变为免費的学校。第二，普及与提高相結合，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一部分全日制的、半工半讀的和业余的学校担任提高的任务，同时用半工半讀和业余学习的形式广泛地普及教育。这种用来普及教育的学校，因为是半工半讀的和业余的，可以全部或大部解决自己的經費，可以按照“能者为师”的原則就地找到师資，然后在政府的帮助之下，逐漸发展成为在課程、設备、师資等方面日益完备的学校。在缺乏劳动的学校里，要强調增設劳动課程，在缺乏基础課程的学校里，要强調增設基础課程，使两种学校都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更好地实現理論与实际結合的原則。第三，全面規划与地方分权相結合，既发揮中央各部門的积极性，又发揮地方的和群众的积极性，以便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全国和地方在規划教育工作的时候，因为有党委的領导，可以使教育得到最快的发展，同时又使教育的发展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而不是妨碍生产的发展。第四，群众路綫也应該貫徹到学校的政治工作、管理工作、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中去，在这些工作中采取大鳴、大放、大字报的方法，采取党委領导下的“三結合”的方法（例如制定教学計划和教学大綱的时候可以采取在党委領导下师生結合的方法，講授課程的时候可以采取党委領导下聘請有实际經驗的人同专业教师共同授課的方法等等），以及在領导者与被領导者之間，在教师与学生之間，建立民主的平等的关系，改变旧的不合理的关系。經驗已經开始証明，凡是实行了这些办法的地方，都得了很显著的成績。

实現教育与劳动結合，必須經过斗爭，而且将会有長期的斗爭。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教育工作中反对几千年的旧传統的一个革命。劳心与劳力分离的原則，在教育工作中已經統治了几千年。历史上的一切剝削阶級，都堅持这个原則。二千多年以前，孔子就反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他把“請学稼”“請学为圃”的樊迟斥为“小人”。孟子反对許行，說“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食，讀作飼。）資产阶級的教育学家們，在这一点上，同孔孟是完全一致的。教育原来是同生产劳动結合的，在阶級社会里二者分离了，現在又要結合起来。十八世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利叶和欧文，开始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贊成这个思想。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里，认为

半工半讀比全日制的学校更适合于儿童。在"給临时中央委員会代表的关于几个問題的指示"中，馬克思提出"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九岁起都应当成为生产工作者"；他主张九岁到十二岁的儿童应当每天在作坊或家庭中劳动二小时，十三岁到十五岁的儿童劳动四小时，十六岁到十七岁的儿童劳动六小时；他相信"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綜合技术教育結合起来，就能把工人阶級提高到比中、上等阶級高得多的水平"。馬克思曾經預言道："沒有疑問，工人阶級在不可避免地夺得政权以后，还会在理論方面和实用方面，使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內占得地位。"（"資本論"第一卷）只有在工人阶級和共产党領导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原則，才会被付之实施，在革命和建設中发生巨大的作用。馬克思的預言，将在我国实現。我們必須看到，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是同几千年的旧传統进行决斗，沒有破除迷信、埋葬教条主义、敢想敢說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沒有以馬克思主义的普遍眞理和我国具体实际相結合的創造精神，是不会成功的。現在，在教育工作中，正在进行着大破大立的过程。資产阶級思想和教条主义思想正在被破除，新的适合于我国情况的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理論、教育制度、教育方法、課程、学制等等正在被創造出来。这个教育革命是有深厚的經济基础的。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說告訴我們，上层建筑必須适合經济基础。政治制度是上层建筑，是經济的集中表現。教育属于意識形态的范圍，也是上层建筑，它是为政治服务的。过去几千年的阶級社会，是以奴隶主所有制，地主所有制和資本家所有制为其經济基础的。适合于这些所有制的政治制度，是奴隶主阶級、地主阶級和資产阶級的专政。为这种专政服务的教育，是奴隶主阶級的、地主阶級的和資产阶級的教育，这些教育相互之間是有区別的，但它們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分离、劳心与劳力分离，是賤視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劳心与劳力分离，是一切剝削阶級所需要的，也是資产阶級所需要的。我們的社会，是以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为經济基础的。适合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政治制度，是无产阶級专政。我們的教育是为无产阶級专政服务的，因而我們的教育，就必須一反以往几千年的旧传統，采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間的差别，这也就是消灭历史上一切剝削制度的残余，使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是工人阶級和一切劳动人民所需要的。这个方針是符合于人民的願望的，因此一定会胜利。反之，劳心与劳力分离的方針，旣然不适合社会主义的經济基础，不符合人民的需要，虽然有几千年的传統，却迟早总要被人民唾弃。政治挂帅，在党的領导下，团結全党，团結一切可能团結的教育工作者，反对資产阶級的教育方針，为实現党的教育方針而斗爭，我們就能实現我国的文化革命，使我国六亿人口人人能生产，人人能学习，变为旣是劳动者又是知識分子的新人。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

（原載"紅旗"第7期）

从学习陆定一同志的文章谈到历史教学問題

石　工

“紅旗”杂志第7期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陆定一同志所写“教育必須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文章，“历史教学”本期轉載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根据党中央召集的教育工作会議的結論写出的”（“紅旗”編輯部按語），是党的一个重要文件。文章总結了我党教育战綫、特别是解放九年来教育战綫斗爭的經驗，系統地闡述了我党的教育方針和社会主义教育必須由共产党領导的問題，并且解决了一系列的理論和实际問題，无論对社会主义教育理論和教育事业的大跃进都有极大的意义。它給了我們教育工作者批判資产阶級教育路綫和教育学理論的武器。每一位教育工作者，不能不認眞地学习它，用它作为自己进行教育实践的指导思想。我們历史教师也要从定一同志的文章中寻求提高自己、改进历史教学的武器。

在历史教学和历史教师中間，关于社会主义教育方針和党的領导問題方面，确实还存在許多問題，甚至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錯誤。

定一同志的文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針，向来就是，教育为工人阶級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針，教育必須由共产党領导。这个方針，是同資产阶級的教育方針針鋒相对的。資产阶級的教育，是由資产阶級的政治家領导的，是为資产阶級的政治，即为資产阶級专政服务的，是同无产阶級专政不相容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資产阶級不敢直接地公开地提出要教育受資产阶級政治家的領导，要教育成为反对无产阶級专政的工具，它只能提出‘教育由专家領导’、‘为教育而教育’的虚伪的騙人的主張，来达到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級专政服务的目的。所以在我們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資产阶級的教育方針表现为：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教育由专家領导。”

定一同志尖銳地指出教育（包括历史教育）战綫上两个方針两条路綫的斗爭問題。我們的教育是为工人阶級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无产阶級教育呢？还是所謂“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的資产阶級教育？不妨檢查一下我們历史教学的課堂教学情况和我們历史教师的教育指导思想。假若我們的教学是为工人阶級政治服务的，那末，我們就会时时刻刻注視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时时記住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爭；时时牢記政治挂帅，兴无产阶級思想，灭資产阶級思想。并且自觉地把这些思想貫徹到我們的教学目的中去，滲透到教学內容教学方法中去。事实上，許多事例說明历史教师不是多数人都能自觉地这样做。整风运动中学生貼出的大字报，不少是揭露历史教师的教学是“厚古薄今”、不联系政治的。經过交心运动、双反、教育思想檢查，許多历史教师認識到自己教育教学的目的方向是模糊的，有的则是違反了我們的教育目的和方向。

“为教书而教书，为講历史而講历史，不能使历史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思想还极为普遍。几年以来，历史教学指导思想的总来源，是苏联人民委員会和联共（布）中央在1934年5月16日通过和宣布的著名的“关于苏联各学校中教授本国历史”的决議。决議写道：“按照历史年代的次序講述历史事件，且使学生必須牢固地記忆着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和年代月日等，这是学生們能够切实領悟历史課程之决定的条件，只有这样的历史教程，才能保証学生們所必需的历史教材之易于理解性、明确性和具体性。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正确的分析和正确的总結历史事件（这都是使学生对历史走向馬克思主义的認識）才有可能。”这个指示是十分正确的，是指导編写历史和教历史課的馬克思主义的原則。但是，人們对于这一指示的理解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强調按年代順序講述历史事件，用此来反对对历史事件的正确分析和正确总結，不贊成使学生对历史走向馬克思主义的認識，更不贊成把历史知識中总結出的結論規律运用到现实的阶級斗爭中。拿他們

的話来說，这样做会損害历史教学的系統性，把历史課講成“政治課”。这样他們就把历史教学从为无产阶級政治服务的道路上引开，使之为資产阶級政治服务。事实正是这样。如有的教师在講授“同盟会的成立和它的綱領”这段教材时，没有进行分析总結，没有联系到兴无灭資的政治任务，只进行了客观的叙述，結果部分学生就引用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綱領作为例証，得出資产阶級立場也能認識眞理的結論，以維护自己的資产阶級立場。

直接宣傳資产阶級的思想观点，違反我們的目的和方向的事例在历史教学中也是存在的。一位过去堅持資产阶級立場，拒絕思想改造的教师，在檢查自己的教育思想时，說他怕斗爭，觉得不問政治明哲保身是处世妙术，对于不問政治裝糊涂的人，就极为佩服。他講到魏晋“清談”时，抓住課本上“有一种人，害怕在这种斗爭里，說話不謹愼，会招致‘杀身之禍’，就故意避开政治不談”一句話，大作文章。他补充了不少教材，講阮籍怎样借醉酒躲过杀身之禍，言下給阮籍以极大同情和贊揚，向学生推荐了裝糊涂逃避斗爭的方法。这位教师对他今天的处境也深感“今不如昔”，便在課堂上想方設法地向学生宣傳“今不如昔”的思想。他講到西汉前期的經济，国家的繁荣富裕，利用課本引用的汉书食貨志一段材料大加发揮，揭力描繪当时的富裕，并以“斗米三錢”来証明“国富民安”，使学生造成在封建帝王統治时代，人民的生活很好的錯觉，影射“今不如昔”。有的教师組織教材时厚剝削阶級薄劳动人民，歌頌了剝削阶級。如講南朝經济发展时，教师主要講述了北方地主如何南迁，如何生活，对劳动人民怎样把生产技术带到南边，怎样进行生产劳动則輕描淡写。結果在測問学生南朝經济发展的原因时，学生回答是由于北方地主南迁。这样便把南朝經济发展的功劳归入地主阶級的账上，歌頌了地主阶級。

联系现实阶級斗爭、生产斗爭来确定历史教学目的、編选教材、选擇教学方法使教学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問題，到現在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許多教师教学的公式仍然是“熟悉教材——找参考书——講清概念——巩固知識”。至于研究党的方針政策、政治任务和学生思想实际，在他們看来，还不是自己分內之事。一位講现代史的教师，在講完我党1942年的整风运动以后才想到可以联系現在的整风。有的教师在联系現实时，沒有把現实理解为阶級斗爭、生产斗爭，及其在同学思想上的反映，籠統模糊地認为是联系学生生活。对联系实际的目的則認为是“便于理解历史概念”。如有位教师在講郑和下西洋时，为了让同学理解当时郑和所乘船只的大小，就联系到球場，說“船有球場那么大，可以在上面踢球”，教师認为这叫做联系实际。至于教师留的課外作业中，很少要学生运用历史課概括出的結論、規律去認識現实，做社会調查，对当前事件和自己的思想进行阶級分析。

当然，几年来历史教学在党的領导下，在宣傳历史唯物主义，宣傳党的政治任务，在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等方面都起过很重要的作用，成績也是不小的。但是，我們也应該用定一同志的文章做武器揭露出历史教学上两条道路的斗爭，自觉地进行这一斗爭，使历史教学起到为无产阶級政治服务的作用。这是我們历史教学跃进的方向。同时我們也要看見社会主义教育只有无产阶級政党——共产党才能領导这一眞理。因此，我們認清了历史教学中两条道路斗爭的形势以后，还要緊緊地依靠党的領导，才能使我們的历史教学不断跃进，不断适合无产阶級政治斗爭任务和生产斗爭任务的要求。在党的領导問題上，定一同志的文章給了我們以极明确的指示。对于党的領导，历史教学、历史教师中存在的問題是什么呢？

定一同志的文章写道：“我們的教育工作者，还常常談‘教育工作应該受党的領导’，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社会主义的教育必須由共产党領导，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必須由中国共产党領导。但是，对于什么是領导，要什么样的領导，也有不同的理解。資产阶級教育家認为，所謂‘党的領导’，就是‘政治上由党領导、业务上由我領导’。”定一同志指出的这种情况也适合历史教师。

在这一次整风大辯論中，教师对党的領导一般在道理上是承認的，但具体到教育业务、教学业务方面，不少同志就認为“外行不能領导內行”，認为“党基层組織不懂业务，那就只能提出号召，不能抓关鍵，因而不能眞正領导业务”。这种說法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假想，是企图用专家領导来代替党的領导。定一同志的文章指出：“我們的教育工作者，不仅在政治上应該受党的領导，而且在教育思想、教育政策、教育业务等方面也应該接受党的領导，才能不落后于时代，才能少犯錯誤和不犯錯誤。”教育工作的实践有力地証明了定一同志的論断的正确。那些在教育政策、教育业务方面忽視党的領导的人，正是在教育工作中犯了錯誤的人，他們若不猛省就要落后于时代。

这次学生貼大字报揭发教师教育教学中的問題时，大字报正是集中在那些“有业务”不問政治、課堂教学堆砌史料不进行馬克思主义分析总結的教师。学生指責他們的課堂教学“沒有战斗性，感觉不出有什么教育作用”，表示不欢迎这样的課堂教学。学

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的神聖历史任务

史　群

最近，美帝国主义为了在中东継續侵略，拖延自黎巴嫩撤兵，轉移人們的視綫，又在台湾海峡地区制造紧張局势。美帝国主义不但揚言要継續霸占我国領土台湾和澎湖列島，并且制造借口，公然对中国人民进行軍事挑衅和战爭威胁，要把它在台湾地区的侵略范圍扩大到我国內海的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屿。这是对我国人民的严重挑衅，是对远东和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本年9月6日，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义正詞严的声明。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对盘据在沿海島屿的蔣介石部队給予坚决的打击和采取必要的軍事行动，任何外来的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惡行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領土台湾和澎湖列島的决心是不可动搖的，中国人民尤其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大陆內海中存在着象金門、馬祖这些沿海島屿的直接威胁。美国的任何战爭挑衅都絕对吓不倒中国人民，相反地，只会激起六万万人民更大的憤怒和更坚强的同美国侵略者斗爭到底的决心。如果美国政府悍然不顧中国人民的再三警告和世界人民的和平願望，継續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爭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美国政府必須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周恩来总理的声明表达了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一定要解放自己的領土台湾、澎湖列島以及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屿的决心，得到了全国人民一致的拥护和支持。不管美国的战爭狂人进行怎样无耻的狡辯和軍事威胁，他們决不可能抹煞历史事实和掩盖其侵略罪責，也不可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領土台湾、澎湖和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屿。

一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領土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領土。远在秦汉时期，在我国就有了关于台湾的傳說，“后汉书”上記載的“夷洲”、“隋书”上記載的“流求国”，指的就是台湾。在隋代，隋煬帝曾先后两次（607年和610年）派官吏到达台湾，这是見于史册記載的中国官吏到达台湾的开始。其后經过唐、五代直到宋、元，祖国大陆人民不断迁入台湾定居下来，和兄弟民族高山族人民共同开发这一宝島。到了元代，在1360年（元至正二十年），即在美国独立（1776年）的四百一十六年以前，元朝就在澎湖建立了巡檢司，管轄澎湖和台湾，台湾和澎湖正式成为我国領土的一部分。明代时，明廷为了防御日本丰臣秀吉的侵略，曾在1592—1597年（明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五年）派兵汛守台湾、澎湖。从那时起，台湾更成为祖国的国防前綫了。

十七世紀初，荷兰人和西班牙人曾先后侵入台湾，荷兰人侵占了台湾南部一部分，西班牙人侵占了台湾北部一部分。1641年，荷兰人打敗了西班牙人，把势力扩展到北部沿海地区。这是台湾第一次淪入外国殖民者的統治之下。1661年，郑成功率軍在台湾人民的支持之下赶走了荷兰殖民者，結束了三十八年的外国殖民統治，收复了台湾。到了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降清，清政府統治台湾达二百余年。直到中日甲午战后簽訂了馬关条約（1895年），卖国的清朝政府把台湾割让給日本，从此台湾

生的反应和这些教师平时自己的主观想象恰恰相反。在大字报浪潮洪鋒的冲击下，这些教师惊惶失措，甚至丧失了改进的信心，若是没有党的帮助，他們定会一敗涂地。

在教育思想，教育政策上接受党的領导，就是要时时刻刻自觉貫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針，培养学生成为旣懂政治，又有文化，旣能从事腦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即全面发展的人。为了适应这一要求，历史教学內容和方法都要做重大的改进。在內容方面首先要克服目前不少文章一再指出的厚帝王將相薄劳动人民的傾向，眞正体現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眞理。教师培养自己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使历史教学成为培养学生有正确的劳动观点，爱劳动人民的感情的陣地。其次在方法方面，我們要培养学生应用从历史課中概括出来的結論規律去分析阶級斗爭的事件和劳动过程中的事例，使学生懂得政治，获得全面的知識。

在教育业务方面接受党的領导，对历史教学来說

又被日本帝国主义統治了五十年。在台湾先后两次淪为外国殖民地的期間，台湾人民曾不断地进行了反抗外国統治者的斗爭。

抗日战爭胜利以后，台湾和我国其他被日寇侵占的土地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的开罗宣言中就明确宣布：“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爭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扩張領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剝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領土，例如滿洲、台湾、澎湖列島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又在波茨坦公告第八款中重新肯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須实施。”1945年9月日寇投降，同年10月我国接受了日本在台湾駐軍的投降，从此，我国正式收复了自己的領土台湾。

无可否認的历史事实表明，台湾是我国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甚至是美国侵略者也曾不得不承認的。美国政府不但在它参与签署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承認了这一事实，就是在此后的一系列声明中也是承認的。例如，美国国务院于1948年8月发表的“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中就承認：“台湾应归还中国。”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特別命令第二十八号“关于台湾的政策宣傳指示”中也承認：“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統杜魯門在他的声明中也說过，美国“承認中国对該島（台湾）行使主权”。同年2月9日，美国国务院就台湾問題答众議院外交委員会时，也还承認台湾自1945年起就已經“包括在中国之內成为一省”。但是，美国侵略者后来又背弃了他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和自己的声明，武裝侵占了我国領土台湾，把台湾变成它侵略中国和在远东制造国际緊張局势的基地。这是我們所絕对不能容許的。

二 美帝国主义对我国領土台湾的侵略

（一）近百年来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台湾的一貫阴謀：

美帝国主义对中国領土台湾垂涎已久，远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就开始了对台湾的侵略活动。它的最初意图是想直接占領。1854年美国远东艦队司令皮雷率軍艦两艘侵入台湾，在基隆登陆并进行了物产調查和軍事測量以后，曾建議美国政府占領台湾，把台湾作为美国对中国和对远东各国进行侵略的基地。这是美国企图侵占台湾的开始。1857年美国駐华代办巴克也曾几次建議美国政府侵占台湾，他并制定了一套夺取台湾的阴謀計划，后来由于美国与英法之間有矛盾和美国的海軍实力不足，沒有实現。1867年，美国曾經借口七名水手被杀事件派軍艦攻入台湾，进行軍事挑衅，結果被汉族人民和高山族人民联合击退，沒有得逞。

美国在直接軍事行动失败之后，就轉而采取支持日本夺取台湾的政策，企图假手日本在台湾分得利益。1874年，以美国退职領事李仙得为首的外交軍事人員参加了日本侵略軍对台湾的进攻。当日本因兵力不足而与中国議和时，美国又出面調停，作了有利于日本的协議，从始至終充当了日本的帮凶。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爭期間，美国又在外交上大力援助日本并在馬关条約的談判过程中，帮助日本夺取了中国領土台湾。美帝国主义本来以为这样就可以从中取利，但不料日本在夺得台湾以后却竭力阻止美国插足，使它的願望沒有实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美帝国主义所以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中承認将“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領土，例如滿洲、台湾、澎湖列島等，归还中国”，是有原因的。其一，太平洋战爭初期，美英在远东的势力受到严重的打击，許多殖民地象秋风扫落叶似地被日本攻占去了，美英感到在东方必須依靠中国人民的对日抗战来撑住战局，因而对中国人民不得不作某些让步。其二，美国認为把台湾“归还”当时的中国統治者蔣介石集团就等于掌握在自己手中，因为它幻想战后中国将是蔣介石集团控制下的美国独占殖民地。

就是要在課堂上体現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的領导。目前历史教学中唯心主义观点还是存在的，它的主要表現就是强調个人作用，特別是帝王將相在历史中的作用。如有的历史教师講宋代文化时，籠統抽象地講由于宋代經济的发展所以文化也能繼續发展而有极大的成就，可見文化的成就是劳动人民努力生产的結果。但是具体到分析文化成就时就講繪画的成就，就講宋代各皇帝都非常喜欢繪画，設有画苑，用很优厚的待遇豢养些画家，宋徽宗本人画的就很好。結論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繪画的成就还是由于皇帝的爱好。有的教师講到唐的对外战爭，把胜利的原因归为唐朝的府兵制和唐太宗的外交政策好。

定一同志的文章內容是极为丰富的，需要我們去深入学习，領会它的精神实質。我們已經取得整风的全胜，在形势的鼓舞下，个个教师干劲十足，定一同志文章的发表給了我們方向，无疑地会推动教育事业的大跃进，让我們掀起一个学习定一同志文章的高潮，高举无产阶級教育紅旗前进！不斷前进！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美帝国主义就想把台湾作为在太平洋上反苏反共的基地而納入“太平洋防御体系”之內。不过由于蔣介石集团还控制着中国大陆的大部分，美帝国主义仍然幻想通过它来消灭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因此当时它的主要目标是奴役整个中国，而不仅仅是台湾一省。当然，美国并没有放松侵占台湾的阴謀活动。1945年10月，以协助中国受降为名，派海空軍先蔣軍进駐台湾，接着就为蔣介石集团在台湾組織、准备和訓練进行內战的新軍。1947年到1948年間，通过“中美海軍协定”等，先后在台湾建立了許多海軍基地和空軍基地，美国的“联合軍事顧問团”也派出大批現役軍官常駐台湾。在經济方面，通过所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約”以及后来签訂的美蔣“共同开发”台湾的协定和其他經济侵略机构，控制了台湾的經济命脉。实质上台湾已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軍事基地了。

1947年到1948年間随着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高漲，中国政治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帝国主义一方面繼續支持蔣介石集团在中国大陆作垂死的挣扎；另一方面为了保持它在台湾的战略基地，在台湾也加强了軍事侵略活动。同时，它又进行了“托管”台湾和台湾“独立”的政治阴謀活动，准备在蔣介石集团全面垮台时，当做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工具。为了实現这一阴謀計划，美国特务于1948年春在日本利用汉奸廖文毅等組織了一个“台湾再解放联盟”，年底在香港又組織了一个“台湾民主国筹划委員会”。这一活动的策划者就是美国国务院和战争罪犯、駐日“盟軍总司令”麦克阿瑟。1949年3月，麦克阿瑟为了給美帝国主义侵占台湾制造“合法理由”，配合所謂“台湾独立”运动，公然蔑視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发出了“在对日和約签訂之前，台湾仍属于盟軍总部”的荒謬声明。这个声明充分暴露了美帝国主义企图并吞中国領土台湾的野心。

（二）新中国成立后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台湾的侵略：

1949年中国人民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偉大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全部中国大陆获得解放。蔣介石集团逃到台湾。美帝国主义感到它在中国的殖民地統治很快就要結束了，因此它就急欲直接攫取台湾，以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在美帝国主义的心目中，台湾是从日本到印度支那半島的所謂“战略鏈鎖”中的一个重要据点，可以作为将来对中国大陆发动侵略战争的跳板；蔣介石集团也幻想托庇于美帝国主义的軍事保护下，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待机“复辟”。

为此，美帝国主义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驟，就是巩固蔣介石集团在台湾的統治，因而它便在1949年11月同蔣介石締結了秘密軍事协定。美帝国主义供給蔣介石集团以大批武器、裝备、軍艦和大量撥款，并規定必要时可以用請求联合国出兵为名，由美帝国主义直接占領台湾。美帝国主义从蔣介石集团手中換取的条件是：改組台湾“政府”，由其寵信走狗掌管台湾的政治軍事；美国政府派遣軍事代表团駐台，該代表团派遣各种顧問控制台湾“政府”的各种机构，掌握台湾的全部軍政和經济。这就是說通过这一协定，美帝国主义掌握了对台湾的全部軍事、政治、經济的控制权。

美帝国主义侵占台湾的第二个步驟，就是直接进行公开的武裝占領。1950年6月27日，在发动侵略朝鮮战爭的第三天，美国总統杜魯門便借口朝鮮战爭命令美国第七艦队协助蔣介石集团，武裝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杜魯門并在其声明中揚言：“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約的締結，或联合国的考虑。”这就是說，美国想以这几种借口来永久地霸占台湾。

美帝国主义在武裝占領了我国領土台湾的同时，又千方百計地否定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为其侵占制造“合法理由”。除了在杜魯門的声明中制造的理由外，它并于1950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所謂“台湾未来地位”案，想利用討論来延緩台湾的解放，同时力图使台湾問題“国际化”，以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規定，联合国是无权干涉任何国家內政的，台湾是中国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它无权考虑台湾地位問題。在会上，由于中国特派代表的堅决反对，由于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堅持正义立場，由美于帝国主义与其仆从国家存在矛盾，結果美国提案被无限期地延擱下来，使美帝国主义的阴謀遭到了失敗。但是美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它又企图通过对日和約来达到这个卑鄙的目的。它在对日和約备忘录中提出“条約生效后一年以內不能获得决定时，則由联合国大会决定之”的謬論，經中苏两国政府質問后，美帝国主义又在1951年3月29日提出的对日和約草案中規定，“日本放弃对朝鮮、台湾及澎湖列島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而不規定台湾应属于誰。我国周恩来外長发表声明揭露其阴謀，苏、波、捷等兄弟国家在旧金山会議上揭穿其阴謀，并拒絕在和約上签字。印度和緬甸也拒絕参加会議。旧金山的片面和約不为中苏和有关的东南亚主要国家所承認，它是完全非法的，无效的。

美帝国主义武裝霸占我国台湾本来是以朝鮮战爭为借口的。朝鮮停战以后，美国为了寻找一个新的借

口，便在1954年12月同蔣介石集团非法签訂了美蔣的所謂“共同防御条約”。美蔣“共同防御条約”是蔣介石卖国集团的一張卖身文契，它規定美国軍队可以自由占領中国任何領土，并狂妄地規定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和澎湖就是危害了美国的“和平”和“安全”，美国就要出兵干涉。事后美蔣还分別声称締約区域可以扩大到台湾、澎湖以外的中国領土。这一条約的签訂，彻底地暴露了美帝国主义想永久霸占台湾的罪惡企图。

1955年美国国会根据美国总統艾森豪威尔的国情咨文，通过了一項决議，授权美国总統使用美国武裝部队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澎湖，并規定活动的范圍可以包括台湾、澎湖以外的“有关的陣地和領土”。这一項决議說明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已經狂妄到无可掩飾的程度。

美帝国主义和蔣介石集团签訂的任何所謂条約和美国国会所通过的任何有关决議，对中国人民来說都是完全非法的、无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利益。蔣介石集团是被中国人民赶出大陆的一具为人民所唾弃的政治僵屍，根本代表不了中国人民，更沒有任何权利同任何国家签訂任何条約。至于美国国会，它也无权通过这种違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干涉别国內政的决議，它的这个决議除了更暴露美帝国主义的凶惡面目外，是不能为美国侵略者侵占我国領土台湾提供任何合法根据的。

美帝国主义除了想通过美蔣“共同防御条約”永久霸占中国領土台湾、澎湖和其他島屿外，同时还把它作为在远东制造緊張局势、实行“战争边緣”政策的侵略活动的一个組成部分。美帝国主义还通过它和其他国家所签訂的双边和多边条約，如“美日安全条約”、“美菲联防条約”、“美澳新三国安全条約”和美李“共同防御条約”，以及“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約”等，把它的这些仆从国家联結起来，构成一条自杀的絞索。美帝国主义执行这种侵略政策和战爭政策在远东制造緊張局势，迟早是要自食其果的。

（三）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阴謀的破产和新的軍事挑衅活动：

远东的緊張局势本来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所造成的。由于中国、苏联、朝鮮、越南的努力，1953年7月朝鮮停战协定签訂了，1954年6月日內瓦会議以后印度支那的和平恢复了，远东局势稍趋緩和。为了进一步緩和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緊張局势，我国周恩来总理曾于1955年4月23日在万隆会議上发表声明，表示願意和美国政府坐下来談判。于是就产生了从1955年8月开始的中美大使級会談。这說明中国政府是眞誠願意按照和平共处五項原則来解决国际爭端的。但是美帝国主义却抱着另外一种意願来参加这个会談。在1956年4月19日的会議上，美国方面提出一个协議声明草案，在这个草案中，不仅要求中国承認美国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侵占中国的領土台湾和干涉中国解放沿海島屿的现狀，而且还要求中国承認美国在台湾地区有所謂自卫的权利，承認美国武力侵占台湾是合法的行为。对中国方面提出的眞正有助于解决問題的积极建議却不加考慮。这样，就使得会談在中美关系的主要問題上不能取得任何进展。

美帝国主义在中美会談中堅持要中国承認它霸占台湾的现狀，是同它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謀分不开的。

“两个中国”是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节节失敗后所采取的一个新的阴謀。中国大陆解放以后，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敗，曾經企图从朝鮮、印度支那、台湾三个方面来扼杀年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經过了几年的严重較量，朝鮮战爭停止了，印度支那的和平恢复了，新中国在一天天地发展和壮大，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可能性一天天地在增長。另一方面，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影响和作用日益扩大和深入人心，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联合国中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合法权利的国家也年年在增多。而美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台湾的非法行为和敌視中国的态度，却遭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內人民的反对，使自己处于越来越孤立的地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美帝国主义就采用制造“两个中国”的新阴謀，企图継續侵占台湾以便于保持和制造远东緊張局势。它想利用中美大使級会談来实现这个阴謀，这当然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許的；而它策划的“台湾独立国”阴謀也早被中国人民和政府所揭穿。在这种情势下，美帝国主义就另辟途徑，采用更为狡猾的方式，想在某些国际会議和国际組織中安排“两个中国”的圈套，以便在国际上逐步造成旣成事实。远者不談，1957年10月，在印度德里举行的第十九屆国际紅十字大会上，美国公然提出要討蔣介石集团分子冒充中国代表参加会議，以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中国代表团在会上表示了严正的抗議后立即退出会場，并得到苏联、印度和其他許多友好国家的政府代表团和紅十字会代表团的正义支持。会議虽然在美国压力下通过了这項提案，但一百三十五票中，其中有七十三票直接間接不同意美国的荒謬提案，而同情和支持我国的严正立場。这次斗爭給了美国以沉重打击。1958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員会在美国主席的把持下，蓄意違反自己的庄严的宪章，在承認中

国唯一合法的奥委会外，竟又承认台湾蒋介石集团的一个体育組織为另一个中国奥委会，企图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为此，中国奥委会已經正式声明决定不再承認国际奥委会，并且断絕一切联系。正如周总理所說的，“不管这个阴謀在什么場合，以什么方式出現，我們絕不允許这个阴謀得逞。中国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美帝国主义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謀已彻底破产，这在美国国务院1958年8月11日发表的备忘录中已不打自招了。但是美帝国主义是不甘心失败的，在同一个备忘录中，它表示将仍旧坚持不承認中华人民共和国、継續敌視中国人民的态度。它唯恐一旦放弃了对台湾的侵占，承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使它在远东的侵略政策和战爭政策彻底垮台，就更加不好控制和操縱联合国这一个国际組織了。因此，在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謀破产之后，它又在台湾海峽地区对中国人民进行新的軍事挑衅和战爭威胁了。

这些年来，美帝国主义不但用武力侵占了我国的領土台湾和澎湖列島，并且支持蒋介石集团以我国內海的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屿作为前哨据点，經常破坏我国沿海的交通，扰乱沿海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并且派遣特务破坏分子潜入內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廈門和福州两个港口的安全更受到直接的威胁，对外航运經常受到襲击。特別是在美国发动对中东的侵略以后，蒋介石集团在美国支持下，从金門和馬祖等沿海島屿加紧了騷扰活动，并且一再叫嚷“相机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这是中国人民絕对不能容忍的事情，因此，中国人民解放軍对盘据在金門的蒋賊軍給予了沉重的打击。这是完全必要的和正当的，是属于中国內政范圍的事情。但是美国侵略者在对中东的侵略遭到全世界的譴責之后，为了轉移全世界人民的視綫，拖延从黎巴嫩撤兵，竟又借机制造借口，在台湾海峽地区扩大侵略范圍，制造紧張局势。它大量集結武装力量，从本国和地中海調来了大批軍艦、飞机，加强在台湾海峽地区活动的第七艦队；自9月8日开始，又与蒋介石集团在台湾南部联合举行两栖登陆演习；同时，它的軍艦还直接参与了蒋介石集团向盘据在金門的匪軍运送补給的护运工作，侵入了我国內海。美国侵略者的这些活动，是公然对中国人民进行軍事挑衅和战爭威胁。不但如此，美帝国主义为了給它的侵略活动进行辯护，在今年9月4日，由美国总統授权国务卿杜勒斯发表了一篇荒謬声明，揚言要把它在台湾地区的侵略范圍扩大到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屿。杜勒斯硬說台湾和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屿“从来沒有”属于我国的管轄之下；我国人民解放这些島屿的任何尝試都是“粗暴地破坏作为世界秩序基础的原則，即：任何国家不应使用武装力量来夺取新的領土”；“美国負有条約义务来帮助保卫台湾不受武装进攻，国会的联合决議授权总統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象金門馬祖等有关陣地”。按照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的邏輯，似乎美帝国主义武装占領我国領土台湾和其他沿海島屿倒是旧有的世界秩序基础，而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領土台湾及其他沿海島屿倒是夺取新的領土；美帝国主义可以根据非法的无效的“条約”和“决議”来占据中国的神聖領土，而中国人民倒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宪法和法律恢复行使对自己領土的主权。这种奇談怪論也只能出自于侵略者之口。这一系列言論和行动只能說明美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領土台湾的野心已經达到瘋狂的地步，它的作用不是吓倒中国人民，相反，这只会激起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更大的憤怒和更坚强的同美国侵略者斗爭到底的决心。

美帝国主义的一貫伎倆是把中美在台湾海峽地区的国际爭端和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領土台湾的內政問題混淆起来，以掩盖它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这是絕对不能容許的。台湾及其他沿海島屿是中国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台湾及其他沿海島屿是中国人民神聖的解放事业的一部分，不容許任何外国干涉，至于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时候，更不容許任何外国过問，这完全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中美之間在台湾海峽地区的国际爭端是由于美国的武装干涉而引起的，唯一解决問題的办法是美国侵略軍退出台湾海峽地区。美国侵略軍一日不撤退，台湾一日不解放，就是对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威胁，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和平建設的严重威胁。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的長期存在。

三　我們一定要解放台湾

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神聖的历史任务。正如周总理在9月6日的声明中所郑重表明的，“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領土台湾和澎湖列島的决心是不可动搖的”。在过去的九年中間，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之下，継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之后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胜利，在国家的各項建設事业方面也已取得了偉大的成就。特別是在过去一年中間，經过偉大的全民整风运动，我国的各个方面都形成了大跃进的形势，我国人民正以“一天等于二十

年”的速度建設着自已的国家。我們不仅有决心，而且有力量解放自己的領土台湾、澎湖列島和其他沿海島屿。

美国战爭狂人在台湾海峽地区的軍事挑衅是吓不倒中国人民的。在解放战爭时期，中国人民解放軍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靠了“小米加步槍”，就打败了全副美式装备的几百万蔣介石的軍队，把蔣介石集团連同支持它的美帝国主义者一同赶出了大陆。在朝鮮战場上，中国人民派出的志願軍又同朝鮮人民在一起，打敗了美国侵略者。現在，如果美帝国主义胆敢把战爭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那末，等待着侵略者的将是更沉重的打击和更徹底的失敗。

我国人民維护国家主权反对外国干涉的斗爭并不是孤立的。在我們的背后，有着强大的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自从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峽地区进行軍事挑衅以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各国就对中国人民表示了积极的支持。苏联部長会議主席赫魯晓夫在9月7日致美国总統艾森豪威尔的信中明确地宣告：“对我国偉大的朋友、盟邦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忠于自己义务的我国，将尽一切可能同人民中国一道来維护两国的安全、維护远东和平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这是对我国人民的有力支持和对美国侵略者的严重警告。蒙古、保加利亞、匈牙利、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府发表了声明，朝鮮金日成首相、越南范文同总理、蒙古部長会議第一副主席曾德、保加利亞于哥夫主席、罗馬尼亞部長会議主席斯托伊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一副总理烏布利希、波兰統一工人党第一书記哥穆尔卡、阿尔巴尼亞部長会議主席謝胡、匈牙利的国务部長馬罗山、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副总理杜兰斯基，都先后发表了談話，支持我国人民的反侵略斗爭。

我国人民的正义斗爭还得到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声援和同情。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統納賽尔說：“当中国人民要实現他們的願望和保有他們的全部領土时，就发生了帝国主义的軍事干涉。眞正的干涉是台湾遭到侵占。”印度总理尼赫魯指出，台湾和沿海島屿应属于中国。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認为把沿海島屿归还中国是“合理的，对和平有利的”。非洲人联盟表示，“非洲大陆人民支持偉大的中国人民为收复被占領的領土而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爭”。阿联、伊拉克共和国、黎巴嫩、印度、印度尼西亚、緬甸、柬埔寨、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国的报紙、电台以及群众团体，紛紛对中国人民的斗爭表示支持。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学联代表大会的拉丁美洲各国的代表和观察員，也带来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对我国人民的声援。

与中国人民这种得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和同情的情况相反，美国侵略者则是非常孤立的，在它的那些“盟邦”中，除了一个李承晚之外，也沒有人願意支持美国在台湾海峽地区的軍事冒險；就是在美国資产阶級內部，也正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这一軍事挑衅活动而吵嚷不休，美国侵略者的这种孤立情况，連杜勒斯也不得不在9月9日的記者招待会上被迫承認。

总之，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当前国际形势下，在我国空前强大和我国人民决心为解放自己的領土台湾和其他沿海島屿而斗爭的情况下，美国侵略者的軍事挑衅和战爭威胁是注定要失敗的。毛主席9月8日在最高国务会議上的講話中說：“中国領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軍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絞索的另一端交給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的头上的絞索就将越紧。”如果美帝国主义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蛮干下去，它就一定要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周总理在9月6日的声明中郑重指出：“如果美国政府悍然不顧中国人民的再三警告和世界人民的和平願望，繼續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爭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美国政府必須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对美国侵略者的严重警告。我們一定要解放金門、馬祖！我們一定要解放台湾！我們全国人民要更加鼓足干劲，加强各方面的工作，随时准备响应祖国的召喚，为解放我国的神聖領土而貢献自己的力量。美国侵略者的任何挑衅和威胁，都不能阻止我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領土台湾、澎湖列島和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屿。



王朝体系必須打破

——修訂中国古代及中世紀史教学大綱的一些体会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陈繼琨 王質瑛 伍步良

我校历史系在这次教学改革中，在中国古代及中世紀史教研組，打破旧大綱的王朝体系，被列为一个主要的努力目标。因为不打破王朝体系就不能很好地体現历史发展的規律，不能体現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不能体現中国史是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从而我們也就无法在自己的教学工作中貫徹"兴无灭資"、"厚今薄古"的方針，不能使历史科学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一

我們在制定教学大綱的过程中，发現中国古代及中世紀史旧大綱王朝体系的缺点之一，是以王朝的兴亡始末作綫索，有的甚至把历史处理为似乎是若干偶然事件的堆积。这說明，解放几年来的馬列主义学习和不断思想改造，我們的教师虽然主观上并没有想把自己的教学內容講成为王朝兴亡史，但是，千百年来封建正統王朝观念的影响是很深的，它在人們的头腦中还是"阴魂未散"。我們的旧大綱，不少地方直接以王朝的名称作章节的标題，例如"三国鼎立"、"西晋"、"隋"等。并且細目的編排，某些王朝也是有头有尾，自成起迄。例如"汉始建国"、"汉帝国的再建"、"汉帝国的瓦解"之类，連系起来，就使人感到是那么念念不忘两汉的兴亡。在这样的大綱中，首先，两汉时期基本社会經济制度没有被重視，譬如說，没有土地占有制度的子目。关于西汉初年的經济情况虽有"生产力的恢复"一目，但講义內容，极为简略，并且論述的目的性与其說是为了說明社会經济的进展，倒不如說只是后来"武帝初年汉帝国已是一个富庶的大帝国"的張本。其次，阶級斗争的形势也没有得到正确的表述。譬如武帝晚年到昭帝初年，汉帝国的阶級关系曾一度紧張。但是講义对当时相当普遍的农民起义竟然只字不提，相反地却引用了"太山有大石自立起，上林有柳树枯僵自生"等迷信灾异的資料，强調說："这就是社会問題，是統治权动搖的表現。"并且，本段的标目是"昭宣时期阶級矛盾的暂时緩和"，而前此的标目还是强化中央集权、統一币制、水利灌溉事业发展等等，把汉武帝統治的全部时期都描繪成"盛世"。先不說問題的提法是多么不恰当，只就前后两段的史料来对比一下，从"盛世"到"动搖"之間空了一块。尽管講义提一句这时"社会仍是动蕩不安的"，而"仍"字的根据則不充足。由此可見，正是由于旧大綱的王朝体系，以王朝的兴亡为綫索，而没有对社会生产方式特征、阶級斗争形势予以足够的注意，闡述它們的发展始末及其辯証关系，从而历史現象乃至宫廷事件的堆砌，阻碍了或代替了历史規律的論述。正如一位教授所說："过去我不講王朝兴亡，就好象少說了什么大事，前后历史連接不起来似的。"同学們在大字报上也揭露，中国古代及中世紀史一課的某些部分給他們的印象是："缺乏馬列主义观点的分析，只是帝王皇朝的更替过程及瑣碎史料的拼湊……一点也体現不出学这段历史对掌握社会发展規律，指导現实斗争的意义。"教授的自我批評和同学們的尖銳指責，确实击中了王朝体系的要害。严格地說，我們过去的历史教学，科学性是不强的，战斗性是没有的，没有貫徹教育为政治服务的方針。我們長期没有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乃是一种未曾覺察到的、无形的、然而却是很大的浪費。

二

过多講述帝王将相及其他統治阶級人物的活动，是王朝体系的又一个缺点。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給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創造者作用以科学的論証。但是，我們的旧大綱在王朝体系的籠罩下，势必使統治阶級人物占据了不适当的地位和不必要的篇幅，障碍了上述論証的发揮。在我們的旧大綱中，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都独立成节，其下是“帝国規模的創建”、“帝国的扩張”、“經济情况”，乃至农民起义等子目。这样，不光一些不必要的帝王的即位时間、年龄、什么人拥立等浪費了笔墨，而且以帝王个人来总括一个历史时期，就导致把这一时期历史都写成为似乎是帝王們的事迹。这显然是英雄創造历史的資产阶級观点，它跟在現代条件下，同样为資产阶級观点的正統王朝观念是一致的。我們的講义中有这样的話：”在隋文帝的努力下，社会經济、人民生活、国家財富，都是向上发展的。”“明太祖得国”、“有国家”的詞儿也居然出現在講义的正文中，甚至以朱元璋的評价作为明初历史的总結。同学們在大字报中批評說：“这是把隋文帝个人的作用提到了唯一无二的地位。”青年教师也以“一篇充滿对朱元璋个人崇拜的‘結語’”为題，貼了大字报。与帝王的成败相連系，什么专政啦，擅权啦，朋党之爭，分权集权之爭等等講的过多，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先是阶級斗爭講的不够。我們知道，阶級斗爭为了改变生产方式，为了推翻腐朽的生产方式和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即为根本地、革命地改造整个社会制度，在阶級社会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但是我們不只没有注意到人民群众要求改善生活的經济斗爭，譬如說把历代劳动人民的戶口逃亡、逃避賦稅等有意識地处理为阶級斗爭，并且对于农民起义也講的很差。农民起义占的分量少，对特点、作用的分析不突出，特别是历代农民起义的継承性，中国农民起义的傳統和发展，簡直一点也没有。正如同学們所說，在我們的講义中，“这是次要的，是演配角的，講人民起义是为了說明王朝兴亡的原因，当它完成了这个任务以后就赶出舞台了”。其次，人民群众的生产斗爭，及其对于社会生活的巨大創造作用，也講的不够。我們講到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的地方不少，然而多是只从統治阶級的政策措施一个側面来闡述，甚至連劳动人民辛勤創造的概括性字句也没有。这不能理解为只是材料不足的緣故，而是教师們在学术上的資产阶級立場和观点在作祟。馬克思說：“历史上的事业和思想，都是群众的事业和思想。”如果根据这个标准来檢查我校过去中国古代及中世紀史的教学內容，究竟我們講述了多少人民群众的历史，那么王朝体系的根本缺点就更加暴露无遺了。

三

被視为“正統”的王朝大都是汉族統治者建立的，少数是少数族統治者在汉族聚居地区建立的。王朝史既然以这些王朝为中心，便不只不能很好闡述汉族人民群众的历史，并且更缺乏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的历史。往往只是当少数族跟汉族发生了明显的关系，特别是战争关系时，前者才被当作中国史的內容而提及。并且在提到少数民族时，也多强調他們文化落后、經济落后的一面，而很少說到他們艰苦开发边疆、特有物質生产和优秀傳統的一面。于是，各少数族的历史发展，他們相互間以及他們对汉族的有益影响和帮助被抹煞了。中国各民族以融合为主流的历史关系，在实际講述中被冲淡了。在这方面，同学們在大字报上举出中学課本跟我們的課堂教学作了具体的对比。他們說：“对各边疆民族与汉族关系上，多講战爭关系，文化、經济交流則講的很少，甚至有时没有講。象宋遼的和平往来——互市关系，在中学課本里就十分强調，而我們没有講到。”这不符合师范大学面向中学的教学方針。更重要的是，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不符合党的民族团結友好互助政策。我們說，中华民族具有勤劳勇敢的优秀傳統，是包括以汉族为主的中国境內各民族在內的。我們偉大的祖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的壯大，本身就是各族長期融合的結果。边疆各少数族聚居地区，也很古以来就有汉族人民在那里生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是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的历史，王朝史体系阻碍我們恢复祖国历史的固有面貌。

四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由于王朝体系的緣故，我們过去的历史教学存在着多么严重的原则性缺点。这跟教师們政治思想狀况是密切关联的。

双反运动中大字报的烈火、向党交心、自我檢查，使得教研組的成員受到很大的教育，政治認識得到提高。他們触目惊心地看到，資产阶級抱殘守缺思想为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如何巨大的损失，迫切要求在教学工作中政治挂帅，拔尽白旗，插遍紅旗。党委在教育大改革的动員报告中，号召教师遵循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精神，发揮

敢想、敢說、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积极投入到教学改革中去。并且具体指出："文史学科的改革是革命問題，是根本改革的問題。"同时党委还决定組織同学們参加教学大綱討論修訂工作。这是一支教师們原来没有估計到的生力軍，大大有利于加速工作的进程和提高大綱的質量。采取这种方式制定大綱，就是业已被肯定为先进經驗的党委、教师、学生三結合。

在党的領导下，师生合作，在这次修訂大綱工作中，旧大綱的王朝体系被突破了。新大綱是根据社会发展分期，以社会生产方式为标准修訂的。各編的安排也是明确的。如第一編原始社会，第二編奴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分为初期、成長期、发展期、末期四編。这是新大綱的基本綫索。少数民族以及各族关系的历史，都給以应有的地位。新大綱章节中，社会經济制度和人民群众生产斗爭的项目也有显著的增加。意識形态部分，尽可能安排得跟經济基础緊密連系，标目的战斗性也尽量明确。特别是新大綱中有不少批判资产阶級学說和右派言論的标目，貫徹了在历史科学領域內堅决进行两种文化两条道路斗爭的精神，使紅旗更加鮮明了。为了具体說明新旧大綱的不同，試将同属秦汉时期的章节，举例对比如下：

旧大綱：

第二編　古代的中国（下）

第二章　秦和西汉盛世

第一节　秦始皇（子目略，下同）

第二节　汉始建国

第三节　汉武帝

第四节　秦至汉中叶的文化

新大綱：

第三編　封建社会初期（公元前五世紀到公元三世紀初）

第一章　封建关系的形成（节略）

第二章　統一帝国的出現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統一帝国（子目略，下同）

第二节　第一次农民大起义

第三章　公元前二世紀前汉族以外中国各族人

第一节　匈奴人

第二节　越人和居住西南地区的各族人

第三节　新疆地区各族人和他們所建立的国家

第四章　强盛的汉帝国（节略，下同）

第五章　公元前五世紀到前一世紀的文化

第六章　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后二世紀的阶級矛盾和人民大起义（以下各章略）

对比說明，在修訂教学大綱的过程中，大破大立的迹象是明白的。新教学大綱比旧教学大綱大大跃进了一步，这些成績是在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社会主义革命、批判资产阶級史学观点的基础上获得的。这是当前文化革命高潮中党的事业的胜利，是两条路綫斗爭中无产阶級思想的胜利。这是在党的領导下，堅决貫徹教学工作走群众路綫的政策而取得的。

1906年的萍瀏醴大起义

涤　塵

一　起义前夕萍瀏醴地区阶級斗爭的尖銳化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对我国侵略的步步深入，湖南、江西地区的經济生活亦发生了巨大的震蕩。萍乡安源煤矿的开办（1898年）、岳州与長沙的相繼开埠（1899年、1904年）、萍株鉄路的通車（1905年冬，萍醴段通車于1902年）等等，就是其中的几个主要标志。

在这种情况下，日益成長起来、并且接受了戊戌維新失敗教訓的资产阶級分子，更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斗爭。从1904年华兴会成立的时候起，湖南革命党人就曾謀利用湖南、江西特别是萍、瀏、醴地区的会党在長沙等地起义，但不幸謀泄事敗，会党首領馬福益被捕遇难。

1905年，孙中山領导的同盟会成立以后，即派遣了大批会員回国活动，1906年春，湖南留日学生刘道一和蔡紹南便受委托回湘"运动軍队，重整会党"①。

刘道一等回長沙后，便召集党人数十人密商革命进行的方略。会議决定"以会党和軍队同时并举为上策"，而以会党发难，軍队响应为"次策"，并且明

① "刘道一傳"，見"革命先烈傳記"，第263頁。

白指出。"今欲規取省城，必須集合会党于省城附近的萍、瀏、醴各县，与运动成熟的軍队联合……。"①换句話說，会議确定了以萍、瀏、醴地区为发动起义的主要地区，并且以該地区的会党为主要的运动对象。会后，党人四散活动，刘道一留駐長沙，負責与东京同盟会总部联系；蔡紹南则往萍乡一带活动。蔡到萍乡时，即与同盟会湖南分会会長禹之謨的学生魏宗銓（魏后来亦加入同盟会）合作，很快就和萍、瀏、醴地区会党各派首領取得了联絡。

当时萍、瀏、醴地区的会党大致可分三派，即哥老会、洪福会（洪福齐天党）与武教师会。武教师会中的龙人杰、陈仁初、饒有寿、万木匠、沈益古、廖叔保等各有門徒数百人；哥老会之龔春台、李金奇、馮乃古、肖克昌、邓廷保以及洪福会之姜守旦等拥众尤多，各达数千人。会党人数虽众，但各派分立，不相統属。針对这种情况，蔡紹南、魏宗銓便首先邀集了哥老会与武教师会头目百余人在萍乡之蕉园举行秘密会議，公議立"六龙山"，号"洪江会"，設总机关于萍、瀏、醴交界之麻石，以上栗市全胜紙笔店为招待会友、筹划經費之所，公推龔春台为大哥，下分文案、錢庫、总管、訓練、执法、交通、武庫、巡查，是为"內八堂"；又設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路碼头官，是为"外八堂"；并設"紅旗"司下級組織；"跑风"司偵察通訊②。自此，会党的活动更为活跃，矿工群众与农民紛紛加入洪江会，"不数月間势力已蔓延到萍、宜、分、万、瀏、醴各县"③。

恰好这年春夏長江中游各省发生严重水灾，萍、瀏、醴地区的飢民更踊跃加入洪江会，迫切要求起义。

在这种形势下，7月，龔春台、蔡紹南等召集各路首領会議于萍乡县属之大嶺下彈子坑慧历寺，通过了几項迎接起义的具体决定：（1）派余为璜、邓坤在高家台密造火药軍械；（2）派魏宗銘急筹款五千元作購买軍械火药之用；（3）派胡友堂、邓廷保联絡尚未加入洪江会的哥老会大头目馮乃古与洪福会首領姜守旦；（4）派蔡紹南、魏宗銓往滬、港、粤等地联絡各地革命机关，并往日本东京同盟会总部报告組織經过，要求接济軍械，請示举义日期④。于是，革命群众与地方官紳間面对面的斗爭便逐步开始了。

当时萍乡一带，会党聚集，群情激动，謠言蜂起，傳說"天下即将大乱，将有英雄剷富济貧"⑤等語，到10月初，当中秋节麻石庙会期間，每天聚众达万人，人群喧嚷，謠言更大，竟有揚言"洪江会即日起事"者。三县官紳大为惊恐，乃密派防营突襲麻石。会党群众猝不及防，遭到部分損失。第三路碼头官李金奇殉难，时蔡紹南与魏宗銓正行至上海，聞訊立即赶回，聚众議决于阴历12月底分三路举事：一据萍乡安源为根据地，一据瀏阳、醴陵进攻長沙，一由万載、宜昌东出瑞昌、南昌进攻江南。这样，革命群众与地方官紳之間的斗爭便进一步尖銳起来。

10月21日，李金奇之副手張折卿亦在醴陵被捕。張折卿曾在萍乡一带活动，深得矿工群众的爱戴，他被捕的消息一傳到萍乡，立刻在矿工群众中引起反响，并"集議，謀劫醴獄出張折卿"，一时"火車客票，数倍往常"⑥。醴陵官厅聞訊大为惊惶，乃一面立即电省請将張折卿正法，以絕矿工謀劫醴獄之念；一面又通电萍矿当局，以共同加强防范。

10月26日重阳节，会党与矿工群众（事实上矿工亦多是会党）又在上栗市栗江书院公开举行李金奇追悼大会。10月30日，萍乡东北萍实里地方，发生会党"聚众別开山头情事"⑦。

到11月中旬以后，萍、瀏、醴地区的革命形势进入了起义的爆发阶段。11月中旬，瀏阳会党聚集于上东張坊一带，約期于11月29日起事，被官軍驅散。

11月27日，醴陵西乡会党首領殷子奇派袁兰亭持函赴安源約肖克昌于12月7日率众会攻醴陵，肖未同意。

11月28日，醴陵西北潙山一带会党拟"合安源一股定于15日，夜扑醴陵"⑧的計划，被清吏偵知未果。

12月3日晚，醴陵会党"已制旗帜号补"，在板杉鋪、邓家渡"日夜制刀"⑨准备起事計划，被官方探悉破坏。

上述这些起义策謀，虽被清統治者破获了一些，但是一支巨大的革命队伍却在萍、瀏、醴交界的麻石高举了起义的旗帜，革命的巨浪終于冲开了腐朽的閘門。

---

① "刘道一傳"，見"革命先烈傳記"，第269頁。
② "魏宗銓傳"，鄒魯："中國國民党史稿"。
③ 楊思义："鄒永成革命回忆錄"。見"近代史資料"1956年第3期，第87頁。
④ 楊思义："鄒永成革命回忆錄"。
⑤ 楊世驥"辛亥革命前后的湖南史事"。
⑥ 汪文溥："醴陵平匪日記"，載上海"时报"，丁未正月18—21日。
⑦ 萍鄉知縣張之銳和毬萍巡防管帶胡应龍稟議撫文"，見"近代史資料"，1956年第4期，第59頁。
⑧ 汪文溥："醴陵平匪日記"。
⑨ 同上書。

二　起义的經过与失敗

在革命起义即将爆发的前夕，龔春台、蔡紹南、魏宗銓等召集了各地会党首領商决发难的日期与进行方略。12月3日晚，洪江会各首領集議于萍乡之高家台。在議及发难的日期时，与会者之間发生了重大的分歧。大致說来：主要的領袖人物如龔春台、蔡紹南等多“以軍械不足，主稍緩以待外援”；各碼头官則咸主“乘清軍尙无准备之时，急速发动”，饒有寿、龙人杰、沈益古、廖叔保等尤其“以为有党人十余万众，加以各地友党可得十余万；尽可一决胜負，坚持不再延宕”①，双方相持不下，会至天明而未散。洪江会激进分子廖叔保，乃独自集二三千人于麻石，高揚汉字白旗，宣布起义。事至此，已不容再有所犹豫。龔春台、蔡紹南等便以总机关名义正式宣布起义，檄知各路立即发动。龔春台称中华国民軍南軍革命先鋒队都督，以蔡紹南为左卫都統兼文案司，魏宗銓为右卫都統兼錢庫部粮司。起义軍均头裹白布，手执白旗；“其营制：六百人为一营，三千人为一軍，补号白地飾黑字，圆式，有‘革命先鋒’、‘后軍汉勇’、‘革命左軍汉勇’、‘革命右軍汉勇’数种；而各軍均有随兵，旗帜写‘汉命’或写‘洪命’……”②。

这支起自民間的队伍具有鮮明的阶級路綫和严明的革命紀律，“聞其主張，除为滿洲奴隶者及富豪外，学界、商界及百姓均不擾害……故人民虽在不安之中，然犹执业务不恐”③；起义軍“所过之处，并不騷擾，所劫杀者，皆办团之紳董”④。正因为这样，义軍所到之处“各地居民不特不生嫌怨，反而多表同情焉”⑤。

由于醞釀的充分，起义群众积蓄已久的革命义愤的激揚，以及群众的积极支持，起义第一天，便占領瀏阳之高家头；12月5日，又占領金剛头及萍乡之高家台；然后又整集軍队，浩浩蕩蕩直搗上栗市。12月6日，起义軍进占了上栗市。

发难义軍的凱歌进軍，引起了各地革命群众的热烈响应。

在瀏阳，瀏南之洪江会众数千人早已响应龔春台的号召，举起了汉字白旗；瀏东、瀏北之洪福会众数千人亦在姜守旦的率領下，举义响应——但宣布不受龔部約制，其旗号“洪福齐天”，軍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軍”。

在醴陵，起义軍約分三股；西路以福神港为中心，李香閣为总統，有随兵千余，下轄左右两陆軍和水軍，左軍統領为殷子奇，右軍統領为廖玉山，各有众三千人，水軍統領为刘澤春，自長沙、湘潭至萍乡之水路均属之；东路以官寮为中心，首領为瞿光文，称前軍总統，有众三四千；北路以官庄为中心，首領为譚石基，称后軍总統，亦有众三千左右。

在萍乡，安源路矿本为起义軍預定之根据地，有矿工近万人，这是近代中国新兴的产业工人，蘊有雄厚的革命威力，洪江会之肖克昌久居安源，从事活动，矿工加入洪江会者甚多。12月7日，到安源联絡肖克昌之醴陵会目袁兰亭被捕，引起矿工的激忿，“剛解至醴，而矿工群起”，肖克昌領导矿工群众“力求釋回，其情形言語与平日大异”，迫使矿局“即电醴陵，将袁解回，交萍令取押”⑥。表現了中国新兴产业工人的无比威力。但另一方面，由于安源路矿直接关系清廷的經济与軍事利益，自上栗市失守以后，官方加緊了对安源路矿的控制，加上肖克昌在安源附近小冲等处发动起义的失敗，使得安源矿工蘊藏的雄厚革命力量受到了窒抑，未能正式拿起武器与起义队伍一致行动起来。但是清統治者对安源矿工却非常恐惧，他們認为安源矿工的起义“足复安源防营，擄快槍馳下，則醴陵立糜爛”⑦。所以他們自始至終以重兵駐屯安源，以駐萍巡防前营的一半留駐矿地，还派遣湘軍“九十人，来駐安源保矿”⑧，12月18日又調鄂軍“步炮各一队，专駐安源”⑨，12月25日又将矿工領袖肖克昌緝捕杀害，并在矿区設巡警局，清查遣散有嫌疑的矿工，于是安源矿工的革命风潮就被鎮压下去了。

安源矿工虽然未能执械起义，但萍乡其他地方的矿工与会党群众却高举起了起义的火炬。在距安源仅十余里左右之恂及、萱风、泸溪一带的“炭井”矿工在麻石发难以后，便“咸往附从”；上栗市克服以后，他們尤为踊跃响应，“辞工者每日以百数計”⑩。此外，在萍乡北部之桐木以及与之相邻的宜春之

---

① 楊思义：“鄒永成革命回忆錄”。
② 見汪文溥：“醴陵平匪日記”。
③ 宋教仁：“我之历史”，卷五。
④ “匯报”，1906年12月22日。
⑤ 陈春生：“丙午萍醴起义記”，見辛亥革命（二），第464頁。
⑥ “萍厂林道致端撫电”，見“辛亥革命”（二），第486頁。
⑦ 汪文溥：“醴陵平匪日記”。
⑧ “江督端撫会奏萍鄉革命軍起事情形摺”，見“辛亥革命”（二），第494頁。
⑨ 同上書。
⑩ “萍鄉知縣張之銳和团防局紳李有如会禀电”，載时报丙午11月18日。

慈化一带，亦有会党四，五千人起义响应，势力且蔓及万载境内。起义軍仍以急风驟雨之势急剧扩展着，不数日便席卷了瀏阳、醴陵、萍乡、宜春、万载数县，人数总計在三万以上。

起义队伍之如此急剧扩展以及起义軍席卷地盘之如此广泛，使得当地的統治者惊惶万分，一时告急求援，調兵遣将之文电宛如漫天流星，来去不停。湘贛两省的兵力几乎全力以赴：在湖南方面，先后派遣了常备、巡防多营，分赴醴陵、瀏阳一带会攻起义軍，总計兵力在二千以上；在江西方面，先后派遣了三千防軍由吉安、南昌、新昌等地开赴萍乡与上栗一带。后来，随着起义軍势力的扩展，清廷又飞調鄂省新軍二千人开赴瀏阳，醴陵；在江省派追二千余人开赴贛省；継之，江督端方又商明直督袁世凱調撥五艘艦艇分舶九江、蕪湖、鎮江等处，"以資鎮懾"①。总計清廷动員了四省的兵力，先后开赴起义地区的軍队在一万以上。該地原有駐軍及临时兴办的"团勇"尙不在此数內。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帝国主义者也非常注意这次起义事件的发展，并表現了对起义軍的仇視态度。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喉舌"捷报"就曾以敌視与誣蔑的口吻报导了起义的一些情况，該报当时駐起义地区的記者哈佐惠曾明白宣称"这次暴动比一般无关重要的騷乱要可怕得多"，他認为"此次事变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一次地方性的騷乱"②；日本东京的报紙也时"对革命軍加以惡評"③。帝国主义者敌視起义軍，对起义感到"可怕"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次起义恰好发生在密关它們（特别是德、英、日）經济利益的萍乡煤矿与萍株鉄路区域，起义軍势力的蔓延又势必进一步威胁到它們在整个長江流域的經济和政治地位。因此，虽然起义軍在起义檄文中明白地宣布"外国人之生命财产，竭力保护，不稍有犯；教堂教民，各安其堵，不稍有犯"④，在实际行动中也确实如此，但帝国主义者却仍然准备着实行其武装干涉之慣技，"日本艦二只、英、德、美艦各一只，皆上駛往岳州"⑤。

不难看出，革命群众所面临的敌人不仅数量龐大，而且拥有全部新式裝备，而起义軍却严重地缺乏武器，其"所持槍械，仅由各地团防局夺获二三千杆，余众多以木竿及旧式刀槍为武器"⑥。

但尽管如此，起义队伍仍然与清軍展开了英勇的搏斗，并与清軍相持达匝月之久。

在萍乡和醴陵的战斗：自12月6日，龔春台攻占上栗市等地的同时，醴陵东路总統瞿文、西路总統李香閣及北路潭石基部即奉命进攻醴陵，但由于对比力量的悬殊，进占醴陵的計划没有实現，起义軍乃轉入瀏阳县境；在萍乡方面由于龔春台将主力轉攻瀏阳的結果，致使上栗市为敌人乘隙攻陷，此后萍乡、醴陵地区的起义軍即全部轉入瀏阳的战斗。

瀏阳的战斗：瀏阳会党的活动，最为活跃，起义的队伍亦最众，成为起义的主力軍，因此与清軍的斗爭亦最激烈，持續亦最久。12月7日晚，龔春台主力率軍由上栗市轉攻瀏阳，以求收集瀏南之洪江会起义軍并与瀏东、瀏北之洪福会起义軍会合。12月8日，起义軍与清駐瀏中路巡防营第二队梁国桢部遇于瀏阳城南十余里之地，当即将梁部团团圍住，直到清由省城赴援之防营第七队赶至，才将該部救出，共同退回城內。12月11日，起义軍再扑瀏城，被阻。次日，起义軍在南市街、石牛嶺一带的激战中，因火葯中彈爆炸，队伍混乱，清軍乘势猛攻，邓廷保等战死，龔春台与蔡紹南化名逃走，余众多北退与姜守旦的洪福会会合，洪江会主力軍瓦解。起义軍开始轉入了失败阶段。

12月14日，清軍大举北上，直襲洪福会首領姜守旦所屯駐之大溪山寨，姜守旦率洪福会众倉卒应战，势单械劣，不利，退至大光洞一带。12月17日，姜守旦复率众突进平江境內，12月20日在沙錦遭遇清軍南北两路夹攻，姜守旦受重伤，率余众东退至义宁（今修水）境內，不久，又遭駐屯該地的贛、江两省清軍会同"团勇"堵截击散，姜守旦下落不明，轟轟烈烈的萍、瀏、醴、大起义至此算是基本失败了。

龔春台、蔡紹南自瀏南战败出走后，曾图謀再起，于是往普迹联絡哥老会大头目馮乃古，不幸，蔡紹南在途中被清軍偵探捕去，慘死；龔春台虽抵普迹市，但馮乃古却在此前被清軍誘杀了。龔春台乃潛往長沙，至辛亥長沙起义时始再出現。

留駐長沙的刘道一不久也被逮捕，12月31日英勇就义于瀏阳城外。

在鎮压了起义大軍以后，清廷为了扑灭"殘留的起义軍，乃頒布"清乡章程"，在萍乡、宜春、万载、瀏阳、醴陵等县同时大肆清乡捕杀起义群众达三

① "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兩江总督端方致軍机处請代奏电"，見"辛亥革命"（二），第514頁。
② "捷报"，1907年5月31日，第523頁。
③ 宋教仁："我之历史"，卷五。
④ "中華国民軍起义檄文"，見"辛亥革命"（二），第477頁。
⑤ 宋教仁："我之历史"，卷五。
⑥ 馮自由："中華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册，第255頁。

閏月，魏宗銓、廖玉山等均被搜捕遇难；革命群众先后被杀者达一万以上。

当起义爆发之初，同盟会东京本部聞訊立即派遣楊卓林、李发群、孙毓筠、胡瑛、宁調元等回長江沿岸各省运动响应；不料起义軍过早失败，長江沿岸各省均大兴党獄，同盟会派往的人或遭捕杀，或被监禁，同盟会之接应失败，長江流域的革命机关也一度遭到破坏。

三　起义軍与同盟会的关系及这次起义的历史意义

发动这次起义的組織力量虽然是民間的秘密結社——会党，但作为这次起义的思想、政治指导者却是个别的同盟会会員，首先是刘道一和蔡紹南。他們两人不只是积极地策划和参与起义的实际斗爭，更重要的还是他們向起义群众宣傳了同盟会的政綱，灌輸了资产阶級民主革命的思想。

刘道一与蔡紹南回国时，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实际負責人黄兴曾經指示他們說："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襲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①因此，当他們回湖南后，便"向会党反复説明：这次革命是国民革命，而非古代的英雄革命，所以革命的目的在求全民族的自由解放，而非为个人爭王爭帝"。結果，"会党受其感化，益奋发鼓舞"②。

最集中、最鮮明表现同盟会对这次起义的思想、政治影响的，是洪江会軍領袖龔春台发布的起义檄文。在檄文中龔春台号称"中华国民軍南軍革命先鋒队都督"，并明白地宣布这次"兴师"是"奉中华民国政府命"，以表明他們願意接受同盟会的領导。檄文的內容，除了强調反满以外，并且明白宣布："本督师只为同胞謀幸福起見，毫无帝王思想存在于其間，非中国历朝來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己之私产者所比。本督师于将來之建設，不但驅逐韃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問題，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③显而易見，檄文所表述的斗爭綱領，在思想內容上，是与同盟会的政綱——"驅逐韃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完全一致的。这正表明了同盟会对起义軍的思想、政治影响。

洪江会軍是这次起义的首义軍与主力軍，它的檄文既然在思想上、綱領上接受了同盟会的領导，就决定了这次起义已不同于一般的单純的农民起义与会党暴动，它帶有比較鮮明的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色彩，并成了同盟会領导下的全国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但是必須指出，这支起义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共傳习已深的封建观念（特別是忠孝观念）与落后的組織形式。入会者須飲雄鸡血酒宣誓，誓詞是："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神人共殛。"同时还得念誦下列口号："六龙得水遇中华，合兴仁义四亿家，金相九陣王业地，鳥牛白馬扫奸邪"。入会后則发票布作为会員凭証，票面横书"还我河山"，左书"忠孝仁义堂"，右注第×路第×号，中书会員姓名，票底另有七絕詩一首："一寸三來二寸三，六龙得水遇奇奸，四五連一承汉业，全凭忠孝定江山。"④举义以后，部众所擎的旗幟也并不是統一的，有的书"汉命"，有的則书"洪命"。龔春台在其檄文中虽称"中华国民軍南軍革命先鋒队都督"，但对內部，却又往往采用"洪命督办民主自志社会总統全軍謝"（按：龔春台本名謝再兴）的銜号⑤。所有这些均表明：洪江会起义軍虽然受着同盟会的思想、政治影响，但这种影响仍然是有限的。

同盟会对这次起义的影响的有限性，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以姜守旦为首的洪福会軍身上。洪福会軍在所发布的起义檄文中表示拥护君主专制政体，主張建立新中华大帝国，并定名为"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軍"，檄文明白宣布："有能起兵恢复一邑者，來日即推为县公；恢复一府者，來日即推为郡主；至外而督撫，內而公卿；有能首倡大义，志切同胞者，……來日不惜万世一系，神聖不侵，子子孙孙，世襲中华大皇帝之权利以为报酬。"并且强調指出，"勿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說，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形专制，……犹当仰天三呼万岁"⑥。这些，都充分表明他們沒有接受同盟会的綱領，而是一种单純的种族复仇主义与旧式的农民起义。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由于同盟会所給与的思想、政治影响，使得这次起义帶有比較鮮

① 刘揆一："黄兴傳"，見"辛亥革命"（四），第284頁。

② "刘道一傳"，見"革命先烈傳記"第268頁。

③ "辛亥革命"（二），第477頁。

④ 鄒魯："中国国民党史稿"，"魏宗銓傳"。

⑤ 汪文溥："醴陵平匪日記"。

⑥ "新中華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軍布告天下檄文"，見"辛亥革命"（二），第479頁。

明的资产阶級民主革命色彩，成为同盟会所領导的全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同盟会并没有成为这次起义的直接的組織者与領导者，同盟会的政綱——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思想也没有被所有的起义群众所理解和掌握，又使这次起义没有最終跳出旧式农民起义与会党暴动的范圍。这两方面的結合，也正是这次起义所具有的既不同于此前的农民起义与会党暴动，也不同于此后的农民革命的特点。

这次起义是同盟会成立以后中国第一次群众性的革命发动，而它的发动又有力地推动了同盟会領导的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这次起义的全部事实表明，在中国工人阶級未走上政治舞台以前的中国資产阶級，对下层群众，首先是农民的思想、政治影响开始加强，农民开始被卷入資产阶級革命的漩渦，充当了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后备軍。从此以后，中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便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愈益迅速地向前发展了起来。

在这次起义中引人注意的，是萍乡地区数千矿工的参加起义与安源矿工援救袁兰亭事件。矿工的群众性发动給予清朝統治者和外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充分显示了中国年輕的无产阶級的高度革命性、斗爭性与无比威力。虽然，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中国工人的武裝发动并不是从这次起义开始的，然而，作为有組織的、有綱領的、政治斗爭的武裝发动来說，这次起义却还是第一次。在这个意义上講，也正如苏联历史学碩士Г.Б.爱倫堡所說的，萍乡矿工的起义，实为“中国年輕无产阶級的第一次革命发动”①。

萍、瀏、醴起义虽然在清廷四省大軍的鎮压下失敗了，然而它却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統治者，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进一步高漲。在萍、瀏、醴起义以后，同盟会更加强了在国內的活动，接二連三地掀起革命大起义；而萍、瀏、醴地区則一直成为湖南、江西革命的溫床，該地区的会党与矿工群众也一直是湖南，江西革命党人活动的主要群众基础。所有这些都說明，这次起义虽然失敗了，但它却留下了深厚的革命影响，大大地推动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五年以后，清朝統治者，終于在全国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复灭了，萍、瀏、醴地区革命群众的鮮血并不是白流的！

① 見Г.Б.爱倫堡：“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运动”。

陈玉成、李秀成与太平天国后期的軍事

苑书义

一

陈玉成和李秀成是在偉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涌現出来的杰出的青年将領，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两大支柱。

1851年在金田村所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战爭的总結，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序幕。

1856年太平天国領导集团的“內訌”，是太平天国从进攻到防御、从胜利到失敗的轉折点。“內訌”削弱了革命声势，清軍即乘机反扑：在皖北，清軍陷三河，困桐城，逼安庆；在長江沿岸，湘軍陷武汉、九江，逼安庆；在江南，清軍逼近天京，再建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相呼应，掘長壕圍天京。这样，太平天国在軍事上陷于被包圍的形势，天京、安徽同时危急，就在这时，經“朝臣查选”，天王提拔忠貞革命、英勇善战和掌握兵权的两位青年将領陈玉成和李秀成，“出来助国”。

陈玉成（1837年生）和李秀成（1823年生）都是广西藤县新旺村人，貧雇农出身。貧雇农的苦难生活，賦与他們烈火般的阶級仇恨和坚忍不拔的鋼鉄意志。鴉片战后，广西的农民斗爭和上帝教的四大平等思想，磁石般地吸引着他們的心。他們毅然决然地献身于革命，并在革命洪爐里，逐漸鍛煉成为天才的将領，担負了太平天国后期軍事上的重要任务。他們光輝的名字是和太平軍的战績、太平天国后期的历史緊緊地联結在一起的。

二

太平天国后期，由于陈玉成和李秀成的联合作战，

暂时稳定了軍事局面。

"內訌"后，秀成奉命从句容援皖，駐守桐城。桐城是安庆的門戶，安庆是天京的屏障。当时清軍圍困桐城甚急，秀成即联絡捻軍張洛行部牽制清軍，并求援于圍困宁国的陈玉成。玉成当即准請，率軍来救桐城。陈李会議樅阳，后以出奇制胜計，大敗清軍，开始扭轉了安徽的軍事局面。

就在此时，石达开又进行了分裂活动。陈李虽然同情石达开的遭遇，但对革命的无限忠誠，使他們拒絕了石达开的招約，堅持了革命事业。石达开出走后，"朝中无将，国內无人"，为了支撑危局，天王乃任命蒙德恩为正掌率，"朝中內外之事悉归其制"，玉成为又正掌率，秀成为副掌率，"提兵符之令"，一改石达开出走后"国政不能划一"的局面，"稍可自立"①。

陈李没有为迅速的升迁得意忘形，深感責任的重大。他們認为整頓內政是冲破清軍包圍的重要条件，因为"內訌"后，天王已丧失了信人勇气，"用人不专，信人不实，讒佞張揚，明賢偃避，豪杰不登"，致使"人心改变，政事不一"，这种"朝規坏乱"的政治局面，是冲破清軍包圍的严重障碍。陈李为革命責任感所驅使，曾就此事会商于安庆；秀成并直接奏請天王应"擇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严正朝綱，明正賞罰，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寬刑以待万方，輕世人粮稅，仍重用于翼王，不用安福王"。这建議是英明的，虽然被天王拒絕，但它表明秀成卓越的政治才干和堅持眞理不顧个人安危的高貴品德。

1858年2月，江南北大营圍困天京甚急。秀成得天王允准，出京調度援軍。3月，秀成将京中之事，交与蒙得恩等掌管，奏免不准長次兄理事，隨即赶赴蕪湖，决定"先扫淸而浦，隔江通信，以安京內人心"。7月，陈李会議樅阳，"各誓一心，訂約会战"。会后，陈李会师烏衣，前后夾击浦口，歼敌万余，打垮江北大营，收复浦口，京浦交通纔得以恢复，使京內人心稳定下来。

正当陈李联軍攻破江北大营之际，湘軍主力李續宾部自江西、湖北进犯安徽，进至距廬州五十里的三河鎮。三河鎮"实扼廬州之总要"，又是太平軍屯聚粮米軍火之所②。天王急命玉成往援，玉成奏准天王調秀成同往。10月初，陈李联軍前后夾击三河之敌，全歼李續宾部，反革命遭受严重打击，曾国藩曾供認："自三河敗后，元气大伤，虽多方撫慰，而較之昔日之鋒鋭究为減色。"③陈李揮軍乘胜扩張战果，收复桐城等地，圍攻安庆的敌人軍心震动，撤圍而去，安庆之圍不战自解，長江上游的形势趋于好轉。

1859年初，由于太平軍江浦守将薛之元的叛变，天京第三次陷入重圍。秀成当时駐軍黄山，聞变赶回，入鎖浦口，暫通天京之路。时値清政府任命江南大营統帅和春节制江北軍务，和春派匪首張国樑率軍增援北岸，加紧圍困天京。秀成孤軍不能取胜，即向玉成求援。4月玉成率軍由廬州东下。11月陈李联軍几經苦战終于击垮敌軍，收复浦口，京浦交通纔再度恢复。正待継續再战扩張战果之际，曾国藩督湘軍又从黄梅等地进犯安徽，上游告急，玉成只得"扯兵上救"，秀成孤軍留守浦口。当时秀成的处境极为艰难，他曾說："我守浦口日久，又无軍餉支兵，外又无救，南岸和張两帅之兵又雄，营中火葯炮子俱无，朝无佐政之将，主又不問国事，一味靠天，軍务政务不問，我在天朝实无法处。"不仅如此，因叛徒李昭寿劝降事，"又被見疑"險遭不白之冤。原来天王因被东北翼王弄怕，不敢信外臣，专信同姓。1859年3月天王族弟洪仁玕到京，不久即"封为軍师，号为干王"，无功升賞，众将不服，天王乃封玉成为英王，却未封勇猛有战功的秀成。叛徒李昭寿乘机写信劝秀成降清，被天王偵知，为防秀成有变，尽封中关船只，断絕秀成官兵来往。但秀成仍以革命事业为重，不顧个人恩怨，堅守北岸陣地，抗击敌軍。秀成无限忠誠于革命的行动，終于消除了天王的疑虑，天王用黄緞子亲写"万古忠义"四字賜秀成，封为忠王。此后，秀成又进行了解天京之圍的斗爭。

江南北大营是奕訢与曾国藩矛盾的产物。奕訢計划是湘軍出力，江南北大营收功，对它特別重視。它逼近天京，形式上成为可怕的大敌，但实际大敌却是上游的湘楚軍。太平軍对江南北大营应取守势，对湘楚軍应陈李联合全力攻击，首先要确保安庆④。对这个关系全局的战略問題，陈李存在着意見分歧。

英王的主張是用兵上游，力保安庆，但忠王却强調了"京城四門俱被和張两軍重困深濠，朝內积谷无多"的情况的严重性，忽視了上游的劲敌。因而力主出京，調度援軍以救天京。得天王允准，忠王即赶赴蕪湖，召开軍事会議，各路将領均願服从指揮，遂議决采用"圍魏救赵"之計，以解京圍。

說明：帶引号没有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李秀成自傳"。見罗尔綱："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証"。

① "洪仁玕自述"。

② "胡文忠公遺集"，卷三十二。

③ "曾文正公書札"，卷七。

④ 范文瀾："中国近代史"。

2月，忠王大軍从蕪湖出发，經宁国攻入浙江。3月攻克杭州。江南大营果然派精銳張玉良部援浙。忠王見敌中計，即率軍退出杭州，急趋建平，会議各路將領，会后即分途进剿，由建平攻入苏南，从江南大营后方进击，时英王也奉命从潛山太湖拔兵东下前来助战。五月陈李联軍分进合击大破江南北大营，"九伏洲妖艇亦于其时相率潛遁，南北两岸通行，京圍立解"①。

这次战爭在敌我双方都是重要关鍵。太平軍方面，由于受农民阶級性的制約，忠王着重用兵江浙，英王則着重上游，力爭安庆，从此两王不能合作，势力分散，加速了天京的陷落。敌人方面，奕詝計划失敗，不得不全部依靠曾国藩，給他兵部尙书銜，署理两江总督的軍政实权，湘軍的势力和地位从此大进一步。

三

保卫安庆的失敗，加速了太平天国的灭亡。

1859年9月，正当陈李联軍苦战六合浦口之际，曾国藩指揮湘楚軍分四路进犯安庆。11月，湘楚軍侵占黄梅、宿松一带，向安庆推进。英王奉命揮軍西指，联合捻軍張洛行部十余万人，奋力迎击，双方激战于太湖、潛山一带。翌年2月，英王軍战敗，失太湖潛山两个县城。正在这时，天王竟錯誤地命令英王率軍回援天京，虽然英王会合忠王大軍取得了击垮江南北大营的胜利，但曾国荃湘軍却乘机侵占集賢关，开始圍攻安庆。5月，湘軍得叛徒韋俊之助，侵占安庆的咙首——樅阳，安庆形势益危。

安庆是天京的屏障。力爭上游、保卫安庆，是太平軍的当务之急。

天京解圍后，干王、英王和忠王等"登朝庆賀，且議进取良策"，英王意在救安庆，干王和忠王則主張先取苏杭滬，后救安庆。干王說："为今之計，自天京而論，北距川陕，西距長城，南距云、貴、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遥，惟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旣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旣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輪二十个，沿長江上取，另发兵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枝，由北进蘄黄，合取湖北，則長江两岸俱为我有，則根本可久大矣。"②根据干王的建議，会議制定了著名的保卫安庆的战略計划：第一步，英王和忠王揮軍东指，夺取苏杭滬，消除东顧之憂，分散上游敌人兵力；第二步，英王和忠王分兵南北两路，溯江而上，夺取武汉以救安庆。

根据这个計划，忠王率軍进取苏常、逼上海；英王率軍先攻揚州后取浙江。

9月，忠王大軍克常州，占无錫，乘胜收复苏州。苏州人民飽受清軍蹂躪，乘机張貼"同心杀尽和張强盜"字样，热情地欢迎太平軍。忠王抵苏州，即优待俘虜以瓦解敌軍，并"息士安民"，甚而亲自下乡安撫"苏民"，結果"民心順服"。

收复苏州后，忠王即揮軍东指进攻上海。当时忠王对外国侵略者的認識是不够的，他进軍上海是企图与"同事上帝"的外国势力取得联絡③。他照会英国全权代表，說明太平軍必須收复上海，要求外国人保守中立。但是盘踞上海的外国侵略者，虽然标榜"中立"，却决定由英法联軍武力"保卫"上海，并由美国流氓华尔出面組織一支"洋槍队"，配合清軍进犯松江青浦等地。面对着外国侵略者的武裝干涉，忠王毫不犹豫，奋起迎战，在青浦大敗"鬼軍"，乘胜进攻上海。当时忠王还希望爭取外国的"中立"，致书上海各国領事，宣布：外国人只要"門首悬挂黄旗"，即可得到保护，"其他要事，俟到上海，再行磋商"④。可是当他到达上海时，却发現守在城墙上以洋槍迎接他的正是英法軍队，忠王大軍受到相当大的損伤，退至徐家匯。这次事件，惊醒了太平天国的英雄們，使忠王开始認識了外国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公敌，他致书上海各国領事，严責其不守中立，并警告說，若犹怙惡不悛，必将停止中外一切貿易。不久，因嘉兴軍情緊急，忠王退兵救嘉兴。

忠王进軍苏常滬，是太平天国保卫安庆計划的一部分。这个計划确实打中了敌人要害。奕詝嚇得惊慌失措，主張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⑤，急派曾国藩督軍徑赴苏州，"保全东南大局"。老奸曾国藩虽未动搖，繼續督湘軍全力进犯安庆，但也不得不压抑一下曾系湘軍独占战功的思想，保荐左宗棠，沈葆楨、李鸿章分任浙贛苏三省軍务，以对抗太平軍。

这样，太平天国保卫安庆的第一步計划，就被外国侵略者和曾国藩所破坏。

9月湘軍猛攻安庆，安庆形势并危。天王乃派英王和忠王分軍南北两路，溯江而上，合取武汉，以救安庆。英王和忠王曾就此事会商于苏州。会后，英王

---

① 李秀成諭褒玉吉。

② "洪仁玕自述"。

③ 李秀成致上海各国領事書："余之前来，本欲与貴国（英美葡法等国）訂立通商之条約，联絡亲睦之感情耳。"

④ "李秀成致上海各国領事書"。

⑤ "咸丰上諭"。

大軍經天京西进。11月，英王率部联合捻軍救安庆。湘軍被猛攻，准备撤退，叛徒韋俊自樅阳出兵断絕練潭餉道，英王軍乏食，退归桐城。

1861年春，英王統帥北路軍自桐城經霍山县攻入湖北，連敗敌軍，势如破竹，3月收复黄州、黄陂等城，直搗胡林翼的老巢——武汉。当时湘楚軍主力在安庆太湖一帶，武昌城防空虛，胡林翼飞調水陆援軍，一时緩不济急。显然，英王大軍只要向武汉挺进，就可随手而得，安庆敌軍将不战自退。正在这时，英海軍提督何伯、参贊巴夏礼率艦队到汉口，要挾英王停止进攻武汉。4月，英王顧忌到英国的干涉，忠王大軍远在江西、安庆被湘軍猛攻益危，即錯誤地放弃了夺取武汉以救安庆的計划，退出湖北回救安庆。

与此同时，忠王統帅南路軍也进行了西征。

忠王在收复苏常之后，即产生了取江浙作根据地，忽視上游的思想，不願再率軍扫北，遭天王严責，勉强出师。忠王西征，固然是为了完成会攻武汉以救安庆的計划，更是为了接应江西湖北的起义群众。

1860年12月，忠王統帅南路軍逼进距曾国藩老巢——祁門約六十里的黟县。曾国藩恐慌万狀，忙写遺囑，准备自杀，但忠王由于没偵探到敌情，放过祁門，向江西湖北挺进。忠王得江西湖北起义群众的接应，行軍順利。翌年7月忠王率南路軍相継收复兴国州、武昌县等地，"更进則武昌动摇，皖围撤矣"①。但忠王却在重江浙輕上游的战略思想支配下，无意进攻武昌，長江被湘軍水师封鎖，望見楚北英王軍旗帜，也未設法渡江会合，在收得湖北起义群众之后，竟然退出湖北，經江西攻入浙江，放弃与英王配合作战保卫安庆的战略計划。这是忠王用兵的一大失策，加速了安庆的陷落。

4月間，英王分兵防守湖北攻克各城，自率精兵回救安庆，屯兵集賢关，猛攻深濠高垒围困安庆的湘軍，敌人凭濠固守，形势危急，但因寡不敌众，終未取胜。英王則派刘瑲林率精兵留守集賢关，牽制敌軍，亲自去桐城、天京联动援軍，复来解安庆之圍。不料湘軍則乘机围困集賢关，刘瑲林孤軍凭垒抵抗二十余日，彈尽援絕，营垒被攻陷，刘瑲林等四千多精銳将士壯烈犧牲。英王得到敗报，赶回再救安庆，但精銳伤亡太多，虽几經血战，仍不能挽回頹势。9月安庆終于被湘軍攻陷，守将叶芸来率軍奋起迎击，全体将士二万人英勇殉国。

安庆的失守，給革命帶来极大的危險，干王曾說："我軍最重大的損失，乃是安庆落在清軍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鎖鑰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継陷落不可复守矣。"②

安庆的陷落，是太平天国夺取武汉以救安庆的战略計划被破坏的直接后果。这固然是由于外国侵略者的武力干涉，曾国藩的破坏，也由于受农民的阶級性的制約，忠王重江浙，英王重安庆，没有堅决执行这一战略計划的結果。

安庆陷落后，英王想去湖北招兵，再图大举，"不意将兵不肯前去"，遂退守廬州，英王在安庆战敗，天王下詔严責，"革其职权"，并封江阳其归京。但任何困难都嚇不倒革命的英雄。英王一方面"具本啓奏"，要求天王改变"朝中办事不公平"③的現狀，一方面請命自守廬州，派部下扶王陈德才、遵王賴文光远征豫陝，"广招兵馬，早复皖省"④，并积极联絡捻軍張洛行部"以图大征大剿"⑤。

1862年4月，胜保率軍圍攻廬州，"城內无粮，恐难持久"，英王即率軍突圍走至寿州，"原想踞城鋪排一切，亲帶陈德才張洛行等分兵扫北"⑥，不料被練匪苗沛霖誘获，送胜保营中。胜保劝之降，被严詞拒絕："大丈夫死則死耳，何饒舌也！"⑦英王忠貞革命，至死不屈，从容就义，年仅二十六岁。

四

忠王进軍浙江和大力經营江浙，虽然卓著成効，并不能挽救革命的危急。

安庆失守和英王殉国后，太平天国的处境极其險惡。发憤图强、团結救国已成为当务之急。但天王仍深居宮內，不問政事，一味靠天，洪氏集团专擅政权，敗坏朝政，疑忌忠良，尤猜忌赤誠救国的忠王，降其职、奪革其权，致使"君臣各有私怨之心"，力量分散，大局无法挽救。

与此同时，中外反革命勢力却正在进一步勾結起来。第二次鴉片战争和北京政变的結局造成了中外反革命全面勾結的基础。外国侵略者开始全面援助清政府；那拉氏也全力依靠曾国藩，任命他为两江总督节制苏浙赣皖四省軍政大权，他也高度发揮了反革命才能，効忠其主子。

这样，太平天国必致失敗的形势已定，它还能延

---

① "赵烈文日記"。
② "洪仁玕自述"。
③ "陈玉成諭馬融和"。
④ "賴文光自述"。
⑤ "陈玉成致張洛行書"。
⑥ "陈玉成自述"。
⑦ 佚名："陈玉成被擒記"。

長几年，全靠忠王为首的一支軍队对革命无限忠誠，和江浙人民对革命的有力支持。

忠王西征，虽未能解安庆之圍，而数月之內，長驅五千余里，攻克二十余城，招撫起义群众二十余万，軍威大振，使曾国藩"思之忧悸"①。

1861年10月，忠王大軍从湖北經江西进入浙江，所向披靡，連克浙东、浙西各府县，繼而圍困陷于孤立的杭州。当时杭州"城內无粮，民亦无食，軍民之心甚乱"。忠王有見于此，即督軍强攻，同时"射諭入城"，宣傳优待俘虏政策，以瓦解敌軍。12月末，杭州解放，忠王即严格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并安撫难民，稳定了杭州的革命秩序。

这样，江浙两省膏腴尽为太平軍所有，在江浙解放了的地区里，忠王进行了各种富現成効的建設。

忠王以苏州为根据地建立苏福省，在江浙各解放区，普遍地建立起守土乡官制度，使农民得到了民主权利，打击了地主的威风，巩固了革命的秩序。

在江浙部分地区，忠王实行了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土地政策，并发給田凭，农民"領凭后，租田概作自产"②，这就在一定范圍內打倒了地主阶級，满足了部分农民的土地要求。同时，忠王又采取了輕徭薄賦、保护生产的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出現了"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和"民物之殷阜"的景象③。

忠王也采取了扶植工商业、鼓励对外貿易的政策，促进了工业和国內外貿易的繁荣。

太平軍因尽占江浙两省膏腴，并进行了各种富有成効的建設，声威大振。反革命一起大恐慌，老奸曾国藩急忙遵旨統筹全局，决定三路进兵，力挽頹势：曾国荃湘軍順江而下进犯天京，左宗棠湘軍进犯浙江；李鴻章淮軍从上海进犯苏常和天京，并决定"借助洋兵"保护上海。当时上海的英法軍队也宣布"为保卫上海周圍三十哩的半徑內的地区"而战。1862年4月，李鴻章淮軍抵滬，开始依靠英法联軍和华尔的"常胜軍"对太平軍作战，进犯嘉定、青浦和太倉。忠王并没有被中外反革命軍队的联合进攻所嚇倒，統帅大軍奋起迎战。在太倉大败"鬼兵"，乘胜克嘉定、青浦，圍松江逼上海。忠王曾說："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見仗，战則即败。"英法联軍龟縮上海一隅，上海几乎保不住了。然而大局的演变，使忠王在这緊要关头，不得不下令退兵。从此太平軍再也没有力量进攻上海了。虽然如此，忠王統帅太平軍两次进攻上海，却給侵略者以严重打击，充分表現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英雄气概。

正当忠王大軍圍攻上海之际，曾国荃湘軍順江而下进犯天京，逼近雨花台。天王急命忠王回救，忠王不得已从上海附近退兵，在苏州与众将从長計議，决定采用"以逸待劳"之計，"待二十四只（个）月之后，再与其战解京圍"，遭天王严責，被迫回救，因未带棉衣，11月正逢天冷，兵又缺粮，部下各王不肯齐心，虽猛攻湘軍营盘四十余日，并未攻下。天王遂命忠王率軍渡江西进，联合陈德才、賴文光軍繞击湘軍背后，以救天京。忠王遵命率軍渡江西进，行至寿州，未与陈賴取得联系，适湘軍圍攻天京又急，忠王奉命回援，徒劳往返，战斗力大受损伤。

忠王回救天京，使江浙地区的太平軍失去統一領导，孤立无援，被中外反革命各个击破。左宗棠湘軍依靠法国侵略者的"常捷軍"乘机攻陷浙江；李鴻章淮軍依靠"常胜軍"乘机攻陷苏常。

忠王鑑于江浙軍事的失敗，知天京难保，遂建議天王"让城别走"，走向东南或西北，再图大举。天王不听，忠王无法，只得困守危城，坐待灭亡。1864年6月，天王服毒殉国，7月19日天京陷落。忠王奉幼主冲出城墙缺口，不幸被敌人冲散，幼主逃往湖州，忠王在南京郊外被俘。曾国藩急忙从安庆赶来，亲自审訊。忠王为了流傳天国信史，在囚籠中写了天国始末和本人战績約六万字，被曾国藩删改，保存下来的只有三万三千五百余字。忠王写完天国信史的当天夜間，就被曾国藩"凌迟处死"。一代英雄，壮烈牺牲。忠王殉国后，南京一带农民紛紛設祭哀悼自己的領袖。

* * * * *

陈玉成和李秀成是在偉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杰出的青年将領。他們把自己最高度的热情和全部的生命力量，貢献給农民的解放事业。虽然由于农民的阶級性的限制，他們没有能完成解放自己的阶級，保卫民族独立的偉大任务，被反革命所杀害，但他們坚决反对地主阶級的統治、英勇保卫祖国抗御外敌、爱护人民保障群众利益、支撑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英雄业績，在中国历史上将永远放射着光輝。他們的英雄形象，也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追思、所景仰。

---

① "曾文正公書札"，卷十七。

② 吳江儒園野老："庚癸紀略"。

③ "常熟忠王报恩牌坊碑序"。

第一国际建立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

亦 平

第一国际是无产阶級革命运动中的大事件，是1864年产生的无产阶級的第一个群众性的国际組織。它的产生如历史上其他一切重大事件一样，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政治經济各方面的历史背景的。

探討第一国际产生的历史背景，应該研究十九世紀四十到六十年代的历史特点，这一时期的特点是1848年革命后，資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了一个空前的高漲，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种高漲，使資本主义在欧洲各主要国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然这种胜利不是永恒的，这种胜利只是面对封建制度而言的。这种高漲和胜利标志着“自由”資本主义已經发展到頂点，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开始的第二年(1871)，資本主义制度遭到了巴黎公社的打击后，就开始了它走下坡路的新的历史时期。因此，可以这样說：第一国际产生的历史背景是“自由”資本主义开始沒落的前夜，是“自由”資本主义开始轉入壟斷的前夜。

十九世紀四十到六十年代，資本主义取得的决定性的胜利，从經济上講，首先表現在工业資本主义在各主要国家战胜了封建經济、个体經济和手工工場，在这些国家的經济生活中占了統治的地位；其次是資本主义的技术革命在各主要国家中均已完成，机器普遍地代替了手工工具，鉄路、汽船，电报等近代化的交通电訊設备已广泛地普遍地采用起来。

資本主义在經济上取得的这种胜利，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資本主义內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更加尖銳地暴露了出来，两极分化更加突出了，大量財富更加集中到少数人手里。1870年英国国民收入的36.5%由占全国人口2%的大工业家、金融資本家和地主所占有，占全国人口80%的劳动群众仅得到国民收入的40%。1863年法国一百三十八个資本家，拥有股票和債券总額达二百亿法郎，而1865年法国工业的总产値才只有一百二十亿法郎。与此尖銳对照的是无产阶級更加貧困，工业的发展使小資产阶級日益分化，新技术的采用使工人变成了机器奴隶，沒有劳动保險，劳动强度无限增加。同时随着机器的采用，工厂大量地象利用男工一样利用童工和女工。特别是1857年暴发了第一次工业的世界性的經济危机以后，在各主要資本主义国家內部，农村的中农貧农阶层迅速破产，大量地制造着失业和“劳动后备軍”。在各主要資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上，利用他們采用了新技术的优势，更加残酷地对殖民地进行掠夺，鎭压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和民主运动。資产阶級利用从殖民地榨取来的財富，反回来对本国无产阶級进行鎭压、分化和剝削。

这样尖銳的阶級对立和由于失业及“劳动后备軍”的增加引起的工人阶級內部为了就业进行的竞争，不仅使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觉悟到推翻資本主义制度的必要，并且也使他們更加觉悟到加强无产阶級国內和国际团結的必要。

另一方面，資本主义在工业上的胜利和技术革命的完成，为无产阶級的国际团結創造了物質上的条件。沒有現代化的交通、电訊工具，无产阶級的国际团結与联合，是要受到一定阻碍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論到无产阶級团結时曾說过：“促进这种团結的是由大工业所造成的愈益发达的交通工具，因为这种交通工具使各地工人彼此发生联系。只要有了这样联系，就能把許多地方范圍內发生而到处性質相同的斗争集中成为一个全国范圍的阶級对阶級的斗争了。”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內的无产阶級的联合而言的，同样，在国际范圍內，无产阶級的联合也需要这样的物質条件，而这种物質条件，随着六十年代資本主义技术革命的完成是完全具备了的。鉄路的迅速建設和蒸汽机发动的汽船广泛地航行，把最偏僻的角落跟一切世界中心联系了起来；电报的发展和普遍地采用，又使人們的思想得到了及时而迅速的交流。如果說資本主义制度产生那天起就造成了无产阶級国际团結的必然性，那么，資本主义技术革命的完成，就提供了这种团結的更有利的物質方面的条件。

以上就是第一国际产生的經济方面的历史背景。

第一国际的产生还有它政治方面的历史背景。列宁說过，自1789法国資产阶級革命到1870年的时代

是"一般的資产阶級民主运动，特别是資产阶級民族运动的时代，苟延殘喘的封建专制制度迅速崩潰的时代"①。按照列宁这一論断，十九世紀四十到六十年代正是資产阶級的民族民主运动，在欧洲、美洲各主要国家中战胜封建专制制度的最后胜利的时期。南北美战争，意大利、德意志的再統一等等均說明了此問題。資产阶級在政治上取得的这种胜利，正是他在經济上取得胜利的反映。

随着資本主义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胜利，資产阶級在政治上更加集中力量加强了对无产阶級的統治和鎮压。自1789到1870年这一时期中，資产阶級对无产阶級也采取了鎮压、分化等手段，但当它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时，它終于不得不借助无产阶級的力量去反对它的敌人，在十九世紀四十到六十年代，当資产阶級在經济、政治上对封建制度已接近取得基本胜利时，它就越来越残酷越来越集中力量地对付无产阶級了。1848年以后他們对馬克思恩格斯的迫害，六月对无产阶級起义的残酷鎮压，都說明了此問題。另外他們为了破坏无产阶級国际团結，采取了各样手段，对带有統一性的国际工人运动，实行各个击破，所有这些，都教育了无产阶級，使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觉悟到加强国际团結的必要。

从无产阶級方面来看，自从它們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后，在一定的阶段上还不是在政治上和自己的敌人——資产阶級作战，而是对自己的敌人的敌人——农奴主、奴隶主、土地貴族、高利貸等作战。这是历史发展的过程所規定的，是必要的，因为这些都是无产阶級成長发展和取得解放过程中的最古老的敌人。但当着資产阶級民主革命在主要資本主义国家已取得基本胜利的时候，无产阶級的历史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发展革命，使革命过渡到持久的社会主义的不停頓的革命了。十九世紀四十到六十年代，无产阶級革命运动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轉折点上。无論在数量上質量上无产阶級都已經完全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从数量上看，資本主义的发展和尖銳的两极分化，扩大了无产阶級的队伍，使无产阶級"已經具备有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②，但更重要的是質量，是无产阶級的觉悟程度。尽管当时欧洲无产阶級的觉悟程度是不高的，无論是美国、法国、德国的工人运动还没有擺脫資产阶級的影响，美国的工联主义，法国的普魯东主义和德国的拉薩尔派，还在工人群众中有相当的影响。但这不是主流，主流的东西是馬克思主义产生和"共产党宣言"发表后，无产阶級拥有了自己的科学的战斗的辯証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推翻資本主义制度，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已成为当时先进工人的口号。此外1848年革命失败后到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前馬克思恩格斯所有的著作，都在思想上武装了无产阶級，为第一国际的建立做了准备。如果說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当时只不过为二、三百名的无产阶級先鋒队所理解，那么到第一国际成立前夕，这一口号已为各資本主义国家成千的工人所理解，并变成他們自己的口号了。

此外，工人的觉悟还表现在他們在斗爭的实踐中增强了自己的信心，斗爭的实踐使他們看到，完全能够废除雇佣劳动制度，而由自己来管理现代化的企业。这就是当时的英国的合作运动。合作运动不仅証明了工人自己完全能够管理大規模的按照現代要求所进行的生产；并且也証明了，为了順利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壟断起来作为統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証明了雇佣劳动也象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暫时的和低級的形式，它应該让位于带着愉快心情自願进行的联合劳动。这是問題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合作运动也証明了"只要他没有越出个別工人偶然努力的狹隘范圍，那就始終旣不能阻止壟断势力按照几何級数增長，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輕他們的貧苦負担"③。因此，合作运动就从两个方面教育了工人：一方面它加强了工人的自信，对于雇佣劳动制度的必然被代替認識更清楚了；另一方面，它教育了工人必須夺取政权，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否則合作运动是不能使无产阶級从根本上得到解放的。而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就必然有无产阶級的国际团結。

上述經济、政治以及无产阶級的觉悟程度等方面的情况，就造成了无产阶級在組織上实现国际团結的必然性，这也就是第一国际产生的經济、政治等方面的历史背景。

从整个世界无产阶級革命运动的历史看，第一国际存在和活动的时間，虽然是短促的，但它对世界无产阶級革命运动都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它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領导下，把馬克思以前的一切非无产阶級社会主义流派納入了一个軌道，把他們統一在一起。从第一国际成立那一天起，

---

① 轉引自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編"近代史教程"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95頁。

② 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见"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61頁。

③ 同上書，第360—361頁。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

姜德昌　張弓长

无产阶級在为实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爭中，組織成为政党的問題是关系着无产阶級革命斗爭成敗的关鍵，正如列宁所說："无产阶級，在为政权斗爭中，除組織而外，再沒有別的武器。"①許多历史事实証明：无产阶級只有当它組成政党，而这个政党又是以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时，才能将革命逐步地导向胜利。共产主义者同盟，就是第一个以科学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級的国际組織。它是在正义者同盟改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馬克思、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級政党的斗爭中的第一个光輝成果，是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相結合的重要一步。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在欧洲的主要国家中，如英、法、德，資本主义迅速地在发展，工业革命已經完成或者正在迅速进行，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經确立起来了。資本主义的发展，暴露了資本主义仍然是一个建立在人剝削人的基础上的社会，无产阶級反对資产阶級的斗爭已逐漸占居主要地位，引起了人們的普遍注意。十九世紀三十到四十年代，在英国发生了强大的、以要求眞正的普选权为主要內容的宪章运动。按照列宁的說法，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眞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形成了的无产阶級革命运动"②。在法国曾在1831年、1834年連續发生两次著名的里昂工人起义，在第二次起义中.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口号；此后在法国工人当中产生了多种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秘密結社。1844年在德国的西里西亚也发生了工人起义，馬克思認为这次起义已經"是意识到无产阶級的本質"了。这些事件充分証明，十九世紀三十到四十年代的欧洲无产阶級已經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然而，尽管如此，这个时期的无产阶級仍处在"摸索自己的道路"的阶段，組織性、自觉性还很差，还沒有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論，因而也沒有能力克服运动的自发性和擺脫資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的影响。这无論在英国、法国以至德国都明显地表現出来。如英国的宪章运动就未意识到消灭私

① 列宁："進一步，退兩步"，見"列宁文选"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55頁。

② 轉引自叶菲莫夫"近代世界史教程"上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08頁。

馬克思就抱定一个目的，要把欧美工人阶級中所有一切具有战斗能力的分子統一成为一个偉大的战斗队。为此，馬克思不放弃一切进行阶級斗爭的机会，用在报刊、会議上交換意見的办法，逐漸引导工人群众接受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在組織上制定了为英国工联派，法、比、意、西班牙等国普魯东派，以及德国拉薩尔派都能接受的綱領。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流派的妥协，而是通过又联合又斗爭的方式，組成无产阶級国际斗爭中的統一战綫，組成一支統一的国际斗爭的战斗队伍。

从国际成立那天起，在国际內部就貫穿着尖銳的斗爭，第一国际的全部历史，就是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无产阶級社会主义流派斗爭史，这种斗爭的过程，就是馬克思主义彻底战胜馬克思以前的各种非无产阶級社会主义流派的过程。至1872年海牙大会，致命的批判了巴枯宁主义后，斗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了絕对的胜利。因此，第一国际在理論上思想上为馬克思主义的广泛傳播，使各国无产阶級擺脫各种非无产阶級社会主义流派的影响做出了巨大供献。思想上的統一是組織上統一的基础，这种思想上的統一，就使第一国际在組織上为无产阶級的国际团結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正象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所說的："固然，国际本身只存在过九年之久。但它所創立的全世界无产阶級永久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先前任何时候更加坚固"。

其次，第一国际使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結合起了重大作用。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結合是从馬克思主义产生开始的。馬克思主义从产生那一天起，就以战斗的姿态密切地与工人运动相結合的。但是当时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終归还是少数的无产阶級先进分子，特别是1848年6月巴黎起义失敗以后，資产阶級对工人运动进行殘酷鎮压，"共产党宣言"被宣布为非法讀物，馬克思恩格斯的活动受到了很大限

有制的必要性，合法主义的幻想还占支配地位；法国的工人阶級虽同資产阶級进行了英勇的斗爭，但对斗爭的目标和方法缺乏明确認識，处于布朗基密謀主义和普魯东的小資产阶級社会主义的影响之下；德国工人阶級的觉悟性，如前所述，在它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虽然比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級稍高，也仍未超出自发的阶段，"眞正社会主义"和魏特林思想在工人中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見，日益高漲的无产阶級革命运动，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指明无产阶級斗爭道路的科学理論。没有这个理論，无产阶級就不能获得胜利。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級狀况"一书中分析英国宪章运动的教訓时指出："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的合流，法国共产主义在英国条件下的重現，——这必然是最近的将来就要发生的，而且已經部分地发生了。只有在实現了这一点以后，工人阶級才会眞正成为英国的統治者。"①这个指示，同样适合于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

但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結合，并不是一个簡单的过程，而是預定要經过一系列的斗爭。社会主义的学說，必須根据工人运动的經驗，加以根本改造，抛弃其空想成分，将自已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以便眞正能够給无产阶級指示道路；而无产阶級也必須根据自己斗爭的經驗，批判自己队伍中的种种落后傳統和烏托邦思想，接受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創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并把它和工人运动結合起来这个艰巨的任务，是由德国人民的偉大儿子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无产阶級的历史作用，指出无产阶級是負有推翻資本主义社会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使命的阶級。于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从此，社会主义就逐漸地和工人运动結合起来了。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級革命事业而斗爭的第一个成果，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历史上第一个以先进的革命理論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級政党。

如前所述，共产主义同盟的产生，一方面是經过正义者同盟內部的斗爭；另方面是由于馬克思、恩格斯积极的工作，对同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的結果。

正义者同盟是工人的秘密革命組織，盟員多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它是1836年在巴黎組成，是1832年成立于巴黎的德国革命民主主义的組織——"被压迫者同盟"分裂的結果。被压迫者同盟的分裂开始于1836年，継續到1837年，最后形成了正义者同盟。被压迫者同盟的分裂意味着同盟按着无产者与小資产阶級分子間的阶級分野而重新改組了。恩格斯在追述这一段历史时說道："1834年由德国侨民在巴黎創立了被唾弃者民主共和主义秘密同盟，1836年从这个秘密同盟里分出了最急进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級的分子，他們組成了一个新的秘密同盟——正义者同盟。"②1838年同盟通过了新的章程。根据新的章程，同盟采取了更加民主的組織形式；但是仍然保持了許多旧的密謀傳統和組織形式。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同盟几乎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7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36頁。

制，使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結合受到了相当的影响。但是历史的車輪是不因反动势力的一时猖獗而倒轉的，当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后，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結合又找到了很好的形式。在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它的章程中，就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級革命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推翻資本家政权并建立工人阶級政权；并指出了工人阶級的解放应該由工人阶級本身去爭取。此后，在历届国际大会上，馬克思所写的各种文件，不仅是无产阶級战斗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結合的典范性的文件。这些文件到今天还有它重要的現实意义。此外，第一国际活动的后期馬克思完成了他的不朽的巨著"資本論"的第一卷。为此，国际在1868年第三次大会上通过决議，要求各国工人注意剛剛出版的这一巨著，并号召他們协助将这一部最重要的著作由德文譯成其他各国的文字。毫无疑問，没有第一国际这样世界性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級的革命組織，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結合，是不能順利地实現的。所以，第一国际在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結合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貢献。

再次，正因为第一国际把馬克思以前的各种非无产阶級社会主义流派納入了革命的統一的軌道，彻底地战胜了这些流派，广泛地傳播了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結合，因此，它成了馬克思恩格斯为成立无产阶級政党所进行的斗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奠定了准备工人对資本举行革命进攻的工人国际組織底基础"①，"它在工人解放的斗爭史中是万古長存的。它奠定了我們現在幸福地建設着的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厦的基础"②。

① "列宁文选"，兩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68頁。

②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56版，第210頁。

都是由手工业者組成的；同时，新的同盟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密謀团体具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参加了布朗基領导的“四季社”，也不能不受法国密謀傳統的影响。1839年5月12日布朗基所領导的“四季社”发动了起义。同盟的成員也参加了起义，分担了他們法国同志的失敗。1839年5月起义的失敗，对于正义者同盟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盟的領导人沙配尔、摩尔等已深深感到密謀的斗爭方法的錯誤。因而盟內产生了一种如恩格斯所說的新現象，“一般老革命者固执成見，开始跟那些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更正确見解发生冲突了。”确实，这些錯誤的斗爭方法，只有失敗才能使盟員們摆脫。以后，同盟的領导者，許多人移居瑞士和英国。一方面，魏特灵于1841—1843年間在瑞士展开了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的宣傳工作，組成了同盟的秘密公社和一些教育协会。魏特灵曾是同盟的思想家。瑞士一度成为同盟的活跃中心。但从瑞士政府下令驅逐魏特灵并禁止同盟活动以后，同盟的活动又削弱了。另方面，自1840年以后，同盟的活动中心逐漸轉向倫敦。除了德国人之外，还有瑞士人、英国人、匈牙利人、捷克人、俄国人和其他民族的代表加入同盟所組織的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协会同法国革命家、英国的宪章主义者和波兰的民主主义者取得了联系。因此使得同盟具有了国际性質。同盟活动中心之轉移倫敦，对于同盟的发展，又是甚为重要的一步。英国的倫敦是当时世界上資产阶級和无产阶級斗爭最发展的地方，无疑会給盟員的思想以进步影响。同盟的領导人，如沙配尔、鮑威尔等已能亲自观察英国現代无产阶級的革命活动，因而加速了他們拋弃旧观点的过程。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同盟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下开始醞育克服魏特灵思想，“眞正社会主义”和普魯东主义影响的能力。1846年，同盟的先进部份对魏特灵思想展开了斗爭。可見同盟在斗爭过程中已开始感到烏托邦思想和密謀的斗爭策略的錯誤并要求摆脫它；可是，同盟的領导者在未亲身領会和接受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影响以前，是不能根本摆脫这些烏托邦思想及小資产阶級思想的束縛的。

馬克思、恩格斯于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期已經完成了創造科学共产主义的任务。但是，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单是什么哲学‘学派’的創始人，他們是日益发展壮大的活生生的无产阶級运动的活生生的領袖”①。因此，他們就“深深参入政治运动”，“并且跟有組織的无产阶級建立有相当大的联系”，开始为建立无产阶級的革命政党而斗爭。关于无产阶級先进分子組成政党的学說，在馬克思主义理論中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馬克思、恩格斯始終认为“工人阶級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級自己的事情”。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創立无产阶級政党的斗爭中，首先遇到的情况是各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級絕大多数还沒能摆脫資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思想及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其中魏特灵思想，“眞正社会主义”和普魯东主义的影响較大。为了建立无产阶級政党，必須和这些錯誤思想进行堅决的斗爭，才能为建党奠定統一的思想基础；同时，这也就决定了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最具有国际性的无产阶級組織——正义者同盟的态度，即积极爭取根本改造同盟的态度。正因为如此，最初，馬克思、恩格斯虽拒絕入盟，但却一直和同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为了实現这个任务，1846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布魯塞尔創立了共产主义通訊委員会，并号召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同道建立同样的委員会。馬克思、恩格斯把德国的許多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工人、英国宪章主义者革命派代表，以及比利时等其他国家的某些社会主义者吸收入委員会。这个通訊联系的中心是馬克思、恩格斯亲自領导的布魯塞尔委員会。这个委員会同德、英、法各国許多社会主义者建立了接触。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各地的通訊委員会应該促成組織无产阶級的革命政党。共产主义通訊委員会不仅是馬克思、恩格斯宣傳与团結少数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的手段，而且是反对构成正义者同盟思想方向的烏托邦与小資产阶級社会主义的折衷主义观点，以及宗派和密謀策略的重要武器。馬克思、恩格斯首先对已經加入“共产主义通訊委員会”的魏特灵展开斗爭。魏特灵对資本主义曾作了天才的批判，是“德国工人的光輝的处女作”，但魏特灵不了解无产阶級的历史作用，主張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和密謀暴动的策略，因而严重阻碍无产阶級自覚性的成長。1846年3月30日在布魯塞尔委員会上，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学无术，对任何人都不会有所帮助”，严厉批判了魏特灵的空想主义观点和密謀策略，大大加速了正义者同盟盟員从魏特灵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継而，馬克思、恩格斯又进行了反对“眞正社会主义”的斗爭。“眞正社会主义”是反动的小資产阶級社会主义，鼓吹阶級合作的思想，不承認革命的斗爭方法的必要，实質上是反对消灭資本主义。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眞正社会主义者”赫斯、格倫等人拒絕革命斗爭的本質，并指出“感伤的幻想的博爱”和“哭哭啼啼的仁慈”的无用。馬克

---

①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18頁。

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态"一书从理論上給"眞正社会主义"以毁灭性打击。1846年8月恩格斯到达巴黎，在这里展开了巨大的宣傳与組織工作，摧毁了"眞正社会主义"者在巴黎工人中的影响。在正义者同盟改組以前，馬克思、恩格斯反对資产阶級思想影响的最后一个决定性的斗爭是反对普魯东主义。普魯东不贊成罢工，否認工人阶級进行政治斗爭的必要性，否定一切国家組織，給工人运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1847年秋季，馬克思写了"哲学的貧困"一书彻底清算了普魯东的思想，指出无产阶級必須夺取政权以便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經过馬克思、恩格斯一系列的理論斗爭的結果，正义者同盟的多数領导人如摩尔、沙配尔、沃尔夫、普芬德、爱卡留斯等認識到观点的錯誤，接受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并团結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周圍了。总之，如恩格斯所說："以往流行的理論观念的毫无根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踐上的錯誤，愈来愈使倫敦盟員相信我們即馬克思和我的新理論是正确的。"①于是就为从根本上改造正义者同盟即改組同盟創造了实际可能。

1847年2月正义者同盟派遣摩尔去見馬克思，建議馬克思加入同盟，然后又建議恩格斯加入同盟；并且同意根据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改組同盟，剷除同盟的宗派、密謀傳統。馬克思、恩格斯同意加入同盟，并将談判的协定通报給自己的同志。随后又将布魯塞尔通訊委員会改为同盟的支部。

1847年6月在倫敦召开了正义者同盟代表大会，它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載入史冊。馬克思没能出席这次代表大会。恩格斯以同盟的巴黎代表身份，沃尔夫以布魯塞尔代表身份参加了大会。摆在代表大会面前的基本問題是通过盟的新的章程，这就意味着要根本改造正义者同盟。在恩格斯所草拟的章程的第一章为同盟的綱領确定了馬克思主义方向，指出："同盟的目的——推翻資产阶級，建立无产阶級的統治，消灭旧的建筑在阶級对立基础上的資本主义社会并建立新的没有阶級没有私有制的社会。"恩格斯和沃尔夫在制定章程的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他們把民主集中制确定为同盟的組織原則，克服了宗派主义和密謀策略，通过了同盟的組織机构：公社为基础組織，区、領导区、中央委員会和盟的最高机关——同盟的代表大会。馬克思主义方針在代表大会上所获得的胜利，也在同盟改組的名称上得到了自己的表現；从前反映空想社会主义方向的口号——"人人皆兄弟"，現在为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新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代替。这个反映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实质的革命口号是对国际无产阶級运动的号召。新的章程，送交各地支会討論以后，应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最后通过。代表大会还坚决地指責了魏特灵的观点和行为并确定把他开除出同盟。为了实現新的决定，新的中央委員会在1847年9月出版"共产主义杂志"創刊号。中央委員会地址設在倫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主要是对正义者同盟实行改組并确定盟的方向，但是从根本上改造同盟的任务并未結束。为了巩固这个胜利，馬克思、恩格斯又展开了为同盟制定馬克思主义綱領和策略原則的斗爭。1847年8月馬克思在布魯塞尔組成了同盟的公社，同时建立了布魯塞尔区委会，馬克思担任主席。布魯塞尔公社是同年8月底由馬克思組織的德意志工人地方教育协会的領导核心。馬克思、恩格斯使"德意志布魯塞尔报"服从自己的影响，并在1847年10月成为它的实际編輯。完成同盟改組，通过新的綱領，把同盟从非无产阶級的成分中彻底解放出来的必要性，使得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成为迫不及待之事。在代表大会前几个月里，中央委員会把綱領草案以問答形式送交給各公社，以便討論。这个文件只保存了一部分，但也証明了中央委員会还没有完全克服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在巴黎公社討論草案时，恩格斯提出自己的綱領草案，即有名的"共产主义原理"，它成为共产党宣言的草稿。

1847年11月29日在倫敦召开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共开了約两星期。来自德国、法国、比利时、英国、瑞士、波兰的同盟成員参加了大会。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代表大会上起了領导作用，他們决定了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所有决議的性質和內容。在代表大会上最后通过了同盟的新章程，考慮了各公社提出的所有意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通过下列决議：同盟今后在全世界面前应該公开地宣告自己作为共产党而存在并公开宣布自己的理論原則，决定以共产党宣言的形式公布新的同盟綱領。这个問題經过較多时間的討論后，科学共产主义原則胜利了。恩格斯写道："最后，所有分歧和怀疑都消除了。新的原則一致通过了。草拟宣言的工作委托給我和馬克思。"1848年2月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馬克思主义的綱領文件公諸于世界。

共产主义者同盟虽然系正义者同盟改組而成，但实質上是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新同盟。它无論在綱領与策略上都根本区别于以前的一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組織，它是革命的无产阶級政党的雛形。

---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4頁。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科学綱領，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为馬克思主义理論研討的最高总結，是人类社会思想发展中的眞正革命。宣言旣闡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論，又号召工人組織政党，为推翻資本主义而团結起来。宣言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偉大的战斗号召作为結尾。现在，宣言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它不仅如恩格斯在1890年所說，宣言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傳布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亞起直到加利福尼亞止的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綱領”①；而且在苏联、中国以及人民民主国家的九亿人口中变成了现实。

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后，即面临着革命形势。不久，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开始了。同盟中央委員会鑑于同盟的活动已进入严重的时期，确定把全权交給布魯塞尔区委会，它是由馬克思領导的，以便在布魯塞尔建立新的中央委員会。但是由于比利时政府对共产主义者实行警察迫害，并且馬克思需要立即去巴黎，由他們所建立的新中央委員会在3月3月自行解散，委托馬克思在巴黎建立新的中央委員会。馬克思、恩格斯及同盟其他活动家到了巴黎，重建了中央委員会。馬克思、恩格斯都加入了中央委員会并通过了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拟定的、党在开始的德国革命中最重要的策略文件，——“德国共产党要求”。从德国革命的最初时期起，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就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在巴黎建立了德意志共产主义俱乐部，在德国工人当中进行解釋工作，以便鼓动他們秘密返回祖国，为开展革命运动而工作；这样先后共派了三、四百名工人返回了德国，其中多数是同盟成員。1848年4月初，馬克思、恩格斯及盟的其他領导人也回到了德国，目的在于巩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創办大型革命日报。馬克思、恩格斯熟悉了同盟在德国的狀况以后認識到：在正在开展的人民革命面前，不多数量的同盟成員分散在全国各地，彼此很少联系，对工人群众很少能发生影响。馬克思、恩格斯同样估計到，工人大多数仍然处于資产阶級民主派的影响下面。在这种条件下，馬克思、恩格斯認为最好同盟成員在最初阶段参加到处成立的民主协会，在其中采取民主党的极左派立場。他們認为对工人运动总的領导最好也不通过中央委員会，而是通过全德革命报紙。1848年6月1日在科倫出版馬克思、恩格斯主办的“新萊茵报”。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活动中馬克思、恩格斯展开了两条战綫上的斗爭，一方面尖銳地批判了哥德沙克的左傾宗派主义的策略；另方面也尖銳地批判了波倫的右傾工联主义策略，它使工人离开实现直接的革命任务。共产主义同盟是革命活动的絕好学校。同盟成員到处是民主运动左翼的領导，号召人民群众进行反对反动势力的坚決斗爭，揭露了大資产阶級的叛卖和小資产阶級的胆怯与懦弱。当工人阶級从革命当中获得了經驗，不断从資产阶級民主派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并尋找独立組織道路时，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朋友們在1849年4月退出了民主协会。他們着手組織召开同盟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以便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德国革命的失敗阻止了这个任务的实现。同盟成員都参加了1849年夏发生的最有意义的起义。他們参加了反对萊茵省、薩克森和南德反动势力的武装斗爭。

1949年底馬克思、恩格斯在倫敦积极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改組并領导改組的中央委員会。为了总結1848—1849年革命的斗爭經驗，以科学的理論和策略武装同盟的成員，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1850年初在倫敦出版杂志“新萊茵报。政治經济評論”；也为了同样目的，同盟的中央委員会于1850年3月頒布了“中央委員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馬克思在这个著作中进一步闡明了不断革命的思想。这一偉大的思想，后来为列宁和毛澤东同志所发展，至今指导着世界各国革命运动不断前进。同盟的領导也和宪章的左翼代表（哈尼和瓊斯）以及法国侨居英国的左翼——布朗基的拥护者締結了建立合作的协定。

1850年秋，馬克思在分析經济发展的基础上得出結論：最近时期不可能有革命的新高漲，主張同盟的策略应相应地轉变。这种对形势的清醒分析引起同盟中央委員会少数成員的不滿（威理赫、沙配尔），他們处在小資产阶級思想的影响下，主張冒險主义和盲动的策略。馬克思指出“少数派以教条主义的观点代替批判的观点……在少数派看来，革命的动力不是现实的各种关系，而只是意志”。1850年9月倫敦中央委員会发生了分裂。馬克思、恩格斯領导的中央委員会多数为了阻止威理赫和沙配尔的冒險活动，決議将中央委員会迁至科倫。少数派又組成了自己的同盟，这个派别的密謀促成1851年5月在德国对同盟成員的大量逮捕。普魯士政府借助謊言、捏造和一些挑撥，扮演了1852年的科倫共产党人审判案。正象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科倫审判終結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时期。1852年11月同盟根据馬克思的提議宣布解散。

共产主义同盟虽然存在时間不長，并且未能发展成群众性的无产阶級政党，但它的意义是巨大的。恩格斯說：“这个不大的战斗队，具备有馬克思为其第一流的領袖——大家都乐于服从的領袖，并且賴有他而具备有一个至今还保留其全部意义的原則性的和策略的綱領——共产党宣言。”②同盟是革命活动的极好学校，是各国无产阶級国际团結的最初組織形式，是无产阶級共产主义政党的雛形。

---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26頁。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法国的里昂工人起义

肖兰瑞

1831年11月和1834年4月，法国的里昂絲織工人为了摆脫貧困反对他們的直接剝削者，举行了起义。这是法国工人运动史上一个新的阶段，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斗爭而死！”这是当时里昂工人写在自己战斗旗帜上的一句豪迈的口号。可是，当时工人們还没有什么綱領，缺乏組織和正确的革命理論指导，当时的社会主义的理論家，只不过是聖西門的信徒和布朗基主义者，当时虽然也出現了工人的团体，但这些团体組織得很不健全，而且相互之間沒有什么联系。当时虽然也有工人阶級的活动家，而这些活动家都很接近于手工业者，以为无产阶級只要組織生产合作社就能自我解放。这就使这次起义終归失败。

一

十六世紀以来，里昂已成为法国的一个重要工业城市，絲織工业占居首要地位。十八世紀資产阶級革命以后，絲織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城市人口增加得非常迅速。1803—1831年，里昂人口从九万三千人增加到十四万六千人。其中仅絲織工人，就有三万八千人之多，而女工和童工还未計算在內。

在当时的絲織工人中，大約有八千人为作坊主或师傅，这是一些拥有生产工具——織布机（平均每人拥有二——八台）而在自己家庭組織劳动的独立手工业者。他們从制造商（不直接从事生产，供給作坊主以原料，使之加工生产的中間剝削者）那里取得原料，在自己的作坊里进行生产，工資是按件計算的。由于他們自己缺乏資金購买原料，所以不得不忍受制造商的任意制定的低工价而受着殘酷的剝削。作坊主往往因为自己人手不够，在接受定貨后又为合同时間所限，所以經常招雇幫工、妇女、学徒或童工到自己家里来做工。这种幫工是一无所有的眞正无产者，他們約有三万人，虽然幫工、妇女、儿童也間接受到作坊主的剝削，他們和作坊主之間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因制造商是他們的共同剝削者，所以他們在反对制造商这一点是一致的。

当时絲織工人的生活是非常困苦的。他們的工作时間長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在夏季，往往从早上三点半到夜晚十二时，冬季則从早上五点到夜晚十一点，而他們的工資却低得无法維持生活。例如工人們由于房租太貴，一般地是住在城外的山坡或山頂上一些破旧、潮湿的黑暗无光的小閣楼里。往往一个一丈見方的小閣楼里，就得挤上一家大小七、八口。由于工作过度劳累，得不到溫飽，即使是一个健壯的农村青年，不久就变得瘦骨嶙峋、面色蒼白、四肢无力的病夫了。另外从当时里昂城弃婴人数的逐年增加也可以得到証明。1814年全城有四千七百七十八个弃婴，1828年則增加到九千零三十二个，增加了将近一倍。

二

尽管絲織工人的生活已經穷困到如此可怕的地步，可是制造商們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潤，却在一味地压低工資。因而在作坊里便产生了这样的要求：如果要反对降低工資，必須規定一个不許制造商任意压低的标准工价。1831年10月16日，經过作坊主們的集会，終于通过了一个完整的标准工价草案。这个标准工价草案在10月25日被提到作坊主与制造商代表联席会議上去討論。因为織工們都知道：无論是省長或制造商們将会給标准工价以完全否定，为了支援作坊主，六千名絲織工人的队伍从郊区来到了省長公署的門前进行和平示威，这样終于迫使会議通过了标准工价的草案。

当絲織工人正在懸灯結彩庆祝自己的胜利时，里昂的制造商們向巴黎的內閣总理遞呈了一个反对标准工价的控訴书，內閣立刻否定了标准工价草案。于是激怒了的織工，在11月20日秘密地举行会議，决定从第二天起全体停止工作，实行武装起义。这就是法国史上有名的第一次里昂工人起义。

这次起义是从11月21日晨七时开始，至11月23日夜二时止，以絲織工人的完全胜利而結束的。絲織工人的起义获得了各行各业兄弟工人的支援，成衣匠、鞋匠、瓦匠、木匠、园丁、制鎖匠、車夫和短工等都

勇敢地参加了战斗。起义者用長矛、腰刀、棍棒及步枪等武器击潰了国民自卫軍（制造商所組成的）与正規队伍，他們攻陷了兵器庫与国民軍营房，最后占領了市政厅及整个城市，省長及地方当局，还有奥多諾将軍都做了起义者的俘虜。“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斗爭而死！”这是当时引导工人們奋勇前进的战斗口号。

可是缺乏严密組織的里昂工人，不善于利用自己胜利的果实。他們占領了城市十天，但却没有将政权拿到自己的手里，他們没有解除国民自卫軍的武装，没有积极組織城市的防御，甚至在胜利的第二天就将主要的人質——省長与将軍完全释放了。他們只限于組織临时参謀部去监督地方官的行动。这样就給战敗的敌人以喘息机会。几天以后罗蓋伯爵就收集了一支二万多人的队伍，12月3日攻入了里昂城。第一次起义被鎮压下去了，許多起义領袖遭受逮捕监禁，一万多名的工人被放逐了。

三

1834年4月，里昂又发生了新的工人起义。这次起义是从“保卫結社权”的斗爭发展起来的。自上次絲織工人起义失敗以来，工人們的物質生活絲毫没有得到改善，工人們認为只有結社才能摆脫貧困。“劳动者只有組織起兄弟般的团体来，才能改善他們的命运。”这就是1833年5月12日里昂絲織工人的“工場回声报”的号召。根据官方材料：1833年里昂“各行各业的工人中間出现了結社狂”。例如，織法兰絨的帮工們就組織了法兰絨織工会，要求限制劳动时間，其他許多行业的工人如薄紗工人、成衣工人、头紗工人等也都組織起来了。

与此同时，法国各城市各行业的工人，也都組織了“联盟結社”。1832—1834年，法国工人运动出现了一个新高潮，工人的騷动与罢工，此伏彼起。1834年2月12日，里昂制帽工人反对压低工資，就曾举行了十天的总罢工，并得到其他各行业工人的支援。共和主义者特別是小資产阶級的共和主义团体，也开始在工人阶級中进行活动。資产阶級政府立刻意識到这种工人的結社与共和主义团体的存在，特别是两者的互相結合，严重威胁到七月王朝的寿命。1834年3月25日，国会通过了取消一切大小形式結社的法令。

为反对政府的禁止結社的法令，里昂的工人們决定再一次用自己的鮮血来保卫自己的劳动与生活权利。因为結社对于当时法国工人来說，这不仅是为了斗爭，同时也为了組織到生产合作社去，而他們正認为这是工人阶級自我解放的唯一道路。于是小資产阶級的“人权社”与里昂各紡織业工人协会組成了一个“統一委員会”，并决定在4月9日，即2月制帽工人罢工案件被捕領袖受审的那一天，举行总罢工示威运动。进而发展为里昂工人的第二次起义。

这次起义与第一次起义的不同点在于它带有鮮明的政治性質。工人要求建立共和国，并发表了起义宣言。宣言中写道：“我們爭取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是我們祖国的幸福，未来的保証！”可是这次起义是在更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資产阶級政府早已作好了准备。4月8日夜間，政府已調集了一万多名軍队，占領了各十字路口与主要建筑物。9日清晨城郊四周的高地都已安好了大炮。然而起义工人还是发揮了无比英勇的气慨，与政府軍进行了四晝夜的激烈战斗，最后到12日才在敌人的优势炮火轟击下遭受到了失敗。

这次起义比11月起义获得了更广泛的响应。4月間在聖亚田、在亚尔波亚城、在格勒諾布尔、在馬賽、在夏龙許索恩……等城市都发生了示威或起义。尤其是4月13—14日，巴黎的工人們在馬兰区、蒲波尔街、奥白里勃波雪街以及特朗斯农安街筑起了起义工事。梯也尔政府用最殘酷的手段鎮压了这些起义，并造成駭人听聞的特朗斯农安街大屠杀案件。

四

里昂絲織工人起义运动虽然失敗了，但是这次运动显示了覚悟了的工人阶級的力量。只是由于当时工人阶級的不成熟，才最后的遭到了失敗，这种不成熟首先表现在当时的工人还未形成为一个单一的阶級。作为手工业者的作坊主和无产阶級的帮工，所以能够团結起来共同反对制造商，是由于他們都受着制造商的殘酷剝削，而作坊主所遭受制造商的压迫更为直接些，所以运动的倡議来自作坊主，而要求規定标准工价的也正是他們。然而帮工們却人数众多，他們的生活也最为貧困，所以他們不仅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且也在运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因作坊主与帮工所处的經济地位不同，他們对运动的要求与态度也就相异。作坊主是拥有紡織机的私有者，他們只要求减輕对制造商的从属地位，所以其斗爭是不徹底的。而帮工們則不同，他們一无所有，在运动中只会失去自己頸上的一条鎖鏈，所以他們斗爭意志最坚决。作坊主与帮工們的这种矛盾，表現在起义期間彼此意見不一致，有时甚至发生冲突，这是起义失敗的原因之一。

其次，工人阶級的不成熟，表現为缺乏严密的組織。当时不但没有自己的政党，甚至工人的組織也是不

健全的。第一次起义以前作坊主之間虽已有互助会的組織，但这种互助会不但对帮工們怀有戒心，而且也不能团結所有的作坊主，例如1827年作坊主皮埃尔·沙尔尼埃所組織的互助会，就坚决不許拥有六台織布机和二个学徒以上的作坊主参加。1833年，在所謂"結社狂"的年代里，里昂虽然成立了許多帮工的織工会：如法兰絨織工会、薄紗工人协会，头紗工人协会……等，而他們之間則缺乏密切的联系，也没有全城的总工会或中央委員会一类的組織。所以当第二次起义前夕，"人权社"要和絲織工人建立統一战綫时，不得不分別与各行各业的織工会进行联系。这种情况也可以說是工人們不能很好地組織起来与敌人战斗，致使起义失敗的原因之一。

再次，工人阶級的不成熟也表現在起义者缺乏明确的政治綱領。在第一次起义时，除了要求規定标准工价以外，起义者没有提出其他任何的綱領。他們胜利了，他們不知如何利用这一胜利。第二次起义时，他們虽提出建立共和国的要求，但这只是在共和主义者影响之下的模糊認識。他們以为共和就是扩大选举，进行改革。而且第二次起义也只是在政府取消了結社权以后才被迫起来抵抗，它和第一次起义不同，还没有能够占領城市，就被政府鎮压下去了。

最后，工人阶級的不成熟，还表現在没有正确的社会主义理論作指导和缺乏强有力的工人領袖。科学社会主义是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才出現的。当时的理論家只是一些没有脫离空想主义的聖西門的信徒及布朗基主义者。聖西門派在里昂工人中进行过一定的工作，他們的演講和宣傳对于啓发工人的觉悟是有过一定的作用。可是他們的信条依旧是："只有上层阶級伸出手来，下层阶級才会想到提高自己。"所以事实上他們还在企图阻止这次斗爭。布朗基的"人民之友社"和"人权社"虽然也曾出版过一些小册子，在揭露資产阶級与工人之間的矛盾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这些小册子的內容还是没有摆脫空想主义或資产阶級自由主义的影响，他們对于工人阶級的罢工，抱着完全否定的态度。他們說："經驗向工人証明，这种反抗（指停止工作）不能給工人們带来任何好处。这种葯比病本身还坏。"因此，它不仅无助于工人阶級的斗爭，相反却起着极为有害的作用。

在里昂工人起义中，曾經涌現出不少出色的战士，他們都十分勇敢，对制造商怀着深刻的阶級仇恨。他們善于作战，在行动中表現了主动活跃，秩序井然。可是由于他們却缺乏强有力的領袖，以至占領城市以后不知如何利用自己的胜利。他們没有夺取政权，不知道要摧毁資产阶級的国家机器，致使革命的敌人获得喘息的机会，重整力量实行反扑，使革命遭到失敗。

总之，里昂起义失敗的原因，在于工人阶級的不成熟；而工人阶級的不成熟，又是由于法国当时經济的不发达所造成的。在当时法国的資本主义工业，还处在最初发展的阶段。因它还没有出現单一的近代工业无产阶級，工人的阶級觉悟与組織程度还很低，还不能提出明确的政治綱領。至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不存在以及缺乏强有力的領袖，这些也都是和大工业还未发展起来联系在一起的。

五

里昂工人的两次起义，虽然失敗了，但是它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里昂起义以前，法国工人阶級虽然富有革命的历史傳統，但是它始終没有作为一个独立阶級而登上历史舞台。七月革命之后，法国工人阶級的斗爭虽然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这些斗爭还只限于象搗毁机器一类的的原始斗爭形式，还不懂得直接对社会制度（資本主义）和阶級敌人（資产阶級），即工人阶級所受痛苦的根源，进行斗爭。可是里昂起义却是在同一社会內有产阶級和无产阶級之間的直接斗爭。正如苏联历史学家伏尔金所說："这是第一次起义，在这次起义中，工人阶級已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出現了。这一次起义已在世界的历史上开辟了新的一章。对資产阶級說来，它的掘墓人是已經站起来了。"①

里昂起义不但为法国各城市的工人斗爭树立了光輝的范例，在"要效法里昂工人"、"里昂工人是我們的榜样"、"里昂工人万岁"的口号下，从1832到1834年，全国各城掀起了一个"結社联盟"、罢工示威和武装起义的高潮②；同时里昂起义也是1838—1848年的英国宪章运动和1844年的德国西里西亚織工暴动的先驅。宪章运动和西里西亚的織工起义，这在英德两国的工人运动史上都有划时代的意义。恩格斯曾写道："在很早以前，已經发生了一些历史事件，它們引起了历史观上的坚决的变革。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到1842年間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英国的宪章运动，达到了它的頂点。一方面随着大工业发展的程度，他方面随着資产阶級不久以前所获得的政治統治权的发展程度，无产阶級和

---

① 讓·勃呂阿："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三联書店版，第240頁。

② 参閱讓·勃呂阿："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三联書店版，第243——250頁。

资 料

抗日战爭时期中國共產党党报和主要進步报刊簡介

文 琪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中国人民奋起抵抗，展开了全国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八年的抗日战爭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領导，依靠人民群众的团結斗爭，依靠人民統一战綫和人民战爭，打败了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正如同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在八年抗日战爭中所获得的空前发展一样，党和革命报刊事业在这个时期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这个时期，党在敌后革命根据地的报刊活动空前加强起来，党在根据地的机关报刊“新中华报”、“解放”周刊、“解放日报”等先后創刊。各个根据地小型的油印刊物大量出現。此外，党在国民党統治区也公开創办了自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加强了对进步新聞事业的摧残，但党的和在党領导下的革命报刊在对敌斗爭中，在反对国民党迫害的斗爭中継續成長壯大。它始終高举着革命的旗帜，在宣傳党的方針政策和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和革命根据地、国民党統治区一样，党在淪陷区也同样是用尽一切办法，出版了自己的刊物，来揭露敌人的欺騙宣傳，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爭。本文因篇幅所限，仅就党在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統治区的报刊，重点作一介紹，以供搜集这个时期史料的参考：

一 在革命根据地出版的报刊

“新中华报”，它的前身是“紅色中华”。“紅色中华”原是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中央紅軍胜利完成長征后，在陝北瓦窰堡复刊。双十二事变以后，党为了适应統一战綫形成后的新情况，將它改名为“新中华报”，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并由油印改为鉛印。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又改組为党中央的机关报，并由原来的五日刊改为三日刊。我們現在看到的“新中华报”影印本，是从1939年2月7日到1941年5月15日停刊止，共230号。

除“新中华报”外，党在1937年4月24日又創办了党中央的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以更加有力地向全国宣傳党的主張。“解放”周刊从1937年4月24日創刊起到1941年6月15日停刊止，共出130期。

“新中华报”和“解放”周刊在抗日战爭前夜，在进一步为巩固国内和平、爭取民主、实現抗战而斗爭方面，就曾起过一定作用。抗日战爭爆发后，它們又担負起了历史所賦予它們的极其浩繁而又沉重的任务。从“七七”事变到1941年5月因形势的变化而先后停刊的这个时期里，它們依照着党中央的历次指示、宣言、通电和毛澤东同志的“論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論”等重要著作，广泛地向全国人民、

資产阶級之間的阶級斗爭开始在欧洲最先进国度的历史上进居于前列了。”①

总之，里昂絲織工人的斗爭并不是徒劳无功的，它在当时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后果，而在今日我們又看到法国工人阶級在反对戴高乐法西斯統治斗爭中的那种坚强不屈的英勇无比的气慨。今日的法国工人阶級已經不再是1831和1834年的里昂工人了，他們有久經鍛煉、継承了里昂絲織工人、1848年六月起义和1871年巴黎公社无产阶級革命优秀傳統的法国共产党的領导，在法国共产党的領导下，他們在当前的保卫民主反对戴高乐法西斯化的斗爭中，在爭取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和爭取劳动人民的徹底解放的斗爭中，必將取得胜利。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4頁。

特別是解放区人民，宣傳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綫及各种具体主張。比如抗日战爭爆发以后的第二天（7月8日）党中央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軍进攻芦沟桥通电"，首先号召全国人民动員起来，全力援助神聖的抗日战爭，实行全民族的抗战。当时的"解放"周刊（一卷10期）除了发表这一通电外，还刊登了紅軍將領和战斗員要求抗日的通电。紧接着在一卷12期又发表了毛澤东同志的"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針、办法和前途"一文，它指明了抗日战爭中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綫：一条路綫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級和全国人民的"全面抗战"或人民战爭的路綫，另一条路綫是以蔣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資产阶級不要人民群众的"片面抗战"的路綫。这两条路綫之間的斗爭，是当时一切中国問題的关鍵所在。

为了动員全党全軍領导全国人民实行全面抗战，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延安附近的洛川召开了政治局的扩大会議。"解放"周刊一卷15期发表了为洛川会議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以及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綱領"，明确指出：在抗战的新阶段内，我們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別的区别与爭論，已經不是应否抗战的問題，而是如何爭取抗战胜利的問題。而今天爭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鍵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国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今天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綱領，就是爭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

圍繞毛澤东同志所写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針、办法和前途"以及洛川会議决議的精神，"解放"周刊連續地发表了一系列中央負責同志的文章，如一卷12期"实行对日抗战"、"組織广大群众到抗日战綫上来"，一卷14期"怎样爭取全国抗战的胜利"，一卷15期"一起为着爭取抗日战爭的胜利"，一卷16期"論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以及一卷17期"論抗日民族革命战爭的持久性"、"全国人民武装起来"等文，这些文章反复地集中地說明了：只有坚决实行全国性的抗战，动員千百万民众到前綫上去，才是抗战胜利最必要的条件。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經过共中央通訊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早在7月15日就已交給国民党的关于宣布国共合作的宣言。9月23日，蔣介石发表承認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談話。"解放"周刊一卷18期刊登了我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样就宣告了国共两党統一战綫的成立。在同期的"解放"周刊上，还发表了毛澤东同志的"国共两党統一战綫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一文，指出：抗日战爭需要一个充实的統一战綫，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員起来加入統一战綫中去。抗日需要一个巩固的統一战綫，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綱領，它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抗日十大綱領，然而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綱領，就需要一个实行的工具，这就是改造一党专政的政府和改造軍队，使成为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人民軍队，这就是今日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

与上述宣傳党的全面抗战路綫及各种具体主張的同时，"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一起还尖銳地揭发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的路綫和投降、妥协、反共、反人民的各种阴謀罪行，特别是在打退国民党1939年和1941年所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蔣介石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誘降和英美的策动下完全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准备投降妥协的政策。党中央在抗战二周年紀念宣言中对国内外这一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是当前抗战形势中最大的危險，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坚持抗战、团結、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而斗爭。1939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八路軍朱、彭总副司令等通电全国反对槍口对内，反对进攻解放区。同时党中央又发表了"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对任何投降、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均須在自卫原则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反抗之。"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都及时地发表了这些指示和通电，并动員全解放区軍民对蔣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軍事进攻給予坚决的回击。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了被称为皖南事变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强令新四軍的皖南部队北渡長江，然后在中途加以包圍襲击，随即又宣布解散新四軍，并进攻新四軍其他部队。"新中华报"和"解放"周刊严厉地声討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日的滔天罪行。先是发表了"为顧全大局挽救危亡朱彭叶項复何应欽白崇禧佳电"揭穿了国民党的反共新阴謀；但为了顧全大局，仍答应新四軍的皖南部队开赴長江以北；継則刊登了"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談話"、"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会发表命令与談話"，揭露了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反共投降大阴謀的第一步，呼吁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同时命令重建新四軍軍部，継續領导新四軍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当新四軍新軍部在苏北成立后，"新中华报"和"解放"周刊又发表了"新四軍將領就职通电"、"新四軍將領声討亲日派通电"以及八路軍声援新四軍的通电等，与此同时"新中华报"和"解放"周刊

还同时发表了社論"抗議无法无天之罪行"以及連續报道了国内外民主輿論斥責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破坏抗日的罪行。第126期的"解放"周刊上，还刊登了"共产党七参政員致国民参政会公函"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以及"共产党参政員董必武、邓颖超致国民参政会公函"、"共产党七参政員复函参政会重申不能出席本屆会議理由"等函电三件，拒絕出席当时蔣介石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由于这些革命措施的結果，就使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不但没有达到孤立共产党的目的，反而惊醒和教育了許多对蔣介石抱有幻想的人們，因而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

"新中华报"和"解放"周刊的另一巨大功績是深入地向敌后人民宣傳了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爭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主張与各种政策指示，如21期"华北游击战爭的展开"，25期"爭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問題"、"平型关战斗的經驗"，28期"抗日游击战爭战术上的基本方針"、"論抗日游击战爭的基本战术——襲击"，43、44合刊"論华北正規战的基本教訓与游击战爭的发展条件"，110期"冀中平原游击战爭"等；特别应該提到的是毛澤东同志在1938年5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爭的战略問題"（"解放"周刊40期），根据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規定我党直接領导的人民軍队的作战方針是"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并同时批駁了在抗战初期党內外許多人輕視游击战爭在抗日战爭中的重要作用，而把抗日战爭的胜利寄托于国民党軍队的正規战爭的錯誤观点。

此外，在宣傳根据地建設方面，"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如"解放"周刊55期"抗战以来的陝甘宁边区"、"論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68期陝甘宁边区第一屆參議会特刊（包括"陝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綱領"、边区政府組織条例、选举条例、各級參議会組織条例、边区土地条例、边区高等法院組織条例等），119期"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的施政綱領"，123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財政經济建設"，以及1941年經我党中央政治局討論、批准并于"五一"发布的陝甘宁边区新的施政綱領，在"解放"周刊第128期和"新中华报"都全文登載。

由于"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在抗战初期，它們以各种通俗口号，深入地宣傳了党的上述主張，在广大敌后人民中間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武装抗日的热潮，直接帮助了各地人民軍队的迅速壯大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建設。

这两个报刊的缺点是篇幅有限，一个是十六开版的周刊，一个是四开版的小型三日刊，这样，在当时极为严重的斗爭面前，就限制了它們担負更沉重的任务。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我們同敌伪和国民党反动派之間的斗爭，空前的紧張起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其所謂占領区后方，便集中了侵略兵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軍，对敌后軍民发起連續不断的，空前慘酷的"扫蕩"战爭；国民党为了进一步削弱我党力量，也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后面，把包圍、封鎖、进攻敌后軍民和陝甘宁边区的兵力，增加到七十九万七千八百多人。在这种严重的局势面前，我党的任务是异乎寻常地加重了，一方面要領导敌后軍民战胜数倍于我的敌伪軍的空前野蛮的进攻，另一方面又要同国民党的包圍、封鎖、襲击和投降阴謀进行异常紧張的斗爭。"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的上述缺点便更加突出地显示出来了。于是党便在毛澤东同志的提議下，在1941年的5、6月間，先后停止了它們的出版，而集中力量在1941年5月16日創办了党中央的对开大型机关报"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从1941年5月16日出版至1947年3月27日停刊总共出版了2130期，历經抗日战爭的中期、后期和第三次国內革命战爭的初期等几个不同的革命时期。它不仅帮助党和中国人民打倒了一个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帮助党和中国人民打倒了一个殘暴的蔣介石，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巨大的功勛。从出版的那天起，它就坚决地遵循着党的指示，勤奋謹愼而十分鮮明地向全国人民宣傳着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各种主張，揭发着国內外各种敌人的阴謀罪行，号召着全国人民为自己的解放而进行英勇斗爭。因此，它旣是我党在这一时期領导全国革命斗爭的强大助手，同时也是全国人民在这一时期进行革命斗爭的偉大旗帜。

1941年，敌人对我解放区进行了灭絕人性的殘酷"扫蕩"。为着战胜敌人的进攻，我党中央在这年总結了过去的經驗，制定了一系列的切合时宜的革命政策。这主要的就是：加强对敌斗爭，貫徹减租减息，普遍建立三三制政权，加强統一領导，实行精兵簡政，深入拥政爱民，开展整风运动，大力发展生产。誕生在这年5月的"解放日报"一开始便以积极地宣傳党的这些政策为中心，勇敢地投入了这一斗爭。

"解放日报"的这种宣傳是以如前所述陝甘宁边区中央局在这年5月1日公布的"陝甘宁边区施政綱領"为中心的。为了深入地宣傳这一綱領，从5月21日起，"解放日报"一連发表了"施政綱領——到群众中去！"等十余篇評論，对这一綱領提出的各种政策，作了系統的論述。随后，它又根据这一綱領的精

神，发表了二十余篇社論，論述了陝甘宁边区的战爭和建設問題。与此同时，"解放日报"还大力地报道了陝甘宁边区执行这一綱領的情况和經驗，为敌后解放区的建設，提供了生动的榜样。

"解放日报"在宣傳这一綱領中，特別强調地宣傳了党的团結一切阶层抗日人民的三三制政策，和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政策。而在这两項政策的宣傳中，又特別强調了三三制政权政策的宣傳。"解放日报"根据毛澤东同志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問題"、"論政策"、"在陝甘宁边区参議会的演說"等文中的指出，先后写了"論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質"、"切实保障人民权利"、"反对政权建設中的关門主义"等社論，深刻地闡述了实行三三制政策的偉大意义，尖銳地批判了由于国民党連續制造了两次反共高潮因而在党內产生了一种"左"的狹隘的关門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偏向。

在党的上述一系列政策当中，整风政策乃是关系着我党能否継續前进和其他各項政策能否实現的一項具有决定意义的政策。因此，"解放日报"在1942年的政策宣傳中便特別强調了整风政策的宣傳。据統計，解放日报在这年除发表了毛澤东同志的"改造我們的学习"、"整頓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及刘少奇同志的"論共产党員的修养"、"論党內斗爭"等著名的論文以外，仅为此发表的論文就有一百多篇。例如1941年5月，当毛澤东同志在延安的一个干部会議上发表了著名的"改造我們的学习"的演說，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問題以后，"解放日报"便曾发表过胡乔木等同志的許多反对主观主义的論文，1942年2月1日毛澤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发表了著名的"整頓党的作风"的第二天，"解放日报"便立即发表了"整頓学风、党风、文风"的社論，并接二連三地发表了"宣布党八股的死刑"、"展开宣傳工作上的新陣营"，"党的决定——行动的指針"、"整頓三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宣傳唯物論"等十几篇社論，深刻地論述了整风运动的偉大意义，在全党展开了大規模的思想动員。

与反复說明整风意义的同时，"解放日报"还发表了"教条与褲子"、"整頓三风必須正确进行"、"把矢拿稳，把的認清"、"整頓三风中的两条战綫斗爭"、"反省"、"学与用的統一"等著名社論，深刻地闡明了毛澤东同志指示的"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方針。

此外，"解放日报"还发表了"提高領导，改造作风"、"反对群众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把我們的报紙办得更好些"等著名社論，反对与批判了当时在各种实际工作中存在着的主观主义的作风，帮助党迅速地以整风精神改进了各种实际工作。

在大力宣傳整风政策的同时，"解放日报"在这年还用了很大的力量宣傳了党的領导战爭的各項政策，其中特別是精兵簡政的政策。例如"精兵簡政"、"再論精兵簡政、"貫徹精兵簡政"、"徹底实行精兵簡政"等一系列社論，精辟地闡明了这一政策的偉大意义。

为了堅持抗战，克服困难，保存和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除了指示全党实行精兵簡政，大力节省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財力、減輕人民的負担以外，还在1943年領导解放区全体軍民进行了大規模的生产运动。

毛澤东同志在这年用了很大的力量来領导生产运动，曾經先后发表了"抗日时期的經济問題和財政問題"、"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論合作社"、"組織起来"、"論軍队生产自給，兼論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必須学会做經济工作"和"游击区也能进行生产"等著名論文，这些論著是我党領导生产运动的綱領，也是"解放日报"宣傳生产运动的指針。"解放日报"这年宣傳生产运动的首要功績就是反复地宣傳了毛澤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其中特別是毛澤东同志关于"組織起来"的指示。这是由于它是毛澤东同志的上述許多指示中的主要之点。据統計，这年"解放日报"大約发表有二十篇論文都是論述这一問題的。例如"把劳动力組織起来"、"生产大竞賽"、"边区英雄代表大会給我們指出了些什么"等論文便都是以此为中心內容的。

圍繞这一中心，"解放日报"还用很大力量宣傳了生产运动中的先进人物、先进經驗、模范事迹，各地区运动情况等約三千余件这样的消息和通訊。"解放日报"这种規模如此宏大的生产宣傳，不但对解放区軍民的大生产运动起了极大的組織动員作用，并且深刻地改变了解放区广大人民、战士、干部对劳动的陈旧观点，建立了新的劳动观念，使劳动在人們的心目中，变成了极其光荣豪迈的事业。

正当解放区軍民在渡过了极其艰苦的1941、1942年而在1943年更加英勇地进行战斗和生产的时候，蔣介石却又在六月末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3年3月，蔣介石发表了一本臭名远揚的"中国之命运"作为大規模反共反人民的思想准备和輿論准备。在該书中，蔣介石无耻地宣揚反动的法西斯思想，并狂妄地声称要在两年之內解决中国內政問題，即消灭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随后蔣介石又建共产

国际解散（1943年5月）的时候，指使其各地的特务匪徒假冒“民众团体”的名义，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六月底蒋介石尽撤黄河河防，包圍了陕甘宁边区，由胡宗南指揮，准备分兵九路“閃击”延安。因此揭露蔣介石的內战阴謀，批判蔣介石的法西斯理論，就成为“解放日报”在国內政治宣傳上的最重要的責任。

在蔣介石发起这次反共高潮的初期，“解放日报”首先帮助党大力地揭露了蔣介石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軍事阴謀，迫使蔣介石不得不中途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随后“解放日报”又帮助党以批判蔣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为中心，向国民党发起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反击，在政治上給了国民党以极其严重的打击。

从1943年5月5日发表了“中国思想界現在的中心任务”起到10月12日的这个阶段中，“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的各种重要的論文和資料，字数多达百万，而且在內容方面极其丰富、系統和深刻。在論文方面最重要的有毛澤东同志的“質問國民党”、“評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屆二次国民参政会”，有陈伯达同志的“評中国之命运”，有范文瀾同志的“誰革命？革誰的命？”、“袁世凱再版”，有吕振羽同志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有艾思奇同志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学”，有“解放日报”社論“中国思想界現在的中心任务”、“根絕国內法西斯宣傳”、“請重庆看罗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法西斯主义就是叛国、禍国、亡国的主义”、“国民党与民族主义”、“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等。在資料方面最主要的有“从九一八到七七”、“九一八以来蔣介石諾言一斑”、“九一八以来蔣介石的自我批評一斑”、“抗战以来敌寇誘降与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一笔总帳”、“国民党內反动派破坏抗日根据地的罪行一斑”、“国共两党抗战成績比較表”、“三年来国民党九次应战的研究”、“国民党六十二个叛国投敌的党政要員概况”等。通过这些論文和資料，“解放日报”从理論上、事实上彻底揭穿了蔣介石的阴謀和他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所宣傳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領袖”的法西斯理論，在政治上給了国民党以毁灭性的打击。

1944年，是以苏联为中坚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偉大的胜利和中国解放区战場对敌发起局部反攻的一年。和解放区的情况恰恰相反，1944年是国民党在敌人新的进攻下，再一次大潰敗的一年。在这年3月至10月的八个月中，国民党又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貴州的一部。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对于国民党反动統治再也不能继續忍受了。国民党統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更加活跃起来了。要求改組国民党政府成为民主联合政府，以利于对日反攻和爭取抗战最后胜利，便成为全国广大人民的一致呼声。但是，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頑固地拒絕了这个要求。这样在全国人民面前，进一步揭露国民党的腐敗无能和各种法西斯統治罪行，大張旗鼓地宣傳全国人民的民主斗争，就成了“解放日报”这年在国內政治宣傳上的主要任务。

“解放日报”首先揭发了国民党破坏宪政运动的种种罪行。接着又在这年9月5日国共談判宣告破裂以后，大力地宣傳了国共談判經过，揭发了国民党想利用談判消灭敌后軍民的阴謀。例如“解放日报”发表的“大后方輿論十題”、“国共談判的来往文件”、“言論‘自由’以后”等，又一次在政治上給了国民党以严重打击。

1945年1至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积极地开始了內战的准备工作。在这一严重情况下，1945年4月23日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毛澤东同志作了“論联合政府”的报告，深刻地指出了动員全国人民爭取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关系着几万万人生死”的严重問題，是“一切中国問題的关系所在”。“解放日报”全部刊登了毛澤东同志的报告，发表了“爭取胜利的早日实現”、“中国人民胜利的指南”、“团結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迎接胜利局面”等十余篇社論，論述了毛澤东同志报告的偉大意义，号召全国人民为其实現而斗争。

毛澤东同志的演說和报告，在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这年年初开始，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統治区，出現了对敌继續反攻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統治的新高潮。但在全国人民更加积极地起来进行斗争的同时，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也更加蛮横、狡猾地起来保护自己的統治。因此，“解放日报”及时地写了“紀念孙中山批判蔣介石”、“評蔣介石元旦广播”、“評蔣介石3月1日的演說”、“評国民党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等論文，对蔣介石的阴謀，进行了尖銳的揭发。在揭露蔣介石的同时，“解放日报”还发表了“赫尔利和蔣介石的双簧戏已經破产”、“評赫尔利政策的危險”等論文，对美帝国主义的阴謀进行了彻底的揭露。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使中国抗战立即进入了最后阶段。在苏联紅軍的强大攻势下，日本帝国主义便于8月14日，宣布投降了。至此，“解放日报”完成了它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和中国人民一起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解放日报"在抗日战爭时期的主要功績已如上述。当然，和許多其他的报刊一样，它也并不是沒有产生过缺点或錯誤。例如在太平洋战爭爆发前后，曾把国际宣傳强調到了一种不适当的程度，因而大大地削弱了党的国內政策方面的宣傳。又如它曾刊登过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但是，这和它的难以估量的偉大功績比較起来，那就微不足道了。

除"解放日报"外，中央一級的报刊还有"八路軍軍政杂志"。这是1939年前后，为适应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及时地指导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軍政建設和領导全国日益緊張的政治斗爭而創办的，它是以研究軍事問題为主的刊物。

現在我們看到的"八路軍軍政杂志"影印本共四卷，自1939年1月至1942年3月。毛澤东同志在"发刊詞"中明确地指出，当抗日战爭向着新阶段发展的时候，"八路軍軍政杂志"的出版，是"为了提高八路軍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給抗战友軍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軍抗战經驗的参考材料"。經常写稿人除毛澤东同志外，还有許多中央負責同志。

此外，党还先后創办了"共产党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化"等主要刊物。它們在宣傳党的主張，指导各项工作等方面都曾起过十分卓越的作用。

在出版上述刊物的同时，党中央还指示广大的敌后地方組織，創办大批的敌后报刊。在党的这一指示下，敌后各地的小型抗日报刊风起云涌地发展起来了。最著名的如华北"新华日报"，晋綏边区的"抗战日报"（后改为"晋綏日报"），晋察冀边区的"抗敌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山东解放区的"大众日报"，晋冀魯豫的"中国人报"、"战斗报"，以及华中地区的"抗敌报"、"抗敌"半月刊等。这些报刊在抗战初期的最大功績是向广大的敌后人民进行了自己武裝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教育，从而帮助党迅速地实現了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爭"的战略主張。

二 在国民党統治区出版的报刊

抗战开始以后，摆在我党面前的第一个严重任务，就是向全国人民說明我党的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綫，反对国民党的动摇、妥协和片面抗战的路綫，以动員全国人民起来参加抗日战爭。但是这时我党除了在陝甘宁边区有"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以外，在广大的国民党統治区却沒有党的公开报紙；而这些报紙又由于国民党的各种限制而不能很快地傳到国民党統治区去。因此，在抗战爆发以后，党便立即与国民党談判出版党的公开机关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問題。但是因为国民党的百般刁难，一直到1937年底，南京失守以后，国民党政府迁到了武汉，經过我党一再交涉，国民党才終于同意了我党公开报刊的出版。1937年12月11日，我党的机关杂志"群众"首先在武汉出版了。接着，1938年1月11日，我党的"新华日报"也在武汉出版了。

"群众"周刊自1937年12月30日出版，至1949年5月10日停刊，曾先后迁移出版地址四次。1938年10月24日之前在武汉出版，1945年8月以前在重庆出版，1945年8月以后迁上海出版，1947年1月迁香港出版。

"新华日报"从1938年1月11日起，至1947年3月1日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閉止，总共存在了九年多的时間。在1938年10月24日以前，是在武汉出版，从10月24日起直到停刊为止，它一直在重庆出版。

在1938年初至1938年10月的一段时間內，以"新华日报"和"群众"为首的革命报刊，最主要的功績是駁斥了亡国論和速胜論，宣傳了毛澤东同志在"論持久战"一书中所闡明的持久抗战的观点。例如"在困难中前进"、"由失敗到胜利的樞紐"、"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長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战"、"目前抗战形势与今后任务"等論文，尖銳地駁斥了上述两种論調，科学地說明了抗日战爭的前途，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除了大力地駁斥了亡国論和速胜論以外，在这个时期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为首的革命报刊，还特別着重地批判了自国民党政府迁到武汉后，又开始高漲起来的各种破坏团結、反对民主的論調。国民党为了加强这种反共、反团結、反民主的反动宣傳，他們首先由著名的反共分子陶希聖、周佛海、陶百川等人在武汉、西安等地区大批創办了如"民意"、"血路"、"前卫"、"抗战与文化"、"文化批判"等反动刊物，大肆宣傳起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領袖"为中心的反共、反团結、反民主的老調来。与此同时，国民党又采取了查禁革命报刊，解散进步团体，逮捕进步青年等反动措施，"新华日报"、"群众"以及"全民抗战"（抗战初期，由李公朴、柳湜主編的"全民周刊"和鄒韜奋主編的"抗战"于1938年7月合并，改名"全民抗战"）、"救亡日报"（1937年8月間在上海創刊，由夏衍、錢杏邨任編輯，郭沫若、郑振鐸等經常写稿）等革命报刊，針对国民党的这些反动宣傳和反动行为，一連发表了"抗战与改善民生"、"抗战中的

民权主义"、"胜利的保障"、"查禁书报問題"、"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問題"、"論保障救亡团体和抗日党派的合法权利"、"实施抗战建国綱領"、"巩固团結、反对分裂"等許多論文，給予了有力的抨击。

但是不能不指出，在这个时期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也有着严重的錯誤。这就是它們在王明同志否认"有团結有斗爭，以斗爭求团結"，主張"一切經过統一战綫"、"一切联合，不要斗爭"等投降主义思想指导下，散布过王明同志为蔣介石进行辯护的論調（如"群众"第四期王明同志的"挽救时局的关鍵"），从而降低了"新华日报"和"群众"在这个时期的战斗性，使党的宣傳工作受到很大的損失。

1938年10月末，武汉失守，結束了中国抗战的第一个时期。在武汉失守到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为止的这段时間，国民党为了給自己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投降政策找寻借口，掀起了更加瘋狂的反共、反民主、反进步的宣傳。他們公开通过張君勱提出取消共产党、取消八路軍、取消边区的无理要求，硬說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团結"。他們公开誣蔑八路軍、新四軍在敌后"游而不击"、"襲击友軍"、"圍攻抗战部队"，并公开宣揚"軍事与民主不相容"等濫調。

这个时期的"新华日报"和"群众"，由于消除了王明同志过去的右傾思想影响，显示了极大的进步。它們針对着国民党上述反动宣傳，首先抓住当时极为囂張的汪精卫的和平投降論調，給予致命打击。紧接着，在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国之后，"新华日报"就联合所有进步报刊，以反对汪精卫为中心，全力在国民党統治区发起了一个反对投降妥协，彻底肃清汪派汉奸的运动。与此同时，"新华日报"、"群众"等革命报刊并坚决地駁斥了国民党的各种反动宣傳。指出：八路軍、新四軍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但不能取消，而且是敌后抗战的"模范"和"堡垒"；"圍攻"抗战部队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自己；抗战时期不是"軍事与民主不相容"而是民主是抗战不可分离的一个部分，如果人民沒有民主权利，就失去动員人民参加抗战的必要条件。它們指出：所有国民党这些同汪精卫如出一轍的反共、反人民的宣傳，只不过是他們进行投降妥协的准备，全国人民必須起来反对这种妥协投降的活动，爭取抗战的胜利。随后，它們又以宣傳毛澤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論"为中心，写了"文化界努力的方向"、"五四运动与民主主义"、"継承五四的革命傳統，展开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文化工作者应努力的是什么？"等一系列論文，比較有系統地闡明了中国革命的理論問題，从而从理論上剝夺了国民党的精神武裝。

从1941年初皖南事变至1945年8月的一段时期內，蔣介石一方面在其統治区內开始了对进步文化事业的大規模的、空前野蛮的摧殘（上述"全民抗战"、"救亡日报"等著名进步报刊均遭封閉。党的"新华日报"和"群众"虽未遭封閉，但亦遭到了几乎难以再行出版的严苛扣檢），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加强了对解放区的封鎖、襲击、进攻、破坏。他們为了給自己上述反动罪行辯护，除了国民党原有的"中央周刊"等刊物外，又新創办了大批反动刊物（如"文化先鋒"、"文艺先鋒"、"民族文学"……等，另外还包括为国民党服务的"大公报"在內）。在这一时期发起了空前瘋狂的法西斯宣傳运动。

国民党通过这些反动报刊，猖狂而又露骨地大肆宣傳："軍令政令必須統一"、"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領袖"等等法西斯主义的口号，甚至还毫无羞耻地公然宣傳要向希特勒学习。为了給自己露骨的法西斯宣傳張目，国民党还通过他們豢养的文化人，掀起了直接的或間接的为国民党法西斯主义宣傳服务的各种反动的政治的、哲学的和文学的理論宣傳。例如以昆明云南大学教授林同济为首的所謂"战国派"，通过"战国策"、大公报"战国"付刊，"文化先鋒"、"文艺先鋒"等反动刊物，大力宣傳以崇拜暴力为中心的所謂"力的政治"、"力的世界"的法西斯主义理論，为德、日帝国主义侵略辯护，为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辯护。又如以馮友兰等为首的唯心論哲学家，通过"哲学評論"、"文化先鋒"等刊物，大力傳播"命运論"的思想，以及宣傳唯心主义哲学的"新原人"、"新事論"、"新世訓"、"新理学"等著作。此外，以梁实秋等为首的一批反动文化人，則通过"民族文学"、"文化先鋒"、"自由論壇"等反动刊物，向进步的文艺界发起了攻击。針对这些为国民党法西斯宣傳服务的各种反动理論，以"新华日报"、"群众"为首的革命的和进步的报刊，从1942年起除了通过各种办法进行不断揭露外，还发表了許多文章反击和駁斥了这些反动理論的宣传。

先是在1942年初，章汉夫同志首先在"群众"上发表了"'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的实质"一文，为批判所謂战国派放了第一槍，接着"群众"和"新华日报"便率領着其他許多进步报刊，一連发表了"'战国派'对战爭的看法帮助了誰？"、"什么是战国派的文艺理論？"、"再論战国派的民族文学"等許多文章，从哲学、政治、文艺思想上彻底地揭露了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本質。在战国派被击敗以后，在1942年

下半年和1943年，以"新华日报"和"群众"为首的革命的和进步的报刊又一連发表了"一个唯物論者的文化观"、"努力、天才、命运"、"听命运論講演以后"、"評馮著新事論"、"眞际与实际"、"物与理"、"物与气"等一系列文章，着重地批判了馮友兰等人的"命运論"的思想。

在批判上述两种反动思想的同时，它們也不断地对梁实秋等一批反动文化人的謾駡，作了严正的批駁。

当然，在这一时期，以"新华日报"、"群众"为首的进步报刊的功績是很多的，但是它的主要功績却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配合革命根据地的报刊，打敗了国民党的瘋狂的法西斯宣傳。

除了党直接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外，在国民党統治区还有大批由一些进步团体和革命知識分子在党的領导或影响下主办的一些报刊。它們坚决地拥护党的主張，并积极地为实現党的主張而努力工作，它們是党的报刊的最坚决的同盟軍。在这些报刊中，除如前所述"救亡日报"和"全民抗战"外，还有1935年9月創刊，在上海抗战期間有一定进步作用的"立报"（当时由薩空了、王任叔等任編輯）和"战綫"五日刊（1937年9月創刊，章汉夫、艾思奇等同志編輯），"中华公論"（1937年7月20日創刊，張志讓、張仲实、郑振鐸等同志編輯）、"文化战綫"（上海編輯人协会主办，艾思奇等同志編輯），"战时联合旬刊"（由上海原有的进步刊物"世界知識"、"妇女生活"、"中华公論"、"国民周报"等四杂志联合出版），"战时大学"周刊（1937年8月創刊），"救亡周刊"（1937年10月創刊，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主办），"吶喊"（由原来上海左翼刊物"文学"、"中流"、"文季""譯文"等四刊物联合出版，第二期后改名为"烽火"）等。这些刊物多是在上海出版的。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后，它們大部分都停刊了。但是国民党統治区的进步报刊活动，却没有从此消沉下来，相反地随着大部分文化人的离开上海轉入內地，进步报刊活动更加活跃起来。例如在1937年末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在武汉除出版了"全民周刊"、"抗战"三日刊外，还有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主办的"抗战文艺"以及"抗敌新聞"、"自由中国"等。在广州除了由上海搬去的"救亡日报"于1938年元旦复刊外，还出版了"文艺陣地"、"抗战文化"、"大众生路"等。在上海、武汉、广州相繼淪陷后，除了由这三个地方迁往重庆、桂林等地的党的报刊"新华日报""群众"，以及"全民抗战"、"救亡日报"、"文艺陣地"、"抗战文艺"等进步刊物以外，党和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又創办了"讀书月报"、"理論与現实"、"文艺月报"等多种刊物。

总之，上述报刊除少数外，絕大多数都是出版不久即遭国民党查封，但是过不了多久，它們又用另一个名字出現了。它們就是这样时出时停、时停时出地在党的領导或影响下，在国民党統治区和党的报刊一起进行着英勇的斗争。

（上接52頁）

抛弃重要的史实根据。这除了給学生指出没有掌握史实的結論是对問題理解片面的表現，今后应該糾正外，更重要的是教师講課要引导学生学会从具体历史事实中看出問題的本質，才能逐步要求学生做到在回答問題时克服脫离史实的空洞、教条現象。

有的学生記錯历史人物的姓名。例如第一单元測驗时竟有人把陈化成誤写为陈玉成，或把陈玉成写作陈化成。也有少数学生把李秀成写作李自成。这一情况，反映了在教新課时没有很好联系已經講过的容易混淆的人物姓名，帮助同学区别清楚。因此，在講評測驗情况时要进行补課。例如我要同学們看課本上附的陈化成象，看清他的胡子和皺紋，記住他是怎样为国牺牲的；而陈玉成呢，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領，他是在安庆失陷后被苗沛霖誘捕牺牲的，死时才二十六岁，会有象陈化成这样的胡子和皺紋嗎？对于明末农民革命領袖李自成和太平天国后期領袖李秀成，我也用类似的方法叫学生区別开来。这样，不但帮助学生解决了人物姓名搞不清的問題，也給学生提供了以后区分姓名类似的人物的方法。

总上所述，是我在边学边教的实踐中关于巩固知識的一些做法，不是什么成熟完整經驗，希望同志們多提意見，以便共同提高。

更　　正

本刊九月号刊載之"美国帝国主义对拉丁美洲的侵略"一文"美国还在1956年糾合了南大西洋公約組織。……但是由于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对没有成功。"（第25頁左栏末四行至右栏前二行）等句，应改为："1956年以来，美国积极糾合南大西洋公約組織，但是由于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对没有成功。"特此更正。

教学問題



我們在历史教学中运用鄉土教材的点滴經驗

河北涿縣一中史地教研組

講授中国历史适当联系所在地区的重要史实；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热爱家乡，并加强教材感染性的一种具体办法；特别是对于儿童或求知欲正在旺盛时代的青年学生，教师能随时帮助他們了解所在地区的政治的和經济的重大变化，也是符合他們精神需要并达到塑造儿童优秀品德和意志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祖国社会主义事业大跃进的今天，党提出运用乡土教材丰富教学內容的号召是有特殊重大意义的。我們在遵循上級指示，执行这一决定的过程中也摸索出一些門徑，願意写出来敬向同志們請教。

我們首先对乡土教材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大体經过以下几个步驟：

（一）掌握乡土教材：为了运用乡土教材，首先必須掌握全部有关所在地区的历史沿革和重要史料。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們第一步是翻閱“涿县志”。按“涿县志”有两种刊本，一是同治十三年修訂本，另一是民国二十五修訂本。我們为了占有全部史料，曾比較詳細地进行校閱。有时，因为紀录过簡还需要参考別的材料加以証实。

（二）鑑定史料：在地方志里往往存在許多荒誕不經的傳說，这对我們历史教学毫无裨益。涿县志也毫不例外。例如，关于黄帝战蚩尤的傳說便是。还有一些历史人物在地方上存在一定影响，但是这些人物并无功于人民，甚至是历史上的反动分子。例如，东汉末年以屠杀黄巾軍起家的卢植和明朝末年列名閹党的馮銓，我們必須把这类材料删除。我們告訴学生的知識应該体现明确的阶級立場和辯証唯物主义观点。不过，在旧社会影响下，这些材料往往为儿童所熟知（因涿县有蚩尤坟和卢、馮二家祠堂），因而賦予历史教師的任务，就是必須針对这些傳說和历史人物給以足够的分析批判。

（三）訪問：旧社会修訂的地方志和地主阶級編写的历史一样，由于著史者的立場决定了他們对史料取舍的态度，因而我們必須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有的史料紀录过簡或者根本沒有載入方志，就需要我們进一步进行調查訪問，把埋沒的宝藏发掘出来。例如县志所沒有的有关义和团在涿县的活动情况，“山北社”的抗捐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情况，抗日战爭和人民解放战爭的事迹等。我們为了很好地了解这些材料，曾分別訪問了一些老人和党內外有关同志。通过調查訪問，使我們在思想上对乡土材料就有了比較明确的系統的概念。

我們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搜集乡土教材，一方面試行联系。但在开始的时候也不是毫无顧虑的。虽然我們掌握了一些材料，却不知道应該怎样安排。尤其是教材多，单講課本材料还覚得时間不够用，怎能更多地增加輔助教材呢？后来，我們从听高中二年級历史課里体会到适当插入一些有关故事会使学生感到特別有趣味，并可以巩固学生課堂知識。例如一位老师講到东汉末年刘备的軍事活动时，曾指出刘备張飞都是涿县人，并詢問学生是否知道楼桑庙和忠义店。当然这些村庄学生都很熟习，这位老师便在这基础上更进一步联系到楼桑庙的造象艺术和封建社会对刘备的正統观念。他通过故事啓发了学生的积极思維，批判了旧的正統思想，而使学生获得了明确認識。因此，学生对这位老师講的历史課都感到很有兴趣。我們認为这是一个成功的經驗。同时，領导上鼓励我們，要我們大胆想，大胆做，破除迷信，敢于創造，因此我們便开始了这一大胆尝試。經驗証明，运用乡土教材并不是給学生增加了額外負担，而是加强了記忆力，帮助他們了解

到周围的許多史迹，从而对家乡发生了濃厚的感情。在这新的工作中，我們初步取得了以下几点經驗：

（一）如何选擇乡土教材：运用乡土教材是为了提高历史教学效果，加强爱祖国、爱家乡的教育，因而选取乡土教材应在历史教学的統一目的和教学大綱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教师不应打乱历史系統而把乡土教材看成独立的补充教材，也不应任意补充以致造成臃肿現象。我們認为，这样做不但收不到应有效果，甚至会影响教材思想性，削弱了历史教学效果。因此，我們选擇教材必須保持明确目的性和辯証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例如，刘备和張飞的故事在涿县流傳很多，我們能不能无原則地講刘备卖草鞋和張飞卖肉的故事呢？肯定說是不必要的。我們选用这部分材料是因为学生熟习这些材料，但使用这些材料时只要圍繞楼桑庙这一客观存在进行簡要說明就够了。我們运用乡土教材的积极目的不是用故事炫耀地方，而是教导学生怎样用历史观点去观察周圍的历史事迹。另如涿县有华阳台，县志載华阳台出美人名馬，为燕太子丹礼遇荆軻的地方。后来，荆軻带着督亢地图到秦国去謀刺秦王，燕太子丹在易水設筵送行，当时，荆軻唱出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样悲壯的名歌。故事影响到千百年后一直傳頌“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具体到涿县来說，不能不承認这是一件大事。但故事本身强調了个人作用，这对学生思想意識是有毒害的。同时，現在学生印象中还不曉得荆軻是怎样一个人，提出来要增加很多疑問，所以我們就没有必要引用这部分材料。但也有一部分材料，过去在旧社会被抹杀，而在今天才被发掘出来。例如1910年左右山北社的抗捐运动曾以农民为中心，联合了工商业者形成清末民主运动的一个支流。虽然材料不算丰富，也足以說明当时人心向背，清政府的反动統治已經很不穩固了。这对发揚革命傳統，向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是有重大意义的。

根据以上三例說明我們选擇乡土教材必須正确对待历史人物和重要史实，并且有分析有批判地对待人們熟悉的名胜古迹。选擇乡土教材的标准应注意教材的故事性，不能使教材味同嚼蠟；但也不能忽視思想性，形成为講故事而講乡土教材。这便是我們在选擇教材方面的体会。

（二）关于乡土教材的运用：运用乡土教材最能体现教师的教学艺术。运用得好，学生能通过乡土教材更进一步了解历史发展概况；运用不好，也会使学生認为这是另加一杓油，形成外加一段小故事。因此，教师在运用乡土教材时要有明确的目的，熟悉所掌握的材料。我們运用乡土教材是为了加深加强历史課本的思想性和感染性，我們把乡土教材与課本密切联系起来，也是为了让学生系統地了解家乡的史迹和偉大历史人物，从而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并树立投身建設自己家乡的决心。因此，我們补充乡土教材要精練、恰当。根据我們的經驗，在处理历史人物时主要是保持精練。如講述三国的建立，我們补充說明刘备和張飞都是涿县人。現在，在楼桑庙和忠义店还有他們的庙宇。講到两晋南北朝的文化时，我們提出了“水經注”的作者酈道元，并指出現在城南道元村便是为紀念这位偉大地理学家而命名的。我們对古代著名历史人物并没有夸大鋪張，而是尽力使之与課本教材保持着一致性。但是，我們对近代历史人物的講述就比較詳細。如講述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斗争的残酷性，我們提出了涿县县長張爱东烈士，我們不但講述他領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史实，还要講他在青年时期和自己富农家庭作斗争的逸事。同样，对史实的处理也采取这种方式，把义和团在涿县的活动、山北社的抗捐运动、中国共产党領导涿县人民的解放运动作为講述重点。我們感到越是近代史实越能与現代的生活实际相联系，因此，学生的兴趣也就越濃厚。我們体会到，党提出的“厚今薄古”的治史方針是完全正确的。

（三）怎样处理教材与时間的矛盾：教材分量重，教学时間太緊張，这是历史教师的一般感觉。現在还要求增加乡土教材，可能会引起人們感到教材与时間的矛盾无法解决。我們認为这还是思想認識問題。党要求我們打破保守，破除迷信，正是針对这种思想而发。古語說的好：“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也就是說，如果总把課本看成“金科玉律”，就会使困难陷于无法解决。因此，在我們提出困难之前，首先应当檢查一下自己在研究教材和精簡教材方面下了多大工夫，是否以战斗姿态来迎接文化革命。教材与时間的矛盾并不是絕对的，癥結还在于主观方面。根据我們的經驗說明，教师在充分掌握教材的基础上，抓要点，精練語言，打破因循教材成規，运用多种方式，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例如，中国历史第四册抗日战争胜利（第十五章）一章，按計划規定采用講述課，一課时講完。其中主要問題包括：1944—1945年解放区展开局部反攻后的总的情况、中共七次大会、抗日战争胜利三个大問題，单是教材規定下来的材料已經很多，可是我們还必須补充乡土教材，要联系涿县当时的具体情况和民族英雄陈輝烈士的事迹。怎么办呢？教材多，时間少，要完成課时計划是有困难的，但任务必須完成。因此，我們便采取精簡教材和发揮学生独立思考的办法加以解决。在第一个主要問

题上除說明解放区自局部反攻开始后总的情况外，更联系涿县具体情况着重說明了我們从相持到反攻阶段的情况变化，从而教导学生認識我們抗战胜利并不是完全依靠外力。在第二个主要問題上我們抓着毛主席“論联合政府”这一重点加以突出闡述。第三个主要問題則利用板图边說边指，因为利用地图可以节省許多言語說明，需要的教学时間大大縮短了。此外，对参加七次大会的代表人数沒談，对解放区战場只介紹共有十九个，沒提出具体名称(因前面都講过)。对苏联紅軍对日作战情况是利用板图进行綜合說明的。結果，順利地完成了課时計划。我們認为教材中虽有个别材料沒有詳細講，但学生通过閱讀課本和課本插图完全可以懂，效果相同，却能匀出时間講主要材料。这也就是我們为解决教材与时間矛盾进行調整教材的基本方法。

最后談一談我們运用乡土教材的几点体会。运用乡土教材輔助教学对我們原是一項新的工作，現在还找不到一套成熟經驗。何况教材因地而异，势必需要我們自己鑽研創造才能把工作搞好。通过实踐証明，运用乡土教材可以提高教学质量，能够啓发学生的积极性和独立思考。不过我們要更好地发揮教材作用，还应該反复研究教科书与乡土教材的內在联系。現在，我們还談不到有什么經驗，只是隨时解决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困难。同时，在某些問題上也可能存在認識上的錯誤，尙有待进一步驗証，最后希望同志們批評指导。

我在历史教学中巩固学生知識的几点做法

江贛师

“要巩固地把知識保持于記忆之中，遇到必要的时候要想起这些知識并以它作为凭借”，这样才算巩固了。历史好象人类社会发展的長流。根据历史科学“不仅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規律性，而且还詳細地研究这些規律性的具体表現”这一标准来衡量，我們要求初中学生应巩固哪些知識呢？我認为主要应掌握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理解并記住各个事件之間的有机联系；掌握各整个时期的輪廓并記住那些具有关鍵性、具有时代意义的史实的因果关系、意义和影响。对于其他次要問題只要发展綫索清楚，不致含混不清就可以了。一句話，要学生“旣見森林，又見树木”。在清楚重大事件的基础上掌握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及其联系（即历史发展的一般規律和規律性的具体內容）。要达到这个要求的根本办法是充分备好課，講好課。力爭当堂消化巩固。

本学期我在历史教学中是着重了以下几方面来巩固学生知識的：

（一）注意新課与旧課的联系，注意新課和下一节或几节的联系，但又不能破坏新課本身的系統性。例如初中近代史第十三章“軍閥統治下的中国”，实质上就是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与封建軍閥相結合繼續統治中国人民的表現。也就是“中国資产阶級的軟弱性，沒有发动广大群众”的惡果。日本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凱称帝和段祺瑞专政，便是它的具体內容。但是，辛亥革命仍有其不可忽視的重大意义，“二次革命”、“护国战爭”、“护法运动”，便是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具体反映。这样联系起来理解，学生学习情緒濃厚，知道历史的来龙去脈，旣能巩固旧知識，又好掌握新知識的本质問題。也就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教育学生認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資产阶級不可能完成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任务，不可能領导革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統治不推翻，人民不可能过好日子。

又如講到同上章第三节“袁世凱帝制活动的失敗”，袁世凱积极安排恢复帝制。順便一提“袁世凱向五国銀行团大借款”，人民堅决反对，不久爆发了“二次革命”。那么，現在袁国称帝，人民又会怎样呢？在承上啓下的問話中，使学生运用旧知識作为猎取新知識的武器。又如在同一节課，講到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袁世凱取消帝制，帝国主义也放弃对他的支持，教师主动指出这与武昌起义革命形势高潮，帝国主义放弃对清政府的支持联系起来看，是否即是放弃侵略中国？（不！它支持袁世凱窃取革命果实。——学生答）那么帝国主义放弃对袁世凱的支持后，又支持誰来統治中国人民呢？（教师自答，我們下一課就会談到这个問題）这样，就指出了下一节課的綫索。

（二）注意新旧課的对比，旣可巩固旧課又好掌握新課。在复习課中运用对比法，具有更大的意义。

根据过去講課的事实教訓，关于戊戌变法运动的历史意义这一問題，在講过这章不久的时間內，学生还能掌握。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民主革命派与以康梁为首的君主立宪派展开理論上的斗爭，結果粉碎了君主立宪派的反动理論，使資产阶級革命推进了一步。戊戌变法运动时，康、梁主張君主立宪，这时他們是进步的；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形势不断发展，清政府进行"立宪"騙局，而康、梁仍主張君主立宪，这时他們却是反动的了。不少学生搞不清这个問題，对戊戌变法运动的意义訊識模糊。

本学期，講戊戌变法这一章时，就强調指出戊戌变法发生的具体条件，讓学生充分理解"在当时的情况下戊戌变法是进步的"这一历史唯物的結論。等講到民主革命派与君主立宪派进行斗爭时，又联系起来进行对比，着重說明为什么1898年戊戌变法时主張实行改良是进步的；而在1905年以后中国同盟会成立，革命形势发展了，清統治摇摇欲墜的时候，君主立宪派仍主張維护清政府的統治就阻碍了革命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所以是反动的。这样对比的結果，学生对这个問題已有初步的理解。进行全期复习課时，我再提示"君主立宪派主張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在变法运动时期是进步的，为什么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康有为、梁啓超仍然主張实行君主立宪却又是反动的呢"这样的問題，学生很感兴趣，发言热烈。教师总結发言的結果，不仅使学生明确了甲午中日战爭以后和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的形勢发展情况，而且培养了学生应根据具体历史条件来評断历史事件的訊識能力。也相应地提高了复习課的質量。

又如复习义和团运动时可恰当地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进行对比。从两者发生的时間、地点和原因上对比，不但使学生再一次明确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中国开始淪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以后第一次的大規模的农民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是在資本主义侵略轉入帝国主义侵略以后的一次大規模的农民爱国主义运动，而且从革命爆发的地点上对比出两者分别与鴉片战爭和甲午中日战爭的关系；再以太平天国革命以打击封建統治为主，而义和团运动是以打击帝国主义为主来对比，說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猖獗，中国人民对主要敌人的进一步訊識，这并不意味着农民阶級对封建統治的拥护。

通过对比，不但使学生較易掌握重要的历史事实及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而且可以帮助学生从重大的历史事件中看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結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对比，要防止无目的乱比。对比要在課前进行充分的考虑，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三）按照历史年代顺序講課并以重要年代为中心联結次要年代，使学生在掌握史实中記住年代，在記住年代中帮助巩固重要史实。

除了講新課必須使学生明确是什么年代发生的事件及其与前面講过的年代的关系以外，还要求学生記住重要年代。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不但在講新課时要明确講清年代的顺序，而在单元复习課时更应使学生进一步明确全单元重要事件和重要年代。例如第一单元是鴉片战爭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两个中心內容。学生掌握了这个中心內容及其內在联系，就容易記住这个单元的重要年代了。比如說，学生曉得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鴉片战爭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級的革命运动，那么在学生思想上便能明确这两个重要事件的年代孰先孰后了。学生記住了鴉片战爭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起訖年代，再来掌握中国民族資本主义的产生年代就比較容易了。因为学生可以从史实中来理解：外国資本主义的侵略，清政府的投降卖国，人民生活的痛苦，使鴉片战爭后出現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外国資本主义侵入的刺激，促使中国民族資本主义在太平天国末期就产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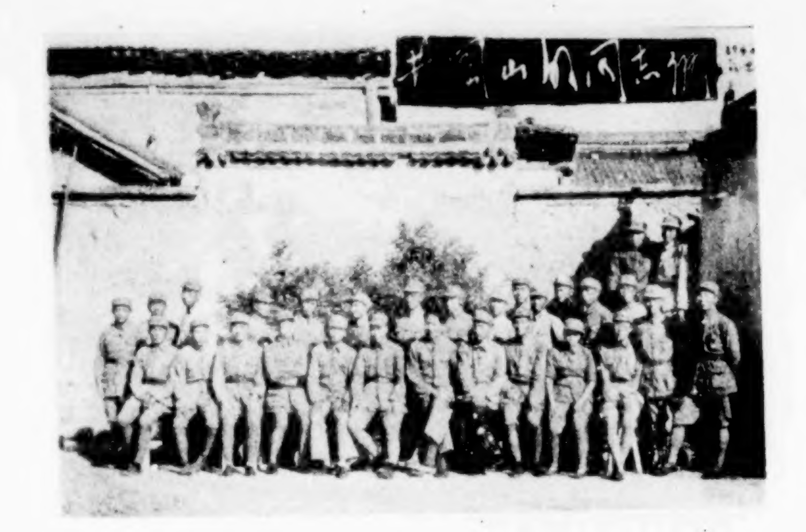
这样让学生在掌握史实的基础上記住緊要的年代，能起帮助学生巩固知識的作用，比学生孤立死記年代，为应付考試强記年代要好得多。本学期中途，教研組临时抽考檢查教学質量，試題9要学生填出1840—1842；1851，1，11；1894—1895；1898等四个年代的重要事件。我教的班次計抽考37人，四个年代全对的有23人，錯填一个或两个年代的14人。其中有两个班次参加抽考的学生几乎全填对了。这是未經过复习进行抽考的，說明学生掌握重要年代这方面是有些进步的。

（四）从各方面了解学生在学习上的問題和缺点，及时予以糾正，旣可巩固知識，鼓励学习积极性，又可及时发現自己在教学上的問題。

例如我将学生在单元測驗、課堂測驗、抽查作业，临时抽考及期終考試試卷中发現的偏向和錯誤情况，分班按人分别記录下来。把他們較严重的偏向和錯誤归結为几个問題在課堂上进行講評（空一节不提問，用提問时間进行講評），并把做得特别好的提出来表揚，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有的学生在回答問題时老是写几句条文式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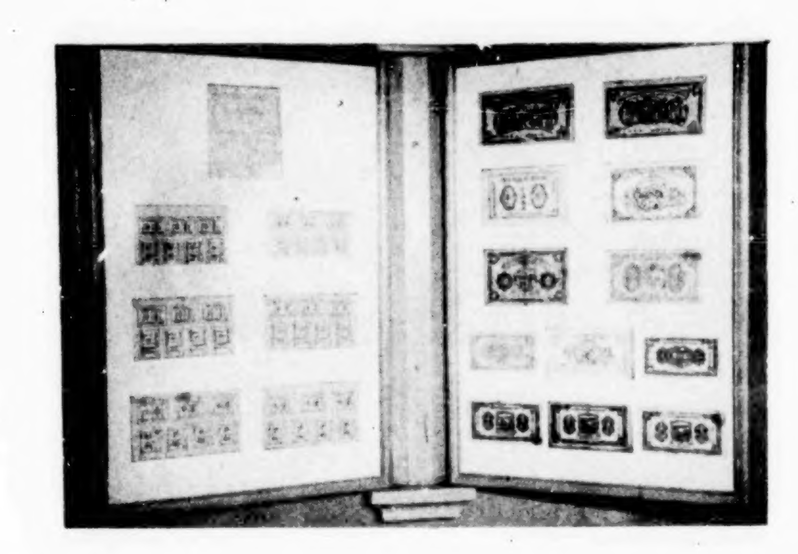
（下轉48頁右欄）



圖五 井岡山的同志們。

圖六 井岡山根据地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茨萍。





圖七 革命根据地的币制。

圖八 革命根据地印鈔票的石版及手抄課本。





圖九　1931年11月７日在江西召开了全国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毛澤东同志領导下制定了各項政策。图为大会会場。



圖十　1931年12月１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員会举行第一屆第一次会議，中立者为毛澤东同志。

圖十一　九一八事变后，京沪学生集合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門前示威，要求出兵抗日。

圖十二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下的东北抗日游击队的一部分（內有金日成同志）。

